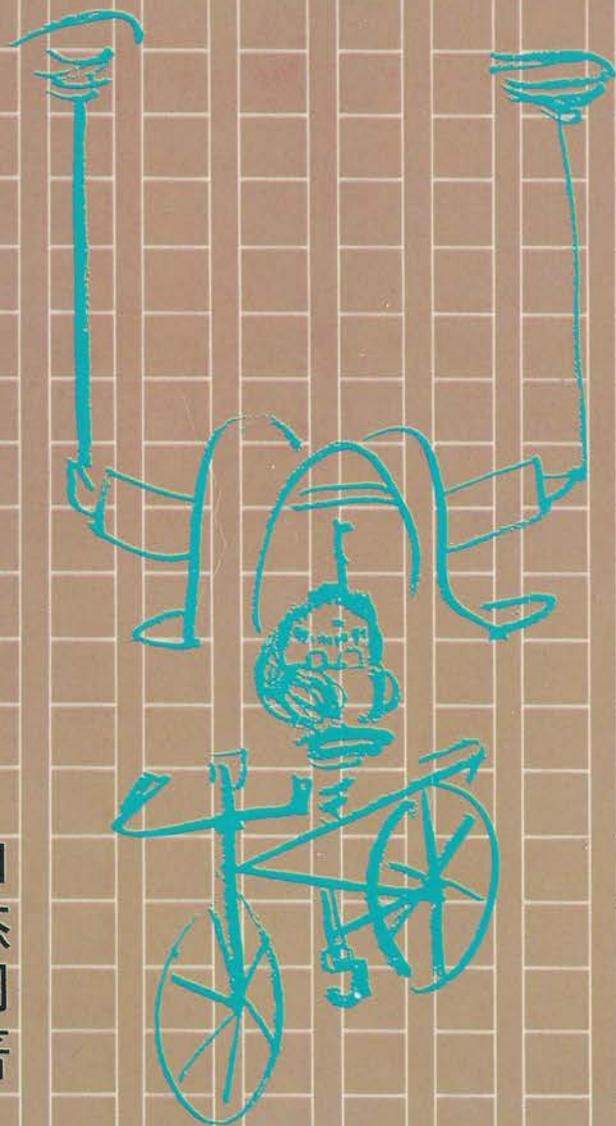


自行車文集



白杰明著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自行車文集

白杰明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白杰明，原名GERHARD，姓BARMÉ。原籍澳大利亞。現年三十。學年（一九七四——一九七七）遠越重洋，滿肚離的憂離掛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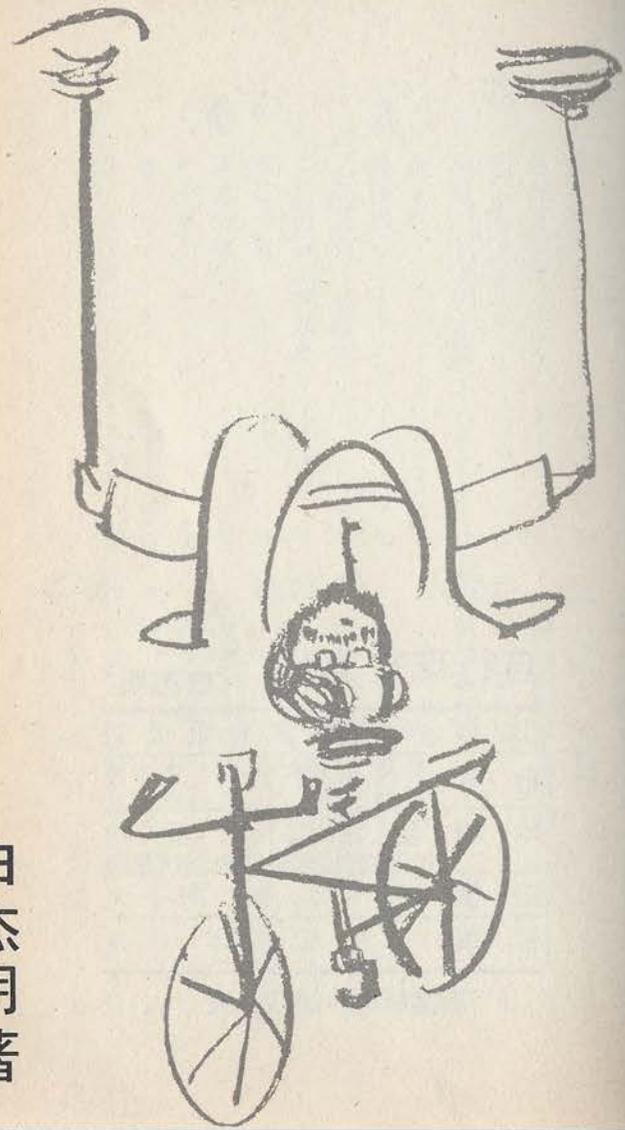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八月，白杰明獲扶桑，隸居京都大學研究所，當其中日文社會學研究生。

白杰明有譯圖，屬於四和橋家，以寫作翻譯為生，流傳萬里。近年除了日文二篇，按求一窮之需，寫作和翻譯了半部東西，計有：《西洋鏡下》、《自行車文集》、《野和八記》、《橋頭錄》等。

DESIGNED & PRINTED IN 1980 HONG KONG H.K. \$ 14.00

丁巳仲夏
月
旬
日
啟

自行車文集



白杰明著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①	「本祭」偶拾	134	▷	鬚鬚佬的苦惱	181
②	神田的本祭	131	②	髮	177
③	東京堂出電腦新招	129	③	鏡子	172
④	《惡魔的食塵》噙着人下	126	④	教育雜誌	169
⑤	您看過日本的《公關》嗎？	123	⑤	魔球	166
⑥	「震派」的《源氏物語》	120	⑥	咪咪菩薩	163
⑦	日本文部省招安「小搗蛋」	117	⑦	明星	161
⑧	顯然的對比	114	⑧	睇戲馬拉松	159
×	附：丈夫「買春」之悲……	110	⑨	死而不唯唯	157
×	「買春」何時休？	106	⑩	NO SALE	154
⑨	潛移默化可怕	103	⑪	悲而不傷·喜而不樂	152
⑩	噪音	101	⑫	《男人辛苦》第三十部	149
⑪	建築的反動	99	⑬	少林寺的繁殖(一)	146
⑫	喫茶店	96	⑭	少林寺的繁殖(二)	144
⑬	油茶	96	⑮	持不同「影」見者的進言	141
⑭	律人甚嚴	93	⑯	石揮飲譽國外	137

自序

白杰明

我們生活在一個誇張的年代裏。我在這本小書裏也是跟大家一樣誇張了一番。這種心態似乎是「世紀末」的一個屬性，咱們只不過是把它提前了一個年代罷。

拙作《西洋鏡下》已行於世三年多了。出版社給該書編了號，稱之為「第一集」，意味着總會

有第二集，第三集出現。好心的朋友也有時打聽《西洋鏡下》還出版嗎？我心想這種莫名其妙的關心大概是由於他們有「自虐」心理吧。我也不無自知之明，早就知道我用中文寫的書能夠出版，本是沾了這些讀者們獵奇心理的光。反正，文章一直在寫，出版社還有意予以出版，讀書界裡也真沒準兒會有幾個人看，所以我不妨再結集出書，起名為《自行車文集》（《西洋鏡下》第二集是也。）

這個名字用不着多做解釋。搜入本集的文章「雜」得很，文字和內容顛三倒四，思路崎嶇，行筆離譜，宛如瞎子倒立玩自行車，不僅以醜態玩兒命，說不定行車亂闖時也會加禍他人。

本集的封面畫跟《西洋鏡下》同樣是一個誇張的陋容，這回可稍微「素雅」一點，意在自諷也。

至於書的內文，還是那些班門弄斧的東西，看着玩兒則已，太過認真對待，您就發覺我在弄巧出拙了。

外人用漢語寫作遠不只我一個，此事早已經「沒有甚麼了不起」，故不必在此贅筆。拙文本身也沒寫甚永恆的主題，也恐怕夠不上「獨抒性靈」的資格了。過去有人捉弄我說我的文字甚有魯迅的味道，這回看此書的校樣的時候我就發現了這話倒不假，本人的文字十分相似於魯迅譯著的文風：南腔北調，不東不西，令人費解。反正，我的漢文文字就是這樣的了，看官覺得整腳，那請另找讀物。

再寫下去我就會變得狂妄。只好作罷。是爲序。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九龍

「外國人」辨

嗚呼哀哉！記得過去同朋友約會或訂計劃時，用「君子」方式允諾，口頭上同意即可。一言爲定後，有時還念念有詞補充一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料，拙作《西洋鏡下》「後記」提到我對「外國人」這頂桂冠並無好感，有謂「我同許多朋友一樣，對「外國人」這個籠統而並不確切的字眼很忌諱。」有的書評家就以爲這是我的「座右銘」，甚至有朋友跟我「遙賭」能否學會山東快書，亦提及「外國人」。「駟馬難追」的滋味這回可嘗到了。我自己認爲不會惹人注意的一句話，在此且略加說明，「以正視聽」。（好大的膽子！）

在澳大利亞長大的人，大概沒有幾個會覺得「外國人」（或用英文foreigner合適些，免得同胞聽不明白），聽起來順耳。您也許奇怪：「怎麼了？」「外國人」這個詞有什麼了不起？外國來的人不是外國人是啥？」這沒錯。不過，澳大利亞現在的居民大部份就是從外國移民去的。所以，對他們用「外國人」很容易產生誤會，似乎「外國人」有點什麼不好似的。

比如說我自己的父母吧。父親是在德國科隆生長的猶太人，希特勒及納粹黨上台後，他就亡命到英國去，然後在三十年代末期移民澳洲。母親就是在澳大利亞出生的，她的父母都是蘇格蘭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歐洲的難民特別多，大部份也不像原先流放到澳洲後來變成獨立澳洲民衆的英籍人。大戰時去的移民大多數是歐洲大陸人（在澳大利亞，英國及歐陸，都是歐洲，但在人們概念裏是兩回事，決不能混爲一談）。他們到澳大利亞後，曾普遍被視爲「外國人」或「難民」，（澳俚語稱爲「refugee」，同早來幾十年或一百年的英聯邦的人有磨擦，至今仍留些痕迹。痕迹之一，就是對「外國人」這個詞的避諱。

想起小時候母親跟父親鬧矛盾時，她想刺他一下，就一定說「外國人」。父親來澳後當了幾年兵，爲打敗日本法西斯也曾出了點力，一聽到人稱他爲「外國人」，就火冒三丈，罵不絕口，最後總會說：「媽的，來了這個國家，幫助保衛她，建設她，還有人敢說我是「外國人」?!」我自己就是在一個具有英國文化、德國文化及澳大利亞特有文化環境裏長大的，對「外國人」含義的精髓，一直瞭解不深。

不過，我自己對「外國人」這個詞，通過跟中國人和日本人打交道，是屢「聞」不鮮的。有人一直用「外國人」倒沒什麼，只是那種「內外有別」帶有阿Q精神勝利法的，我的確覺得要提防。

許多中國人亂用「外國人」，似乎說明其大中華思想。其地理知識之貧乏。試問，哪一位有識之士能夠在世界地圖上查找到一個叫做「外國」的地方？若您找着，請同我聯絡，大大有賞。

真是駟馬難追。嚙了半天，「外國人」這個「三字經」連一個字也沒追回來；可畏哉！寫的怎麼和四匹馬跑的一樣快。總之，我忌諱的還是「外國人」的籠統而不確切。若問：不是外國人，汝何許人也？則答曰：澳大利亞人，諸位看官皆是外國人！



語言時尚

青、少年的俚語，是一種千變萬化不隨風尚的下文化。在中國，因為普通話基於北京音，北方又是全國文化的重心，幾十年來北京地方語、青年的流行語等在各地得以流傳。而北京的俗語和青年語言通過口傳及傳播媒介，特別是電影、廣播、相聲等途徑流行全國。甚麼「蓋了帽兒」、「特棒」、「沒治」，之類的詞彙逐漸掙脫狹窄的地域性成為漢語的共同語彙。香港的廣東話詞彙，近幾年來也在廣東一帶成了時髦，而在一定程度上奪取廣州市白話在粵語系的「母語」造生詞席位。這個現象同北京話在普通話的領先地位成因類似。語言變化莫測，青少年永遠在尋找新異的東西，所以是創造和接受新俚語的積極分子。

在西方各國，特別在「英語文化圈」，新俚語和青年語言的出現也有相當的地域性。倫敦的一些地區、紐約和加州某些地方是滋長英文時髦俚語的社會和文化溫床。這些新語彙主要是通過音樂（現在也包括樂隊的「錄像音樂」）風行世界。三藩市的「谷女」（Valley Girl）語言經音樂明星

Frank Zappa 及其女兒 Moon Unit 1 Zappa 的歌曲《Valley Girl》，就風行全美。「谷女」的奇特語言也被美國青少年廣為賞識，而在去年底紐約的 Bantam Books 出版社印行了一本《谷女語言和風俗手冊》(Fer Shurr! How to be a Valley Girl——Totally!)

本書的作者除了趁美國的「谷女熱」撈一筆，使用輕浮和諷刺的筆調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八十年代初美國中產階級青少年某一側面極有趣的寫照。「谷女」早先僅限於加州，但她們的語言和一些服裝已經廣受歡迎，根本不是「谷女」或「谷男」的人也漸漸開始用一些谷女詞彙。比如說，It (粉刺)、Billys (現鈔)、Bummed (憤懣)、Kill (蓋了帽)、Nerd (二百五)，等等都險些兒進入英文(美文)的正規語彙裏。

對「谷女」和許多美國青年來講，下面例文的意思一定簡單明瞭，但許多「龍鐘派」倒會覺得難得其解。如：

[Ohmigod, the Shoe Showplace is selling metallic flats for like fourteen ninety-nine, fer shurr!]

[Like I totally couldn't believe it, like Todd bonged a load, and then like he barfed on Stacey's poodle!]

[So like I'm on the phone for hours and finally I go, [You wanna go to Disneyland, J and Jeff

goes. 「Way bichen, 」 and I go, 「I'm sure!」」

「谷女語 (Valspeak) 無視英語常規，是追求外觀的修飾、空洞的自我表現的語言。當然，它沒有甚麼長存的價值或可能，但該書凝結了一個曇花一現的語言和社會現象，給讀者以「獵奇性」的娛樂。「谷女」的風尚不單有語言陪襯，也有服裝和各種文具和小玩意。據說 Frank Zappa 爲了保證「烙」上自己的「正統」谷女商標的服裝正在打官司。

「谷女語」相當風趣，而產生它的時髦快進衰亡期，但同它之前的多種流行語言一樣，會留下片言隻語來豐富英文包羅萬象的詞彙。《Fer Shurr! How to be a Valley Girl - Totally!》Mary Corey and Victoria Westermak 共著，Bantam Books 紐約出版。

自行車文學

在交通工具裏如若說德國的「奔馳」牌是有貴族般的地位，日本小轎車是中層階級的話，自行車就應當算交通工具中的無產庶民。它產生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發育期，而雖然給「接植」馬達搖身一變，成爲震耳噴霧的叛徒——摩托車，它仍保持着自身的純潔，無聲無響地在現代人社會繼續發揮作用。近年來不少西方國家自行車在擺脫多年專爲孩童充當玩具的成見，逐漸爲成年人鍛煉身體、上下班等效勞的舊而又新的工具。

自行車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似乎將安然繁殖，不斷前進；不僅使用它爲生活必需品，而且欣賞它驅散身心倦意的人，也在增多。自行車在社會上留下的吠跡清晰可辨，但過去好像沒有人注意到它在文學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斯塔斯 (James E. Starks) 的《不噪的轉動聲》搜輯了一個世紀以來大量著名作家有關自行車的散文和詩作。其實，光選擇曾寫過「自行車文學」作品的作家，近百年的文壇仍然彘才滿天下。Tolstoy, Dylan Thomas, George Bernard Shaw, Iris Murdoch, Kurt Vonnegut,

Jean-Paul Sartre, Samuel Beckett, Vladimir Nabokov, Heinrich Böll, D. H. Lawrence, Mark Twain, Aldous Huxley, Hemingway, S. K. Narayan 等等都有作品入選。編輯在本書序裏坦白說，「我沒料到合適的材料會像天空繁星這麼多。」他在衆參院圖書館翻查目錄圖片居然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圖書歌頌環遊世界自行車旅行。其中竟有一對夫妻自稱爲三人自行車來回橫貫大陸旅行冠軍。

斯塔斯本人是一位大學法律系講師，但會對自行車這個「人類發明中的英傑」表示過愛心，他曾騎自行車橫貫美國大陸三次，而他騎自行車上下班，每天計程十五英里。他的《不噪的轉動聲》也介紹了許多容易被遺棄的自行車文士軼聞；如托爾斯泰六十七歲時，爲了解除他七歲兒子的死去給他帶來的悲傷學騎自行車。Henry Adams 在他妻子病逝後，以騎車自慰，「因爲沒有什麼其他的寄托。」海明威在《太陽也升起》有賽自行車的長篇描寫，沙特和 Simone de Beauvoir 也深愛騎自行車。Bertrand Russell 在《記憶裏的畫像》描述他與蕭伯納騎車相撞的有趣故事。蕭被撞後沒受傷他大概心裏歸功於自己吃素的習慣。

編者覺得在忙亂的現在社會裏，自行車能幫助人們掙脫苦惱，得以喘息自由遐想的機會。這本不凡豐富趣味的集子也估計是斯塔斯騎車往返於辦公室時獲得靈感的結果。中國這個「自行車王國」也應該有相當的自行車文學，只希望有人去蒐集。香港不論是作家或讀者也只能望塵莫及。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

~~~~~  
《The Noiseless Tenor》: The Bicycle in Literature, James E. Sears 譯註 · Cornwall Books 紐約出版。

此書係由作者親自校對，如有修改，

請與譯者呢？

## 胎教獨白

### ——法拉琪的《給未出生嬰孩的信》

一般讀者只知道意大利記者和作家奧琳埃娜·法拉琪 (Oriana Fallaci) 有採訪政壇人物和著名人士的特異才氣。她勇敢、理智和直率的訪問記，不論是同鄧小平談論文化革命的功與過，或者向利比亞狂人卡達費致以激烈質問，法拉琪剛柔相濟、深思熟慮地正視和探討現代人關心的許多要害問題。法拉琪也是一個有才華、富於感情、文筆流暢動人的作家。她寫希臘政治家和民主鬥士（他生前是法的情夫）的「抒情傳記」《男子漢》，在文壇上博得了喝彩後，《給未出生的嬰孩的信》(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 以下簡稱《信》) 的發表，證實她不僅關心時代的大是大非，也入微地觀察了自我和社會，善於用小說這個形式和樸素的文筆單刀直入地寫出極普通且非常錯綜複雜的身旁世態。

前幾年，澳洲作家肯尼理 (Thomas K. Ennelly)，寫了一個由懷孕婦女胚胎敘述的小說《乘客》(The Passenger)，曾引起爭議和稱讚。法拉琪的《信》則反而是一個由懷孕的婦女通過同胚胎的「單方談話」敘述的故事。書中的「我」是一個有強烈個性和思想感情的職業未婚婦女。她懷孕之後，在欣喜之餘，又轉入沉思，「我」始終以那個可怕的問題自問：「倘若你不想出生？倘若有一日你責怪我質問：『誰叫你生我，你為甚麼讓我來到這個世界裏，為甚麼？』生存是奮鬥，我的孩子。生存是一個每天周而復始的戰爭，那些欣悅的時刻只不過是短暫的括號一般，為它們付出的代價也極刻薄……」她的「胎教」就這麼開始。盡管她自身閱歷坎坷，待人接物很現實，「但是我為自己的失敗、失望和痛苦流眼淚時，我的信念不動搖：困苦仍然比空無強。當我引伸這個思想到生存與否的問題，渾身的神經呼喊，誕生比空無好。可是，我哪可能讓你懂得我的思路？我這樣做不便僅僅為我一個人嗎？但我不願意僅僅為自己讓你來到這個世界，我也並不需要你。」

懷了孕以後，「我」因為沒有丈夫遭到大夫、藥店和相識的冷遇。自己的好朋友勸她不如墮胎，使她懷孕的男人遠遠躲避。老闆却操心他會在「我」的身上虧損資本。「我」手撫着放平胚胎微型的照片向她的孩子訴衷情。孕期不順暢，「我」患胎氣而被迫臥床兩個星期，但為了顧得自己害怕被佔取的精神和肉體的自由（此並不指性生活）「我」斷然決定按期為公司出差。結果，胚胎死亡。

上

苦

了她，而

大了

窮

還是

「我」在醫院臥病發高燒時夢幻所有跟她懷孕有關的人，包括胚胎，為死掉了的孩子開審問罪。

「我」跟胎嬰的「獨白」裏觸及有關婦女社會地位，男女關係，圍繞着生命和墮胎道德問題（作者是意大利人，書裏也涉及天主教），個人的思想和感情獨立以及社會倫理。這是一本完全自婦女的立場上寫的書，但對任何讀者都會有裨益，這正是因為法拉琪最後要通過死了胚胎的「我」告訴我們：「你要是說我不相信生活，孩子，你便是錯了。我相信它，儘管它充滿着罪惡，我仍然喜歡它，而且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付出所需要的代價去體驗它。」

在短短一百二十餘頁的書裏，法拉琪涉及了關係到現代人生孩子的基本道德和倫理。讀她辛辣而又閃耀着誠摯的作品，令人為之感動深思。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九日於京都

（《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Orana Fallaci著·John Shepley譯·Washington Square Press出版·一九八二年。）

## 電視——雜誌之間

電視的發明和普及，在五十年代被指責為「出版文化」，尤其是雜誌和定期刊物的死敵。美國的《生活》、《觀看》及其他有地位的暢銷圖片雜誌，在當時紛紛倒閉，無疑是在及時性和新聞性上搶不過電視所致。而從去年美國出現大眾「線路電視」（cable television），這個同白紙黑字勢不兩立的媒介，開始趨向於「雜誌化」。

作為一個傳統訊息的媒介，電視從來偏頗於簡扼、快捷、準確，除了日報，大多數的傳播訊息的印刷媒介，時間較為緩慢，其本身的形式也允許相當的專門化。現在新的錄像和電子技術，用錄像材料在幾十個不同頻道全日播放分門別類的「專門性」（special interest）節目。頻道的數量劇增，收看者選擇的餘地也就有相應的擴大。這個現象好比戰後日本雜誌業的突飛猛進，只要能夠在經濟上維持，甚麼五花八門的刊物都能夠出得了籠。日本五顏六色的刊物也好，美國新興的錄像、線路和家庭電腦的「電視式雜誌」也好，反正其弘旨無不在儲藏和流傳各種訊息，並且醞釀新鮮的理念。

雜誌因爲或多或少具有專門性和具體的閱讀對象，所以很適合於走上專門和細緻化方向。

至今已經播放的「雜誌電視節目」，有《金錢》雜誌贊助的談論投資、儲存和納稅有關問題的《貨幣事項》和消費調查性的專題節目。連《花花公子》月刊在主持七十分鐘的節目中，除了活動大腳和美人外，也有較一般「聊天性」的電視節目深刻並直率詳盡的訪問記（這些是發揮該雜誌出色訪問記的特徵）。不過，多數的刊物不希望簡單地搞電視自我翻版，而企圖借助於電視的專長博得更多讀者。

雜誌的「電視化」，將來可以廣泛結合不同的新技術（印刷、小型電腦、電視、錄像等）包含理念、形象和圖畫設計的手段傳播新訊息。這些手段的潛在力很豐富，雖然還沒有人掌握目前收看上述新節目的觀眾數字及具體情況，可以想像，在最近的將來，會有分曉。而「電視雜誌」則將通過家家戶戶客廳裏的屏幕向你進軍。

## 真實性

打開電視或收音機聽新聞，向耳朵眼睛襲來的經常是些異國及本港的壞消息。有人歎氣說：爲什麼只報憂而不報喜呢？在外邊工作一天，忙得團團轉，回家休息，想憑藉「傻箱子」（即電視）來鬆弛一下吱吱喳喳的腦筋，但這是妄想。那些新聞一播，連冷靜的人也感到這世界到處是千面埋伏似的。幾十年的報憂新聞手法，在一般民衆當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危機心理。說它牢不可破是因爲假設——而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有朝一日某一傳播系統別出心裁發出一連串喜訊，聽衆也許會懷疑這消息的真實性。甚至會有人想從中找出隱藏着的惡兆。

這種「天下新聞一般黑」的危機心理，從數月前成功發射並飛返地面的太空穿梭機就可略見一斑。在穿梭機歸來、貼在機腹的耐熱瓷磚尚未全部冷卻的時候，有人欣喜，也有不少人在喜悅中瞧到凶兆。穿梭機在地球軌道上滑來滑去，當然可以進行各項科技試驗，將可造福於人類。同樣，以穿梭機的高度靈活性，它在軍事上的用途亦會層出不窮。過去迷戀於科幻小說和電影太空戰的人，

說不定在不遠的將來會有機會親眼看到真格兒的太空戰。——到時仍得依賴傳播媒介給安排現場報導。所以，可以說，跟現代傳播媒介混熟了的人，在領教新聞訊息時，意料到喜中一定會報憂，而憂中往往無喜可尋。

當然一些驚心動魄事件第一次發表時，一般反應比較強烈。例如七十年代初，美澳等國軍隊在越南作戰，電視台起初採取慣用的「以喜掩憂」的方法，描述「支援軍」百戰百勝的威力，但隨着在美國掀起的反美侵越戰爭運動高潮的到來，幾個電視公司採用戰地實況報導，把戰爭的血腥、混亂，和士兵的恐懼、粗暴和野蠻行徑，通過電視屏幕，毫無修飾地向茶餘飯後扭開電視消遣的觀眾反映。迢迢遠方進行的殘酷戰爭的實質，被強加於電視觀眾。看新聞，不再是與己無關的他國人民苦難遭遇的訴說。戰爭，一利那間被帶到每個人安詳靜謐的家裏去了。主演這悲劇的不僅是一些「茹毛飲血」的外國人，而且是自己的兒子、丈夫、叔叔、朋友。搞那些慘無人道行徑的不是什麼野蠻人，而正是在自由和民主聖地生長的青年。

可怖的故事，殘忍的鏡頭，看一次或幾次會有毛骨悚然的效果；反反覆覆向腦子裏灌輸，恐怕效果會逐漸淡薄。越戰的現場報道，看多了就失去起初的「爆炸性」；時間長了，其他的電視節目和電影開始模仿新聞片的寫實手法，「以目亂綱」，觀眾把生活裏真實的東西，和娛樂節目裏的模

的

擬場面，混為一談。

逼真而如實地反映生活，無論是對「客觀」的新聞報道，還是對電視節目和電影，似乎是目前的一「視聽化社會」的普遍要求。近年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如《克藍瑪對克藍瑪》，《普通人》）就以其簡練純樸手法而著稱。但與此同時，觀眾對純娛樂性、故事離奇古怪的慾求增強了。在寫實影片獲得榮譽之際，像《超人》（第一、二集），《星球大戰》（第一、二集）等片，創造票房新紀錄。同樣，在中國內地的寫實影片《楓》、《天雲山傳奇》、《巴山夜雨》等片引人注目，但像《神秘的大佛》之類的「空頭」影片，在一般觀眾當中也有非凡的反響。常說「物極必反」，可能在時間空間高度壓縮的現代社會，才能夠出現諸事極不相侔而俱存的現象。這種現象該說很正常，也是當代社會的辯證法。

混在一起

## 踢死狗

重復

小時候常聽母親講一句蘇賴曼聖君的話：「太陽之下沒有任何新奇事物。」幾千年前，明君的卓見不應該有甚麼差錯，但在當今一日千里的現代化時代，神聖不可侵犯的神仙、聖人都得低頭承認落伍。驕陽底下出現的一個「新生事物」——踢死狗，即可肯定聖君名言之過時。

踢死狗?!難道在當時被處極刑的人們，頭上身上挨了民衆扔來的石頭，不會再有人踢他兩腳洩憤麼?若真有其事，踢死狗早就古已有之了。如果這麼理解，那就說明閣下「歪語」水平不十分高。香港現在是一個「歪語」四通八達之地。新式、油脂式及新潮式的踢死狗到處可見；難道連每星期六晚上出去踢死狗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手舞足蹈到底在幹甚麼?他們知道那就叫踢死狗，亦名狄斯高，或的士高，或的士夠格。

踢死狗是個「新生事物」，可以保證以色列的蘇賴曼王未曾看過，更沒有「踢」過。雖然這一個該被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列入業務範圍的玩意，在上古錄影不見，但它在裝錯馬達(John Tavola)

綜

及奧利菲中子彈(Oliver Neutron Bomb)錯亂的、到處留下劣跡之前，早就有人跳了。踢死狗本來是discotheque的簡稱，而discotheque則是一個放唱片(disco)跳舞的地方，曾在六十年代末出現。近幾年踢死狗東山再起，其實亦包含幾分懷「古」情緒在內。

前一個多月我到北京探友時，被誘入設於西單附近民族文化宮的踢死狗場。過去聽說民族宮孵出一個踢死狗，不料宮內藏有兩個！後來因為去了數次，才知道一個設在樓下彈球室、遊藝場和酒吧旁邊，一個是一樓的大踢死狗洞(亦係改裝舞廳)。在五十年代設計這個蘇聯式大黑洞的人，顯然沒預料到需要矮天井和充份擁擠的死狗，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會在那兒踢起來。據說前幾年，民族宮夜景熱鬧非凡。穿戴新派、舉止輕浮的北京油脂仔，一窩蜂地湧擁西單，躍躍欲試。

北京的踢死狗是件「新生事物」，自跳舞的北京青年數量而言，似乎越來越少。這可能是因為跳舞的新鮮勁近年來逐漸減退，亦可能是因為「三好」學生守則裏並沒有踢死狗好這一條，雖然，我以為偶踢幾腳死狗，準定是健身妙法(說不定也有什麼跟氣功能夠沾點邊兒的東西吧)，有助於身體好。不過拙見難以被採納。

踢死狗之興衰未必這麼簡單。這一陣踢死狗過後，說不定將來會有甚麼踢死貓呀，踢死老鼠之類的新玩意，誘人搖擺起來。也可能會有人同情被踢下水的死狗，而想把它踢活。但也許會有些人

，我估計

給

認為，等到目前跳飽舞足的青年上了點年紀，他們就大約會鼓勵將來的青年都跳踢得死去活來的死狗，而不准他們自己去創造抑或接受更新的东西。倘若真將如此，蘇賴曼王的名言，就會被證明是一個可懼的真理。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於京都)

## 「踢死狗」與雅樂

日前在京都上京區下鴨神社，看了一場雅樂演出之後，頗有感觸，想再談談踢死狗(Diako)。

雅樂亦叫宮廷音樂，是一千三百年前平安時代傳入日本的中國宮廷音樂，或稱國樂。雅樂演出，一般需要擁有二十幾種樂器的樂隊，比現在流行的四人小組樂隊麻煩得多，但又不及西方交響樂隊龐大。樂器都是中國人所熟知的：笙、箏、琵琶、各種笛子、大鼓、鞀鼓、箏篋等金石絲竹，所有的「樂之器」都堂堂登場。吹奏起來，給人以「孔老二」禮樂再現的感覺。除了管絃之外，雅樂也包括舞蹈。這些舞蹈分左右二方；左方表演者的服裝，以紅色為主，是從中國大陸直接傳到日本的东西；右方服裝多為青綠色，是高麗舶來品。雅樂，已經雅到一般庶民無從得享耳目之福。本來設在中央政府治部省雅樂寮的雅樂，到明治維新時只靠幾個家族才秘傳下來。

明治初期，雅樂三大流派成員（所謂京方，奈良方和大阪方），均奉召去東京，賜以官銜。從此之後，「家元」祖傳的秘密公開於世。新設立的雅樂局雖然屬於國家，但雅樂的表演仍為宮廷服

務，亦用以招待國賓。在本世紀初，京都和奈良幾個民間團體恢復了雅樂活動，致力於雅樂的介紹與普及工作。我在下鴨神社所觀賞的雅樂，是一九一六年組織的平安雅樂會的活動。

在中國早已失傳的唐代音樂，倒在日本古都仍能目擊耳聞，這又是日本人珍惜文化、敬仰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驚人證明。難怪京都大學古日本史教授、雅樂專家上田正昭說，雅樂是一個「活的正倉院」。不過為這個有蹦有跳、有聲有色的木乃伊化的雅樂驚歎之餘，我們是否該想一想其保存如此完整的原因及意義？我想應該。

對建都於今日京都附近的平安朝宦官而言，李唐的朝廷是文明和進步的所在。樂於學習和模仿他人長處和優點的日本，就把唐朝的政治制度、禮服、儀式、音樂、語言一切形於表層的東西，一古腦地搬到平安京來，扮演文明戲。至於精神方面的東西，雖然也吸收了不少中國的養分，但基本上是依然故我的狀態。平安朝廷遵循孔子的教義，把國樂當做國家基石之一，加以嚴密保護。無論國家興衰，雅樂足足保存千餘年之久。

當然，唐代溫文爾雅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到了當今以變幻為經的世界，用處未必太大。我自學校，步行去下鴨神社的路上，遇到幾位共去享受雅樂的日本婦女。她們說生長在京都，但從來沒看過雅樂。古代文明而高尚的東西，早由 Christian Dior 和 Pierre Cardin 的化粧品和服裝所代替。在

處於

盡是些個

賭

化身

等

青年當中，文明和雅樂扯不上多少關係。陳腐的踩鷄脖子式的音樂，和緩慢得令人沉沉入睡的舞蹈，怎能說是文明？現在不是肅靜地咀嚼雅樂的時代，而是自我參與，平等享受的時候。在這點上，「踢死狗」頗能體現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也是一種新的文明的標誌。它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在千秋萬代後像「活的正倉院」的雅樂那樣屹立於人類文化羣衆之中？以目前「踢」法之迅速變幻、音樂之朝「調」夕改而言，不敢在此妄談。

雅樂本來是不落俗套，雅人專享的東西。也因此不得民心。既然高雅肅穆的音調自從唐代以來，除天皇招待外賓讓紅毛們同啞巴分享黃連之苦以外，恐怕就是自封的「文化老饕」和我這樣好奇心勃勃的外人所能獨賞的了。說它仍免於滅跡，只是因為它奄奄一息之狀頗有獨特風趣。「踢死狗」自一開始就較雅樂更具普及性，民衆性，但正因此而囿於民衆常變的喜愛範疇，所以總有一日會受到另一種時髦事物的排擠，而終於被揚棄。這個自生自滅的規律誰都懂得，可怪的是，偏偏有一些人討厭自然規律的周轉。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於京都)

進行

而云

亂糟糟

## 踢死狗與時差

「踢死狗」(Disco)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而必然在時代漸進、社會演變的過程中改變而終於消逝。回顧小廝經歷的短暫二十九年，世間的變幻多得叫人暈頭轉向，不知所從。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之中似乎沒有任何東西不在朝是暮非、更替、否定、自我否定之中。在這種諸事無常的世界裡能夠找到靜止不變的東西極難。

但是，前幾年的中國好像就是這麼一個靜止的天地。說有連續不斷的政治波動，世人政治命運的起伏，個人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一方面。不過，作為一個社會整體來講，中國已經自經濟、政治和社會上凝成可怕的靜止狀態。不必說，這幾年來過去的靜物存在已在摧枯拉朽之後歸為飯後茶餘的怪談——像所有其他怪談一樣在驚悸、恐懼和笑聲中講。靜止亦成為運動，連過去頑固不化的東西漸漸開始挪動起來。可能是為了促進這個新的「運動」的普及，西方的「踢死狗」連滾帶踩地也被一部份人接納進去了。

「踢死狗」之被引進，或說其竄入內地，我想往後可作為「四化」野史的一個小題目來研究吧。憑記憶它好像在長江南北，即北京和廣州不約而同地滾動起來。在北京有使館留學生和外國商人，遊客先在密室暗舞，後來官方動情決定撫慰，施以數點讓他們大放「獠步」的場所。如所料，泥沙俱下，當地青年亦情不自禁地踢起死狗來了，我還記得中美建交那陣一日千里的時候，美國使館在國際俱樂部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大約是鷄尾中山裝酒會之類。主人們招待賓客在舞池裡踢死狗，有幾位身穿人民服戴眼鏡的中年京官踢得個不亦樂乎，您若不信有相片為證。

在羊城呢？不外是港澳同胞、商人、遊客等等所引進的舞姿。回鄉的人大約為了消遣攜帶了些踢死狗音樂磁帶到廣州及鄉間，些夢寐以求入時貨色的人（未必只限青年）如獲至寶，終於算取到了經了，一眨眼廣州便由踢死狗舞震得差點越秀山上的那五頭羊也動蹄跳起來。當然如今時過境遷，跳往二〇〇〇年的勢頭大減，除了東方賓館等接待外邊客人的飯店，很難在社會上踢個死狗。交誼舞之流的出土革命文物舞蹈仍有得踢，但據說，舞監們不在場時，年輕人還是喜歡「與狗不交誼舞」似的舶來貨。

南北夾攻，以舞征國已成爲歷史了，我一向是跟在歷史火車頭的屁股後亂轉，所以很遲才去北京的踢死狗場，但不是單槍匹馬。我踏入舞廳是跟去品嚐一番北京大踢死狗場味道的幾位友人。

其中有影片《原野》的導演凌子，主角之一劉曉慶和演大興的柳建。其實，我們却聽說舞廳會有美國的一個什麼合唱團在那兒表演，掃興的是，我們在他處聊天時間太長，到文化宮時也七團的譽為精采的演出已經完了。但大家都覺得，既來之則安之，坐落於置在舞池境外的桌邊，一邊喝可樂，一邊拚命在踢死狗的一羣人大多是香港的遊客，何以為證呢？僅僅自其聲音震耳，港派動作和裝束之鮮艷，就可毫不遲疑地斷定：「委實港澳回鄉團哉」。雖然他們舞姿不十分瀟灑美麗，且對加強

冷落的舞廳氣氛，他們倒十分賣力氣，並獲相當熱鬧的效果。另外，也有一些日本使館工作人員跟我們一樣袖手旁觀；大約在物色人才吧——我當時心裡想，池子裡也有幾名日本年輕遊客，中東、非洲留學生，幾位身份不詳的歐洲人和個別北京人。音樂是那裡檢起的錄音磁帶，錄的一些八零年蘇聯奧運主題歌、《莫斯科》、敝國女歌手中子彈女士在那部最拙劣影片典範《Yanadu》裡哼的幾首歌等。總之，整個場面有些不對味，而曉慶女士看了半天就用四個字概括而括之：「俗不可耐」。此後不久她和一幫人拂袖而去，留下我、凌子、羅丹（「原野」的攝影師）和幾個其他的朋友。我估計很難猜出凌子女士去踢死狗的妙處何在。在北京在某些人面前一提及「原野」準會聽到一句：「你知道『原野』的那個導演，在文革前挺時髦，老開派對，常常跳的士高！」說話的人態

度之嚴肅、語氣之莊重，夠使人愕然。可惜，這話對我講時就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極簡單：若當時中國的一些人已跳踢死狗，懂得開新式派對，我就得向這些舞蹈預見者叩頭，因為作為一個流行舞式，踢死狗是七六年後（即十年文革收場後）才在西方跳開。六十年代的中國那能有呢？若說凌子在六十年代跳舞，恐怕跳得頂多是狐步舞之類的「古典」作品。

那天晚上凌子沒踢死狗，她好像在舞廳最注意他人跳舞的儀態、表情，大約是她這導演的職業病。不過她有一次興奮地跳了幾步藏族舞，也完全可與過去到首都機場「熱烈歡迎」國賓的小中學女生相媲美。

把七、八十年代的踢死狗硬塞到六十年代裡去當然可笑，封建時代的至寶傳到現在而繼續被人採用，固然可笑，時而可畏。

## 漫話漫畫

「漫畫」很難說出一個定義；連「漫畫」兩個字的來源都不十分明確。據日本漫畫研究家清水勳考證，「漫畫」一詞始見於江戶時代浮世繪漫畫大師英一蝶（一六五二年至一七二四年）的畫集《漫畫圖考·羣蝶畫英》（一七六九年刊行）。之後兩年，鈴木煥鄉著的《漫畫隨筆》隻字不提漫畫或繪畫，但在書的序文裏有這麼一句話：「瀛莫有鳥名漫畫，終日奔走水上撈捕小魚而食之，猶不能飽……余性琴棋書畫弗靈，凡百技藝無一所能……唯有讀書……終日汲汲，唯多貧，如所謂漫畫……」○「漫畫鳥」指篋鷺，而作者自喻為食而不飽、到處涉獵的「漫畫鳥」，以說明他的筆記內容不拘一格，包羅萬象。自此之後，「漫畫」也就逐漸用以指漫畫繪畫。

清水勳另外舉出一個「漫畫」的出典，見於一七九八年梓行的北尾政演所著的畫冊《四時交加》序。序云：「余嘗學丹青於紅翠翁以為業，近頃換移其業鸞煙包煙管。身處世營紛冗之間，志在江湖閒靜之中，時時偷閒讀書，棲遲于東都要路，罔朝罔昏，觀貴賤混駁士女老少綿綿絡繹而交加

也。平常在舖中凭梧，偶漫畫貴賤士女老少等交加于大路……」○

繼英一蝶之後的「準浮世繪漫畫家」葛飾北齋，在一八一四年發表十四冊《北齋漫畫》，其中的作品多半描繪世相和人物百態。這套畫冊和同年京都的合川珉和刊行幽默畫集《漫畫百女》，是諷刺與遊戲兼備的漫畫正式流行於世的開端。但「漫畫」在江戶時期末僅僅是從藤原代延續使用的「鳥羽繪」、「百鬼夜行」和「百面相」相互代用的詞匯。及至明治三十年代（十九世紀末）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為《時事新報》撰寫「時事漫畫」專欄，並先後約請今泉秀太郎與北澤樂天繪諷刺時局的漫畫，政治漫畫才得以獨立存在。縱然如此，到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漫畫」才徹底取代了「笨拙」（Punch，源自英國十九世紀中期創刊的諷刺刊物）一詞。◎

中國漫畫的歷史雖然比日本和歐洲短得多，但在清末出現了諷刺畫和寓意畫。這些抨擊時政的石印畫，一方面繼承了民間年畫和文人遊戲畫的傳統畫風，另一方面受到國外漫畫的影響，因而奠定中國漫畫的基礎。◎近幾年來中國漫畫甚多，漫畫展覽已經納入正規的美術活動，也為衆多的人們所喜愛。除了報刊上大量刊登新漫畫，人民日報社也出版《諷刺與幽默》週刊，而且去年底美術出版社開始印行由傑出漫畫家方成和沈同衡主編的《漫畫選刊》。這份刊物第一輯登載着一九八二年全國漫畫展覽作品選（共百餘幅），內容有黃苗子談米谷和他的政治諷刺畫的文章，以及關於德

國十九世紀漫畫家布什 (Wilhelm Busch) 的作品，並附有他的連環漫畫。不過我覺得，該刊封面第二頁漫畫家畢克官的《漫畫掌故：我國最老的漫畫集》一文，有很特別的意味，因為這篇介紹清末寓意畫集的短文，只不過是將在今年出版的畢克官專著《中國漫畫史話》一書的一個精采片段。

清水勳專心致志研究日本漫畫已經很多年了，他是日本唯一研討這個題目的人，著作很多，曾引起日本國內外漫畫家和漫畫研究者的注意。中國的漫畫多年沒有人認真研討<sup>④</sup>，畢克官的破天荒新作，將有助於讀者瞭解中國漫畫（不僅是政治漫畫及諷刺漫畫）的全貌。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京都）

~~~~~  
①見《江戶的漫畫》（日文），清水勳著，文藝春秋，東京一九八一年，一七二—一七三頁，《探討「漫畫」一詞的起源》一節。

②同上，一七六—一七頁。

③同上，一七八—一八一頁。

④見《貨郎集》，黃苗子著，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一九八一年，二〇—二四二頁，《漫畫回顧》一文。

⑤只見到黃苗子所著的《漫畫回顧》。這組短文原載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初《漫畫》月刊。另有豐子愷的一些精闢論點，皆散見於期刊作品，似不足構成中國漫畫研究專著。

看書談廣告

齡

在東京有書癮的人，無不被神田區神保町「書城」吸引。癮小者信步前往，每週一次；癮大者則每週遊數回書店。我自己本來癮大而錢少，時間也很有限，結果每星期只能到神保町去一趟；去了也老是那麼幾家。除了偶爾去看新開的三省堂書店（據說這家擁有上百萬冊圖書的大書店，正在同八重洲的圖書中心角逐，有爭奪全日本最大書店桂冠之意），或專售浮世繪複製畫的書店外，每次到神保町的齡蘭街，就一定往內山書店跑。

這個內山書店就是內山完造先生過去在上海經營的那一家。他十幾年前謝世以後，書店就由他弟弟接辦。書店仍舊專售中文圖書，以及有關中國的日本書籍。我每週去這書店，主要是爲了看看有些什麼新的中文書刊，最常買的是《諷刺與幽默》（《人民日報》增刊），《市場》及幾份小說月刊。在內山書店，每次至少要瀏覽一小時（日本書店很文明，讓讀者長時間站着看書看雜誌，不加干涉，亦不催你購買），然後買幾本打道回府。但這一「回府」，最快要坐（其實是站或擠）一

個多小時火車。好在每每手裏捧着一小包書刊，任意抽出一份，就可以消磨時間。看一份《諷刺與幽默》不消五分鐘；然後就折起《市場》報來。

《市場》是中國這幾十年來出版的頭一份大衆化的「情報報紙」。它給讀者提供有關新產品的資料和知識外，亦載有分類廣告、讀者來信等。《市場》的確是一份形式新鮮，內容豐富的報紙。

如能出版十份英文的市場報更好

《市場》報刊登的大部份文章，無疑都爲讀者所歡迎。對幫助人們理解和利用廣告及商品介紹方面，也起着相當的作用。我看《市場》報，主要是想瞭解「消費思想」在物質追求慾和佔有慾長期被禁錮的中國，有些什麼影響。坦白地講，今年初到廣州去訪問香港春田社朋友給廣州青年工人及待業青年創辦的「現代英語中心」時，我看到很多廣告，難免又引起兩年前「拿來而拿不到主義」的念頭。

但時代在演進，中國內地的廣告牌、廣告畫，除了畫滿外國商品廣告外，現在也有許多國內商品的廣告。後者當然不屬「拿來而拿不到」之列，因爲那些液壓掛車、傳動軸、各種機床、機械鏈條等等，決非「拿來」之貨，而却是本國國產良品，也許可算作產出而買不起商品。這樣做，雖給廣告公司賺些油水，對生產者本身及一般消費者益處甚微。

批

的机

信

信息

一般民衆其實不必先看廣告才決定要買甚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廣告的宗旨，並不在於爲消費者提供有關新產品真實資料或情報，而在於通過動聽的音樂，美麗的色彩，引人的畫面，誇張的言詞，以愚弄人們的理智，使廣告對象在心理上對那些宣傳的產品產生佔有慾。十年前被提出的生態、空氣、海洋、河流等等污染危害問題，已受到普遍重視（中國也逐漸認識到工廠廢物的危害性），但物體污染主要只能毒害肉體，而空虛、誘騙性的廣告，倒有破壞精神、歪曲心智的效用。這種「廣告污染」已經泛濫於海外，看樣子也向中國內地衝去。

以外國煙酒廣告（尤其電視廣告）爲例。壯漢駿馬，色彩艷麗，又有自然風光，動人音樂……，這一切難免要把觀衆打動得不是聲淚俱下，就是煙癮大發，坐立不安，非趕緊跑出去買一包不可。這才是現代化廣告的要旨。《市場》報登過一篇文章，講日本「廣告世界」。不錯，日本是一個廣告世界。看十分鐘電視，保證有五分鐘左右是廣告。有時同樣一個廣告，還要在這五分鐘內重覆一遍。在外邊走路，很難遇到一個沒有貼滿廣告、招貼的電線桿；上電車時，站着握的扶手，也有小廣告。「廣告世界」！令人窒息的廣告瀚海啊！貶低古典音樂名作，歪曲破壞審美標準，玩弄訛用的語言，哄騙良民，毒害少年，這些侵襲感官的廣告，竟被稱爲「廣大消費者的耳目……羣衆生活離不開的廣告。廣告像條綑帶把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引自《市場》）

何在

沒錯，不知好歹的市民若想躲開廣告也是徒勞。廣告的甜言蜜語一天到晚往人們耳朵裏灌，已把男女老少糾纏得難以脫身。說的是日本，但「現代化社會」皆如此。中國剛剛開始接觸現代的廣告和商品推銷方式，也許要對國外廣告業有充分的理解和清醒的認識才好。

部

半邊字

學習初級漢語時，方塊的漢字最晦澀也最富吸引力。頭幾天上課老師講了一通漢字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字。每講到其中的一項就在黑板上揮舞粉筆勾勒出奇形怪狀的東西作為範例來說明漢字的奧妙。聽老師講，第一課要背熟七百餘字。大約在頭學期沒被嚇跑的學生，多半硬着頭皮唸下去了。

漢字六書中最「賜恩」於初學者乃是形象字。甚麼日、月、木、水、大、人、上、下之類的字，一看便記，使人覺得學習漢字同畫小畫一樣，蠻可愛。但，好景不長。剛背了一堆單字，壯足了胆，認為用不着下多少功夫便可以吞嚥一本厚厚的「康熙字典」。不一會兒，老師便講解會意，轉注和假借字，得意洋洋的學士們囂張一時的威風便橫遭挫折。眼睛上蒙住了的有色眼鏡瑣瑣落地。到現在為止，我自己有時候還會用初戀的那種甜蜜的心情，回憶起我們學習獨當一面的象形字的情景。漢字實在太妙了。班裡面有幾個婦女解放運動的激進份子，在老師教「男」和「女」二字憤慨甚

的呀

焉：豈有此理！田中力是個男人，絆着手腳耷拉着胸部是女人，連文字都滲透着一股大男子主義的惡意。其實，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僅限於漢語一種文字。英文裡的 man 有男人女人兩個意思。mark and (人類)泛指所有的人。殺了男人或女人同樣說 homicide。西方的神話和聖經舊新約也充滿着「男人先行論」的調調。

「男」、「女」二字只不過是漢語裡「男女有別」思想的冰山棱角罷了。

光學幾個含有貶義的單字，就夠把婦解殘餘份子氣得死去活來。奴、妾、奸、妖、婬、姪、嫉、妒、嫵等字都是「女」字當邊，而其中沒有一點女尊男卑的影子。北京的一位朋友來信說，她前些日子遇見了一個研究英文裡用跟女人有關的詞句謾罵男人的語匯。據這研究者講，「大有話在」。北京那友人就似乎沒有研究過中文裡有「女」字邊旁的字。漢語輕蔑婦女的字和詞無疑大量存在，但漢語裡許多摩登職稱都比英文「同性」(unisex)多了，比如，「演員」，英文本來只有 actress 或者用 actress，現在男女稱法上要拉平綫，我的母語就生了一個怪胎來適應風尚。乃 performance artist！中文的主席多簡單！英文本來只有 chairman 一詞，要改有人認為全用 chairwoman 過於激進，便採取折衷的方法，現在用 chairperson。聽說去年 Fogel's Thesaurus 的新修訂本，也未免災於男女平等積極份子的淨化。

中

之作

說中文裡盡是些貶低女性詞匯却也言過其實，難道好、姣、妙、嫵、妥、娓娓等不為婦女爭口氣麼？

嬰兒雨

電子遊戲無疑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發明。咱們享有電子遊戲的人簡直無法想像沒有它之前日子是怎麼過的。沒有玩過它的人也白活一輩子，真難算得上是活着的人矣。

電子遊戲太得人心。前些年到香港街頭巷尾幾乎走半天也聽不到激光槍、大炮或其他五花八門兇器的嘶殺聲，多麼寂寥，掃興極了。好了，烏雲滾滾，黑夜暗沉，黎明的曙光不久即可照耀人間。電遊（與電椅皆同，但無致命之招）不過眨眼的功夫就創建了新的人生。此豐功偉績那能由我拙劣的文章得當作評述？

電子遊戲中心、店、吧、攤子等等，現在無所不有，低頭不見，抬頭見，而不用你耐着性子熬到星期日去禮拜，白天黑夜，不夜城得讓人步跨門欄掏錢解癮。無愧是民主、自由時代，電子可真正造福於人間。

電子遊戲的誕生當時依賴比四·一·一稍稍兇惡的宇宙侵略者。大概是因為射殺非人的東西更容易

有形體

激發男女兒童的血性。沒多久，大家想開了，對同物的殺戒也跟着大開；電子遊戲的屏幕上凡是屬於衆生都來了，與之較量看誰能誘誰入甕大煮一通。

電子遊戲真不惜人生，對它來講四大皆空，生死如一。日本的機器素來善於取經於人，精益求精，最後有所發展，有所創新。遊戲機在繁殖延生過程中孳生了一個曠世無比的「兇器」：電子屏上出現一座多層高樓，最上層着了火，煙火彌天。最高一層的最靠邊兒的窗口可見一個襁褓裏身的嬰孩，險些要烤成人肉宴。樓脚有一幫救火的人，手裡伸着床單叫那個嬰兒跳樓救命。嬰兒應之，狗吃屎地往地面掉，救活了算你一分。不幸，嬰兒亂來跳遠些，床單及時挪不過去，那麼喃喃學語者則要嗚呼哀哉。且慢，不用太過悲慟；嬰兒摔斃後當場擲下皮囊變爲天使，往上帝的懷抱飛去。算你輸了一分。在英國防止虐待動物運動歷史已久，這個殘忍，無視嬰權的機器上市以來，雖然玩它的人非常多，也有個別正經佬投訴各報提出抗議，很有防止虐待嬰兒協會的勢頭。

電子遊戲發展前景似錦，竟有些惡毒心腸的人企圖把它扼殺於搖籃。

但居然

成立

抽

時間的可塑性

總覺得中國內地同地中海某些國家一樣對時間的概念有一種特別的分寸感，或者，也許該說「尺寸感」。因為對時間的掌握與我自己從小灌輸的習慣就寬宏大量許多。

常說西班牙人老以「a mañana」(明天吧!)來表示對時間的放任。意大利人嘴巴上的功夫略爲嫺熟，往往用「pronto」(馬上)來敷衍急性者的哀求。到了中國這個連古人有「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感歎的國度用不着這樣唬人；反正想辦個甚麼事誰都清楚，最快也得耗上「半天」的勁才行。其實，澳洲人有時說做個什麼事就用不着「a sec」(秒鐘的簡略)使得，一般利那間做不到，但即使如此也不至於需要「半天」的時光就是。

時間概念之相異不僅表現在這些短暫時間用語上，連描寫人生的每個階段的用詞，雖然詞義跟英文或日文似乎一致，但在實踐中差異可不小哩。

舉個例子來說明吧。前些時國際電影節來港佳賓中，有一個由十個中國導演和電影工作者組成

論

輸

的觀摩代表團，電影節開幕後不久，珠江電影廠的一個朋友給我來信說，其中有一位青年導演，希望我找他談談。收到信的那天晚上，正好在大會堂碰上該團的一個頭頭，他給我介紹這位聞名半天的年輕導演。「年輕」麼，本來在我腦子裡有二、三十歲之間的含意，但結果這只不過是敵人的管見而已。當時在帶隊的招呼之下浩浩蕩蕩地走到我跟前的丁導演，居然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份子囉！那轉瞬間（我眨了半天眼睛）我確實有了那麼一點不知所以然的閃念。幸而記憶細胞不辜負重望，我想起前些年的流行語言：甚麼都給就誤了足足十年。就誤了麼，這麼說連驅體的生長和衰老也都該往後挪他那麼一個年代吧。

說挪就挪。你在海外度完少年期可以到中國來重度童年，反正二十歲以下的人幾乎都給大人哄成小孩。自二十歲至四十幾就可以享盡青年人的悅心稱號；中年自四十開外的年齡開始，但您還得過了六十多而不惑，留長鬚才可能摘掉「辦事不牢」輩份蔑稱。再往下，姑且不必贅筆；總之，到大幹一番事業。

青春啊。我剛剛二十九。照小國的惡習我早已自「青年」踏入引向「中年」的迷茫分界區。可來到中國仍稱得起年輕人，並可以同四十開外的年青導演以「老小」相稱。你們諸位大明白人能

儿 當時如陳

我很佩服

道破這個理者，無非說是「十年就誤了」，或「要我解釋，得讓我慢慢來」云云的話。

這是我慢來

心味一套

別了，你手裏已高（生）理，裏也
病，別在什麼時候，你就可以來个

的觀摩代表團，電影節開幕後不久，珠江電影廠的一個朋友給我來信說，其中有一位青年導演，希望我找他談談。收到信的那天晚上，正好在大會堂碰上該團的一個頭頭，他給我介紹這位聞名半天的年輕導演。「年輕」麼，本來在我腦子裡有二、三十歲之間的含意，但結果這只不過是敵人的管見而已。當時在帶隊的招呼之下浩浩蕩蕩地走到我跟前的丁導演，居然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份子囉！那轉瞬間（我眨了半天眼睛）我確實有了那麼一點不知所以然的閃念。幸而記憶細胞不負重望，我想起前些年流行語言：甚麼都給就誤了足足十年。就誤了麼，這麼說連驅體的生長和衰老也都該往後挪他那麼一個年代吧。

說挪就挪。你在海外度完少年期可以到中國來重度童年，反正二十歲以下的人幾乎都給大人哄成小孩。自二十歲至四十幾就可以享盡青年人的悅心稱號；中年自四十開外的年齡開始，但您還得到了六十多而不惑，留長鬚才可能摘掉「辦事不牢」輩份蔑稱。再往下，姑且不必贅筆；總之，到過了花甲始而抱才而遇。時刻生理衰老症一來就返老還童，任意洩出自二十幾歲警在肚子裡的氣，大幹一番事業。

青春啊。我剛剛二十九。照小國的惡習我早已自「青年」踏入引向「中年」的迷茫分界區。可來到中國仍稱得起年輕人，並可以同四十開外的年青導演以「老小」相稱。你們諸位大明白人能

道破這個理者，無非說是「十年就誤了」，或「要我解釋，得讓賊慢慢來」云云的話。

也

當時如夢

或很很發現

的

這是我聽了之後

意味一套

到了這年，我已高（？）生（？）意（？）
知（？）不（？）知（？）你（？）就（？）可（？）以（？）來（？）

外人狩

題目怎麼又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歪語」——「外人狩」？比上回「踢死狗」難懂得多，搞乜鬼嘢？

請先勿動怒，「外人狩」這個詞並非憑空臆造，而是有案可查，容我慢慢道來。

「外人狩」一詞基本是日文。外人就等於中國人泛指非黃帝子孫時所慣用的外國人。狩，指狩獵，但沒有狩字原有的季節性（翻查辭書後，發現狩特指冬天打獵）。狩的日文發音是 *shu*，作一般名詞當打獵解，但作為詞尾發生音變，發音為 *gari*，有觀賞（紅葉狩，係秋季戶外活動）、採集（松茸狩，雨過天晴時的樂趣）等意。「外人狩」（*gaijingu*），是筆者小腦獨創並在此隆重介紹。它是遍佈遠東的業餘活動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東南亞不約而同的出現；在中國內地十年思想混戰後的大都市，這個活動的發生率漸高，參與人數也日益增多。

到底這個外人狩是怎麼一個狩法呢？我最好從被狩的角度，作一介紹。上星期天我去離京都都不

庚

道

的詞兒

遠的奈良市，看日本戰國時期著名禪僧畫家雪村的一個展覽會，趁雅興之餘，又到市內用膳，然後沿着市中心要嚮往東大寺一帶走去。這是日本古都「大和路」的重點遊覽區域。日本和外籍遊客，旅行的中學生，本地市民，絡繹不斷地在那兒往返。我步行至市美術館和興福寺之間的人行橫道，信步往前，突然看到幾個穿德國第二帝國時期學生服的初中學生，他們之中有一個似乎是個小頭頭，跟我打了個招呼。我窺視他那反常的臉，紅一塊青一塊，不知是怒還是羞，瞬間他清了一下嗓門，用自己也不信能講得通的英語問我：

「Where are you going?」

我不好意思用中文或日文慣用語「到那邊」（*chotto asoko made*）的英文對等語回答，更不想置之不理，為初學者潑一大瓢冷水。所以我說，我準備到春日大社和東大寺一帶溜躑一下。我這話原來是對跟我說話的男生說的，他却給走在他旁邊的女生作了個手勢，她接着告訴我：

「We are members of the English club of Tenri High School. We want to talk to you.」（Tenri: 天理初中，在奈良縣天理市）。

兩句話講得相當滑溜，但他們好像在用英語跑接力；因為我說了一兩句話後，那位大功告成的女生，就向尾隨我的小隊伍後邊的另一個男生急促地啾啾嘴，叫他跟我對話。他無疑聽到我和他

絕

畫

ちやんとあそびまわ

話

的同學的交談，但是他不能在我步行方向問題上刨根問底，又由於第一個學生已經搶光了他預備好的，就簡單地問：「Are you going to Nara Park?」

不料，回答還沒出口，那接力棒又被臉紅耳赤的第一個學生接過去了，他就開始向外國人提出千字文式的問題，即：「君何國人？何都市？在日有何貴幹？年齡多少？……」，宛如拷問，這樣，雙方的心情都不怎麼暢快。說時長，那時快，在興福寺之小金剛百問百答比賽還沒進行多久時，我發現我們已經走到博物館前。天理中學英文班幹將們已經表示他們去遊奈良公園的本意，我就借此告別，並說我要到東大寺後面的正倉院去看一看。他們大概覺得狩的外人不夠健談，也許我的稍帶澳大利亞音的英語沒有美國大哥們的好懂，反正他們臉上都露出掃興的表情，在路口同我分手了。陷入狩阱，我好不容易脫身而出，揩掉頭上汗珠，暗中還唸了幾聲阿彌陀佛。

我不不高興地奉陪這幾個好學的青年，並非出於心靈的狹隘，我其實跟其他被迫被獵動物一樣，能掙脫獵人佈置的圈套、陷阱，死裏逃生，智取人生自由，自然感覺到輕快。不過那天好景不長，沒走幾分鐘路，就又被兩位打扮成高爾夫球選手的日本男子截住。他們也在同一天玩樂，又想在蕭索的秋景裏以狩外人來消遣。我呢？剛剛復蘇的遊興，又見劇減。無巧不成書。這兩位仁兄也是天理的驕子，但他們一知道我會點日語，就放棄外人狩的嚇人武器——英語，改用日語跟我交談。

興高彩烈

道

結果不

很快就明白我被誰人「截狩」。他們是明治維新之前在天理開山的天理教信徒，想給我介紹教理，請我到他們本部進一步了解他們這個宣揚博愛、和平的新宗教。幸而他們大概整天在郊遊狩外人活動中已經疲倦不堪，我陪了幾句客套話，就溜之大吉。外人狩，並不是日本特有的娛樂。在中國，外人狩早在「文革」初期也出現過。

今年夏天北京小住期間，記憶最清晰的一次是在外國朋友雲集的王府井，我在新華書店門口的樹下等一個朋友，等了二十多分鐘，無聊得沒法子：就到停在我附近的冰棍車去買一個消悶冰棒。懶洋洋地靠着馬路的欄杆，吮食那根甜死人的冰棍。站在我旁邊的一個二十來歲青年，就用很流利的英語跟我聊起來。他雖然顯得有些緊張——也不只是因為他對他的外語缺乏信心，他不像奈良的中學生那樣人情不足市儉有餘：「啊，我抓了一個『老外』，我現在要好好地利用你練習我的外語」。不過，外人狩總歸是外人狩，我也不想再唸一遍千字文，假託我的朋友來了，就竄入書店。估計讀者皆是中國人，所以大約沒有甚麼外人狩的經歷。但因為港澳同胞在內地許多人眼裏一律是外國知識智囊，就可能被狩，他們的感想如何，希望今後有人撰文一述。

這篇東西可能把外人狩講得不公道。其實我寫的要旨不在於反對外人狩。這個帶有學習與交流性的狩獵並不是件壞事，而在日本和中國是個有意義並且不應被制止的活動。我只是從一個獵人

過

同

(我也搞過外人狩)和被獵獲無數次的人的角度來講幾句。獵人應當先懂爲人之道，不可把瞄準的對象視爲禽獸不如，而且用冷漠的感情和勢利眼，對待他的獵獲物。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於京都)

戒煙

翻看近日報紙，我的注意力被一則不顯眼的消息牽扯住了：「英國進行全民戒煙日」。據報道，英國八百萬吸煙的人當中有五百萬餘名將在這個忌日戒煙一天。英國煙稅高，再加上近年來「吸煙有害」的宣傳，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仍然抽煙，比二十年前百分之七十的吸煙率低得多。

戒一天煙又怎麼樣？據估計，五百萬「煙鬼」在這一天斷癮的有二十八萬多人。決意不重蹈覆轍麼？這是否一種「狗對糞缸發誓」之類的癡想？暫時不得而知。不過，在我相識當中（甚至包括我自己以內），煙不離手，屢誠不改的頭顱藏於煙霧中的人，個個忽而悟道似的，痛改前非，與煙斷緣。其故安在哉？我頭一次「從頭到嘴」抽了一支香煙是在京滬火車上。我到北京過「五·一」節，五月四日那天返滬。當天正好是我二十一歲的生日。跟我同擠硬席臥鋪的乘客，在向我問個不停的「千字問」以後，發現了我的生日就往我手裏猛塞糖果瓜子。其中一位中年女幹部還向我遞過一支煙，說是「內部弄來的好東西」——雲煙。我當時到中國不很久，哪懂得甚麼「內部」「外

中

咱們

我們真的能下定心

的

部」，反正那包煙確實比一般同學抽的高級得多，怎麼謝絕都不行，第一回嘗到中國人的「客氣」的「苦頭」。最後無奈，只好低頭甘拜下風。

那一支雲煙並沒有使我隨波逐流抽上癮。當時的中國可不是甚麼有潔癖者好受的地方。男人無論年歲幾乎都抽煙，也許在心事重重的歲月裏以吸煙解愁。不管是甚麼原因，我的同學和朋友都抽得癩己而嗆人。一伙人圍坐高談闊論，或是打撲克說笑話，我往往給敵眾我寡的吞煙吐霧的傢伙燻得迷迷糊糊。起初我並不氣餒，但時間長了，我開始有所考慮：人家都在抽，滿屋子都是煙，我每一呼吸就在「分享」他們的「排泄物」，所以我也間接地在抽煙，只不過懂得其弊，未蒙其利而已。慢慢地，特別是到了東北，自己散心解悶的需要益增，我就不再謝絕給我的香煙了。

去年底家父和幾個朋友不謀而合戒掉香煙，我想自己煙癮不厲害，所以沒甚麼太強烈的反應，抽得倒比過去多些。再說家父和幾個悍然戒煙的友人都為健康的考慮「禁慾」，跟我可有可無的狀況不同。前幾天讀了明清間汪价撰寫的《三儂贅人廣自序》，其中有一段談到旱煙水煙之類（並非鴉片煙），讀完覺得有趣，所以抄呈那幾個苦行的世伯世叔，以示表彰。在此也想把汪价的這段話，貢獻給讀者：「近日俗尚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

乃至酒色，何惑溺也。」①

顯然，汪价的這些話是有感而發的。據他的《廣自序》，他自己已經「惑溺」於酒，甚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盜面，吸取浮體，遂至沈頓，衆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罍之側」。他既能醒悟而有時禁酒，所以對抽煙而不能自拔的人由衷地同情，也想予以勸導。

抽煙還是戒煙？只能量力而行。我自己開心時，或同朋友聊到深夜時仍然煙酒並進，沒甚麼顧忌。我不怕「惑溺」。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於京都）

我
溺
了
又
怎
地
？

①《美化文學名著叢刊》，朱劍芒編，上海書店重印，一九八二年，《三儂贅人廣自序》第六頁。

賀年片

每年從聖誕、元旦直到舊歷新年的一個多月，真愁煞人。除了「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高雅情調騷擾我這長年做遊子的心思之外，最令我發愁的是賀年片。

賀年片的關鍵性問題是，賀什麼年而且應當什麼時候去賀最合適？給澳洲、歐美和日本朋友寄賀年片，兼賀聖誕與新年，這個苦惱當然不存在。連我親戚猶太也不計較我拋開月曆除夕，只賀基督教的耶誕降凡。日本人在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時代，就把東方的春節和西方的元旦歸納在一起。在一月初來一次「二踢腳」式「二踢腳是北京的一種炮竹名稱。」的大慶祝。他們送朋友的賀年片，雖然能在西曆新年初一收到，道賀的却是些什麼「賀正」啦，「恭賀新春」啦，或像今年「謹賀癸亥」之類的東西，倒給人一種「時光先流六星期」的奇怪感受。

愁煞我並不是這些，寄出一張賀年片就完事了。煩人不淺的倒是中國友人。過去只有香港的中國朋友迫使我雙重拜年：聖誕新年咭十二月剛寄出不久就被回敬一張祝我春節愉快的賀年片。以

此為滿足的思想可不成，只好入境隨俗，弄一張紅紙金字十分耀眼的賀年片附郵，心裏這才覺得踏實。反正，在香港的朋友當中這樣拘於小節的人不多，一年那麼來回折騰幾次也用不着太傷腦筋。一年復一年安詳地活到現在。中國內地的同學朋友只是近幾年才開始過不那麼「革命化」的新年。（註：「革命化春節」在文革當中含有「不准歡度」的意思，那當兒，春節快要改名為「潑冷水節」了。）對元旦，更不用說對耶穌聖誕節，誰都沒有表示太強烈的慶祝之意。

今年，爲了元旦和春節雖然總得忙亂一陣：挑選不太噁心的賀年片，臆造點別具一格的賀詞——我哪兒想每年人云亦云、已云又云地僅寫一句「恭賀新禧」呢？——再附上短信告以近況，最後跑郵局，找點紀念郵票，貼之投之了事。但中國的朋友越過節越歡。今年我頭一次收到了內地聖誕咭和春節的賀年片，幾把我掃興。

寄來的賀年片當中最怪誕且最有意思的是上海來的。卡片被套在一張左邊印着粉紅色的喜鵲與臘梅青竹的信封裏頭。卡片是紅底的，上半部剪出一個幾寸見方的空隙，貼一張繪在絹上的山水畫。下面寫有「喜事登門」，這兩者之中乃是登在開了花的臘梅上的兩隻金身的喜鵲，可謂琳瑯滿目。裏面更有怪招。對摺的左頁繪有兩艘大帆船，紅帆上寫着四個大字：「一帆風順」。這幅畫邊上還有如意等吉祥飾物，其下，見四個隸書大字：「恭賀新禧」。右頁上用洋文對照，在西方傳統吉利

一有我的及中半云。

解

日

天

有

本

日

付

月

象徵解寄生葉的中間有：Merry Christmas, 下面是And Best Wishes For A Happy New Year。中西結合，應有盡有。我如獲至寶，到處給人看。

但我還是要發愁。而且看勢頭，中國的某些朋友將繼續採取這種「一網打盡」的賀年方式。我呢？老覺得僅寄一張賀年片兼賀新年舊年總太過於寒儉。

（一九八三年元旦與春節之間）

等字

談《人啊，人！》

臨離開北京的前兩天，終於借到了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寫的長篇小說《人啊，人！》。這本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來，很少有報紙或文藝評論刊物登載書評；在海外，似乎還沒有人知道這本書和那位在文化革命後才走上文藝創作道路的女作家。

書在當天晚上開始看，到第二天傍晚雖然有朋友串門，但被擋駕，也就把它看完了。讀完最後一頁趙振環講的一句話：「失去了應該失去的，找回了應該找回的……舊的已經結束，新的已經開始！」不禁掩卷長嘆，心想這本書寫得多好！

近年來，徐徐踏入引向未來的思索和變革時代的中國，從此不僅有千姿百態的充滿深沉感情和令人深思哲理的短篇小說哺育着讀者，也有優秀長篇小說為中國的新文學奠定紮實基礎。

人啊，人！長期被左中右、紅五類、黑五類新身份制攪得支離破碎的「人」，在戴厚英筆下掙扎着，力求從過去無比慘痛的回憶和惡夢之中，尋覓自己、重見人生。小說中的人物——有久遭自

己心愛的人的白眼，又因為宣揚人道主義而在政治上被列為賤民的何幹夫；唾棄別人而又被人唾棄的中文系女書記；為擠上文化革命「直升飛機」踩着他人肩膀出賣靈魂而最後迷惘於人性和獸性之間的趙振環；以及經歷了二十年人世滄桑重聚母校俯首沉思的幾位大學生。他們都以血和淚的痛苦，領悟到「我們肩膀上扛的是腦袋，不是肉瘤子」，而且要用它來思考、分析、判斷」（何幹夫語）。

花費二十年的時光深切地認識到這個道理，雖然略嫌太長，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一個人能夠有這種認識就非同小可。因為對人的肯定，思考的讚許，正是創造和進步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

戴厚英的寫作方法，跟小說的內容一樣耐人尋味。作家「不再追求情節的連貫和縝密，描繪的具體和細膩。也不再煞費苦心地去為每一個人物編造一部歷史，以揭示性格的成因……」而是，「讓一個人物自己站出來打開自己心靈的大門，暴露出小小方寸裏所包含的無比複雜世界。」她所採用的手法被稱為「多元第一人稱」，特點是每個人物在一節裏當小說的主人公，以自己內心的獨白，與他人對話時的口頭和心頭講出的話，夜間的夢等等，來敘述自己，構成情節。這樣寫既有意識流隨地取捨的特徵，又具抽象主義的無視時間空間局限的特點，與此同時，作者所寫的人和事却現實逼真。

看完《人啊，人！》之後，我就到處說：「中國又有好的長篇小說可看啦！」想找人把這部小

說翻譯成外文，這本書也許不會老在中國「孤芳自賞」，因為聽說到國外進行中國文學研究的一位大學教師離開北京之前，買了幾本，準備送給在國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作為特別推薦的新書。我自己好容易借來的那本歸還原主後，想在廣州再找一本。不料廣州書店早已銷售一空。也有人說，這本書有「不良思想傾向」，因此……此話真偽，一時難辨。兩個星期前跟來日本訪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文學研究所研究者談及此書，才聽說上海《文匯報》最近發表過評論文章。今天回到宿舍時，收到第十一期北京《讀書》月刊，上面載有王之行的關於《人啊，人！》的書評①、論述公正。我希望那些對「人」字尚懷敵意的人，再看看這本書，而且先剖析自己。

看來我跟王之行先生一樣，讀畢《人啊，人！》「彷彿獨自一人吃了一頓美味那樣，沒和別人共享，反而心中不安。」最後，讚美的話憋不住了，寫這篇短文，略談這本好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於京都）

◎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一五元。據該書《後記》，這本書是戴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第一部是一九七八年寫完的《詩人之死》，此書我還沒看到，也有人說不曾出版。戴厚英在上海某大學任文藝理論教師。她二十年前大學畢業，今年四十多歲，跟出色的新興女作家張潔和慕容同一輩份。戴厚英在「文革」期間與一位挨整的老作家產生感情，但最後他由於政治迫害而自殺。戴的反省與自我剖析自此而始。她對自己過去持深沉嚴肅態度，作品中灼灼可見。

◎見《讀書》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第三十七—四十二頁。（王行之文有「我不認為〈人啊，人！〉是一部好到不能再好的完美藝術品，我對它有褒有貶」一語。

《隨想》的隨想

「……有過一個時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幾個『樣板戲』才是文藝，其餘全是廢品。我徹底否認了自己。我喪失了是非觀念。我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是唯唯諾諾，不動腦筋地活下去……」

這是巴金先生《隨想錄》第六十四《現代文學資料館》一文裏的話，也是自四人幫倒台以來我所看到的有關文化革命時期的中國作家、知識分子自我寫照最簡練、最忠誠的話語。把種種國難和個人之難的責任猛力往「萬惡的四人幫」、「禍國殃民的四害」身上推卸，早已成爲時尚。四害或十惡如何作孽，用不着在此細表。但巴金先生談及他在文革期間的思想狀況，也沒有用那個流行手法來粉飾自己，他沒有誇自己是一個口是心非暗地裏「對着幹」的英雄，而是冷靜地如實地對待他自己當時「着了魔」的心理。巴金先生的這幾句話看起來極簡短，但字字句句無疑是他十幾年痛苦（這痛苦裏還有相當一部份是自我虐待所致！）和思想解剖換來的。

巴金先生寫中國六十年代末全國性自我否定高潮時，說：「當時我的確把『無知』當做改造的

非常難得

目標。「這不是一個年幼的「革命闖將」在寫聲討錯誤政治路線的文章，更不是一個當時殺氣騰騰現在懺悔不已的所謂文革犧牲品在做檢討。寫的人是一個經驗豐富、心情敏感、思想成熟的作家。你以為這些話代表一個軟弱而貪生的心靈？不對，完全不對。能夠寫這些話的人（估計中國的作家、知識分子當中與巴金先生有同感的人不少）是一種不認為自己比讀他的書、生產他自己吃的糧食、製造他所用的家具的人高貴聰明些的人。文化革命把人類追求目標瞄準「無」字（無產，無知，無求，無望）的時候，能看穿其中陰謀的人極少，而低頭認罪，毀滅自己的人很多。

一代文藝工作者！能夠把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甚至能把自己釘在心靈的十字架上血淋淋地自加解剖，倒是史無前例。可怕，可憐，自是不言而喻；而且也可歌可泣。因為，從殘暴和兇惡中可學到許多平時學不到而且意識不到的東西；從知到無知又知這個過程中，雖然必有損失，收穫正也未必微小。巴金先生的收穫無疑很大，讀者有幸看到他的近作，亦得益良多。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於東京）

石要！

爲巴金憶麗尼補白

巴金先生近著《隨想錄》第一集英譯工作已近尾聲，目前只剩最後潤色和打字。在整理譯稿時，翻到本書第十二篇：《關於麗尼同志》，頗有所思。麗尼是散文家和翻譯家郭安仁的筆名，郭氏在解放前曾出版三本散文集和相當多的譯著，主要是屠格涅夫小說和契訶夫劇本。

巴金追念麗尼（他一九六八年在「勞動改造」中默默地死去）時，最惋惜寫「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扣人心弦的詞句的作家，爲飽暖度日奔波多年，犧牲了自己的時間，擱下了文筆。不料我在東京的好友刈間文俊以日文選譯《隨想錄》之際，偶然發現一份有關麗尼的極有意義的材料，巴金可能未見，在此略記數語，以代補白。

「文學家麗尼（郭安仁）在解放戰爭期間曾在國民黨軍委首腦機關任英文翻譯，乘機弄到一份蔣軍整個作戰計劃，找不上黨的關係，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風，胡再找到在宋慶齡先生主持的中

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廖夢醒同志，廖再設法轉交給給我。（張執一）上海局密電報給了中央軍委，軍委曾來電獎勵，認為對我軍作戰有很大幫助。」^①

麗尼有此非凡功勞，理應載入史冊。更令人沉思的是，這麼一位在困苦中掙扎多年的文藝家，解放後未能發揮才能，而在文化革命中無聲無息的死去，極為可惜。

（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於京都）

~~~~~  
<sup>①</sup>見《在敵人心臟裏——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張執一作。載於《革命史資料》第五輯，第三十七頁。  
一九八一年北京出版。

## 魯迅與影戲

魯迅先生多年來為衆人所恭維。其實，他老先生半個世紀以來在九泉之下，對他葬後的「變身」是微笑首肯還是啞子吃黃連，就無從打聽矣。

我自己跟魯迅的作品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但一直到最近始發覺同他有點心靈相通。這是因為我讀到了一本叫做「魯迅與電影（資料匯編）」<sup>①</sup>的書。一般人只曉得魯迅是個了不起的文豪，却不會知道他也是一個上了癮的影迷。此書的兩位編輯（劉思平和邢祖文）不遺餘力，在魯迅的雜文、譯著、書信和日記海裡撈針地搜羅一切涉及電影的珠璣，饗我們以膾炙人口的材料。

「影戲」（電影的舊稱）很早就傳入中國，但魯迅在作品裡第一次提到電影是在短篇小說集「吶喊」的「自序」。當年輕的周樹人看了日人砍下中國人頭顱來示衆，他大為震驚，是對「棄醫從文」一舉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之後，魯迅慢慢變得熱衷於電影，但他看銀幕上的萬千世界，不一定都為了尋找此類驚心動魄的刺激。其實，從他日記上的記載而言，電影對他來說，跟我們凡人

一樣，是一種時能解悶，時能增長知識的娛樂和消遣。

魯迅居住北京的時候，偶爾去看電影，到一九二七年左右，他國產片和外國片都看。直至他在廣州連日看了國產片「一朵薔薇」和「詩人挖日記」，這兩部片子使他簡直無法卒觀。他甚至在平時落墨極少的日記裡對「詩人挖日記」予以「淺妄極矣」的評語。自從看了那部「淺妄極矣」的影戲後，新國產片口碑再好，魯迅堅拒不去看。結果，雖然在他自己的雜文的名篇裡提及什麼「春蠶」、「姊妹花」和阮玲玉，他基本不知道這些影片或演員到底怎麼樣。魯迅由於自己的固執錯過三十年代初國產影業的蓬勃發展委實是一件憾事。

既然魯迅對國產片不屑一顧，他到底看上什麼樣的外國片呢？總之，他跟漂泊於C級影片瀚海的香港影迷一樣，有纏而不得其解地有什麼就看什麼。

在舊上海，這個「什麼」不外於大量的荷里活美國影片，而在他遷居上海後至他去世的八年裡，魯迅看了一百二十餘部美國影片。在他死去前兩年則幾乎每隔數日就往戲院裡跑。魯迅迷戀於影片而在他生前死後是他的妻子許廣平，時常要替他辯護的消遣（因為有人抨擊魯迅說他在國難深重時老陶醉於看電影，也總坐「花樓」，即雅座，甚至還雇汽車往返戲院）①。

在魯迅看的一百二十餘部美國影片當中，有相當數量是我小時候也看了的。其中，陳查禮

(CHARLIE CHAN) 的片子較多。我萬萬沒想到中國人會這麼欣賞瑞典人的華納·奧倫扮演的胖臉八字鬍略有誇張醜化的中國式福爾摩斯。但，魯迅似乎尋樂心理強烈，不嫌查禮陳有「辱華」之意，竟看了三部查禮陳的影片。

魯迅也曾常稱道，他看一些片子，特別是像人猿泰山，和一些世界旅行記，「借此就知道各處的人情風俗和物產……我想自己將來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極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點見識了。」②

可惜，他所愛看的，甚至常給人介紹的泰山人猿（他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看了「泰山情侶」，TARZAN AND HIS MATE，次月又拉日本的內山完造及其夫人和另外幾個日本朋友再看一次！）和「金剛」等的遠方風土人情，其實都是在美國鄉下拍攝的。好一場夢遊。他陪幼子海嬰和茅盾之子阿霜（韋韜）去看米老鼠之類的片子，不知又作何感想。

魯迅說，「我的娛樂只有看電影，而可惜很少有好的。」③在香港及內地四十幾年來恐怕這個形勢的變化不大，但要是魯迅活到現在估計他對國產片的「淺妄極矣」的評價仍會成爲他不涉足戲院的理由，他大約早已經用稿費買一台錄像機閉門造車。

抄錄

① 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

② 見「魯迅與電影」（資料匯編），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第一六、一七——七十三頁，許廣平寫的「魯迅怎樣看電影」一文。

③ 同上。見第五十八——九頁。

④ 同上。見第五十八頁。

## 荻蘆雜憶

京都漢學刊物《颯風》①登有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的一組回憶文章。周豐一目前在北京圖書館文獻室任職；文章是日本學者中島長文去年逗留北京時約周氏撰寫的。約到的文稿一共有七篇，中島考慮周家住宅周圍荻蘆茂盛，而且他也用「之荻」為號，就起了一個《荻蘆雜憶》的總題。

周豐一曾兩次東渡日本，頭一次是一九一九年他七歲去探親時；第二次是一九二九年他在北京孔德學校畢業後獨自去日本留學。因此除了在家裏受日語薰陶以外（他母親是日本人），他也在日本受過正規的日本教育；再加以「孔德精神」（自由、自治、自學、個性啓發），就給了他以「中西結合」的特殊文化修養。七篇《荻蘆雜憶》裏能夠看出這種修養的痕跡。其中第一篇《自傳二則——留學物語》是他用在日本早已成為艱澀玄奧的文言體寫的。其餘六篇，雖然用日文「白話」寫作，散文味道很強，文情俱備，在日本已屬難得，更何況是在中國寫的回憶文章。

《荻蘆雜憶》有周豐一談自己在中國和日本就學的短篇，也有記述童年的住客，俄羅斯盲詩人

愛羅先珂，青年時代的一首歌，掃墓，他的舅舅等片段回憶。周作人曾被人稱爲最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和國外也一直有人研究他的散文。多年在中國文壇彷彿消失了的周作人又被人提及，他的知堂散文集也已再版，看來，今後現代文學專家會對他的作品重新加以研究，予以較前更公正的評價。他的兒子周豐一的幾篇文章在日本得以發表，也一定會引起漢學界的注意。我於此試譯題爲《北海的秋天》一篇，抄錄於下，供讀者參考。

○《颯風》一九八二年七月號，總第十四號，朋友書店，京都，第十一——第二十七頁。

附：

## 北海的秋天

有一年，我帶了三個女兒去北海玩。進正門後直往白塔走去。

遊人已稀，我想，大約是因爲暮秋的關係吧。

逐步踏上石階。孩子們對落葉出神。我向她們僅說了一句：小心點；自己就繼續往上爬。

上面的飲茶部夏天很熱鬧，這回反而恬靜了。我找了一個位置坐下等孩子。白塔矗立於前，同蔚藍的天空炯然對映。下邊可見一個女人的形影在勞動。

翩然掃葉，靜心品茗晨，

白塔茶室亦曉秋深；

足根葉落茶席秋。

\* \* \*

我獨自一人喝茶，也給了孩子叫了汽水。一邊等一邊環視我的周圍；十幾個茶座空無一人，路過的行人誰也沒進來休憩。站起來視線透過光禿的樹木，俯看與秋令不相吻合的湖面，遠處似乎有人在划遊艇，却使得這一切顯得更加寂靜。

三個女兒噤哩呱啦地講着話跑了進來，把手裏捏的落葉給我看。每一個人喝了一瓶汽水，我手持茶杯吸着香煙，一一地看了她們欣喜的表情。

紅葉又落到我腳邊，老二把它拾了起來問：「這是什麼葉子？」由於它剛離開母體不久，顏色仍然鮮艷。

啊，我的孩子，滲着秋色的樹葉還遮隱那隻小手。

子子

## 《緣緣堂續筆》的發現

剛接到了北京的朋友寄來的剪報，是上海「文匯報」報道已故文學藝術家豐子愷的一批散文遺作被發現的消息。據報道停止文學創作多年的豐先生在「文革」靠邊時，一方面應付作爲「反動權威」而遭受的批鬥，另一方面暗地裏悍然恢復寫作活動，在一九七五年豐氏撒手塵寰前，他寫下了三十三篇散文，予以總題「緣緣堂續筆」。這些遺作先保藏於他幼子豐新枚處，最近拿出來準備部份出版。

我看到報道這個「文壇奇跡」的消息的當天，恰巧在整理曾在東京大學中文系影印的豐氏近五十年前撰寫的舊作，「緣緣堂隨筆」及「緣緣堂再筆」的全文複本。萬萬沒想到豐先生除了幾十本散文、畫作、美術、理論文章和大量的譯作之外，也給我們留下了第三本緣緣堂隨筆。這三十三篇遺作在當時的產生和於現在的問世，我想非同小可。慘死或被凌污於文革淫威的老作家當中，有機緣乃或心思握管寫作的人除了豐先生至今沒有聽說有第二位。「緣緣堂續筆」是豐子愷難以言狀的

寶貴文學遺產，我也期望它的公開和發表將不是孤單的。難道其他作家和知識人任命於暴政，沒有求解放於筆墨嗎？

書評

## 媽媽的，甚麼語言污染？

《禮貌語言手冊》；中國經常會出版一些帶有「偏題、怪題」的書籍。這本手冊理應是語言學家的參考書，但冊末版權上明記印數——一，一八〇，〇〇〇。能夠售罄不就是暢銷書麼？作者、出版社可以名利雙收麼？不過內地的書要銷到以百萬冊計的數字，用不上出版社或發行者費太大的力氣；書印製完畢，那麼一批發，書店書架上擺，經各地「宣傳口」一吹一捧，只要羣衆口碑不太差，一眨眼第二版在望。

《禮貌語言手冊》印數較多，樣式很正經，一百餘頁的袖珍冊子肩負重任。跟先前——也是去年夏天——出版的奇書：《如何鑑別黃色音樂》，同樣有匡正歪風，勸善規過的使命。它的問世也恰巧配合「五講四美」，「文明禮貌」運動的深入、持久開展。到內地旅行的讀者估計不會目擊掛「文明禮貌車」牌子的公共汽車、「文明禮貌工地」或榮獲「文明禮貌」獎旗之類的百貨商店或店鋪。萬一目未染過這種鮮艷醒目的人間改觀標誌，你可能耳濡過大街的宣傳車或定時廣播用高音

喇叭進行強制性的公共道德教育。如果你是個逃避遁世的清高之徒，還缺乏這些體驗，就不妨買一本《禮貌手冊》看看。

《手冊》自語言的角度企圖恢復中國社會應有的禮貌規範，提倡互相尊敬，互相謙讓，不說粗話、髒話、多說「請」、「謝謝」、「對不起」，多稱「同志」。這些本來應當是正常的，一般的人格社會。當然，「內外有別」這句老套話現在尚應驗，因為一般家庭內部和朋友之間人們很講禮貌，氣氛偏於融洽。在社會上却寒風逼人，舉目無親。我初次到中國驚奇親熱客氣的友人一出門上街就兇神惡煞的目中無人橫衝直撞。這個「兩種性格」，仍然使我迷惑，但我自己久日置身於其中也有時候像「化身博士」那樣「小人豹變」。

《禮貌語言手冊》的出版本身令人難以置信之外，細讀內文和禮貌語言模範的例句倒發現這本冊子針對性廣泛，老幼咸宜，旨不僅在教育好青少年，也有意給家長和成年人上淨化語言課。冊子諄諄告誡的每一項可見語言污染在中國的社會早已侵襲使用語言的每一個角落。社會語言的淨化是需要的，這本手冊則可以起一個規範作用。但以爲幾本書，高音喇叭的震耳欲聾的宣傳或積極分子的勸善能當中流砥柱乃是妄想。能夠在人的心目中減少或消除「內外有別」的區別對待公式，

雙

雙

對社會上的人們一視同仁，不把外人視爲洪水猛獸，禮貌語言的復甦便更會有保障。

對是對

對的

# 「文革」文物

中國是一個古董販和古玩愛好者的天國。幾千年的滄海桑田給了現代的人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甚至破壞不完的地上下寶藏。素負惡名「決裂派」的文革小組居然准許考古學者搞「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康生、陳伯達也大耍雙重性格，猛搜刮字書古玩珍本裝飾自己的官邸。康生也頗有鑑賞家的眼光，國畫習得亦不壞。江青也盡其挑剔古人玩物的能事，化公為私，甚至密令把那些與她不共戴天的舊戲統統拍成藝術性極高的錄像，是一代文盲也是一代文豪！

沒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洩氣後僅僅六年的現在，它的種種產物和排泄物竟成寶貝。不言而喻這是「物以罕為貴」的心理得逞。

早在文革期間羣衆用物以類聚當做審美標準，收藏毛澤東像章。當然胸前別上一枚，家裡放幾個備用的是個常識。已有多年沒想過主席像章，而去年夏天在北京碰上一個在迎兩年收藏三千枚像章的美國朋友。據他說，幾乎家家戶戶都仍然藏有像章，雖然把它掛在胸膛的日子已如朝

由於

過了

筆球

也

下

多 18X

列

L 也

內

一般

露消盡了

那個像章迷因為清閒無聊才當了「文物」收藏家。我在澳洲的一位老師在文革高潮時上下求索

把一座寶書鐘弄到手卻是為了諷喻空頭政治，但現在那種鐘錶求之不得，竟成爲文物。不過這都是些不很認真多半在尋樂的人所爲。而日前有一批老練的專家在收索文革文物。據說一九六七年的一套

名爲「偉大的舵手」的郵票裡有一枚繪有毛澤東和林彪並肩像，呼喊口號手拿紅寶書向羣衆揮手致意，下面橫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現在價值三千美金左右！一九六八年發行

期短暫的另一枚郵票「全國山河一片紅」同樣昂貴，原因是漂浮在工農兵的洶湧大海頭上的中國地圖除了台灣一塊白點之外全部通紅。這張郵票沒發行幾天就被收回，所以珍貴得很。

文革文物不僅僅限於像章和郵票，還有許多「語錄類」（臨時稱呼）如：語錄搪瓷杯、餐具、獎品、掛曆等等；有宣傳畫、日常用品、各追悼會照片、報紙等，甚至當時的幾本書裡前面扉頁上

有馬列斯毛的語錄，芸芸衆物，茫茫塵世。自量而言文革文物不下幾朝幾代遺物的總會數倍，潛力

仍然頗大，還未曾埋藏過，可以隨地攝取。我看還是趁國外的「中國熱」尚沒有散盡之機把這個要不得的遺產，這些既令人發笑又叫人懊惱的東西分批賣掉，鼓勵博物館美術館開設文革文物展覽室。綜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不過，我建議諸位有志收藏或販賣文革文物的人：請緊防贗品。

都成了收藏家們的對象

並且它們

被種

以外

館和

警告

很严肃也

## 鬼話

談鬼說魂真是一個恐怖的歡樂。多年前在瀋陽讀書，同我住一個宿舍的「工農兵學員」善於講鬼故事。他和另外一個同學每天晚上輪流講故事。要是夜深我有時坐床沿會打瞌睡，一被發現，他們就講雷鋒或王杰光榮事跡來罰我，並且有人監視不讓我閉目。

夜深三更最宜鬼故事，冬天下雪或雷雨來臨時大風一陣陣刮來，使樹葉蕭蕭發聲。我在這種森嚴恐怖情況下聽了無數次的「鬼話」。有時候那個同學講得「死靈」活現，或去盥洗室漱口刷牙都有點渾身起雞皮疙瘩不敢步進黑暗處的懼怕。有時爲了中和一下氣氛，我的同學就會講些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則我非常喜歡。它簡短精悍，耐人尋味，現在回憶起來仍然覺得有些「後勁」。

故事來自「聊齋誌異」，「青鳳」裡的「耿去病」，是描寫對付鬼的絕妙辦法。

「生乃自住，讀於樓下，夜方憑几，一鬼披髮人，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硯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

葉某嫌的

新

也是說鬼的如

香港的一個朋友天生怕鬼，於她面前儼然敘鬼話必定嚇得她心驚胆戰，擺手勸休。而後「聞稿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前幾年在香港舊書攤買到了一本六一年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此書廣泛摘錄古書上以智謀取勝於鬼的故事，爲了破除迷信，杜絕死人驚世駭俗而出版。我已經叫朋友帶一本來香港給那個聞鬼色變的朋友看，希望她能夠學嵇中散（即嵇康）的樣子：

「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耻與魍魅爭光！」

以後，雖然大約難以根除她對鬼神的恐懼心理，起碼這種故事看多了，就可以在遇到牠們時有個對策。

的時候

## 食道的負數

中國人每湊到一塊兒談笑取鬧的當兒，話題準少不了樂陶陶地議論一番甜酸苦辣鹹魚肉飯菜的插曲。雖說是一席沒譜的話裡頭的插曲，其實在所有人的生活當中，這五個味道及負荷它們的食物是一個形影不離的五綫譜。

《三字經》裡尚許句句珠璣。不過我食遍天下闖蕩江湖十載有餘，總覺得一開頭就該是：「人之初肚本餓，性相近食相遠」才更近人生基本道理。我猜想《三字經》同其他的儒家經書一樣滿頁是白字，像《論語》裡「三人行……」等話，顯然應當是「三物行，必有吾食矣」，《詩經》的「碩鼠」亦該匡正為「碩鼠、碩鼠，幾時余煮」，《大學》則曰：「大食之道在明烹德，在親麵，在喫於至善。」云云，云云，不必一一例證。你看看，幾個白字以訛傳訛，相繼二千餘年，誤了多少人和事呢？

文化革命不管怎樣摧殘人生，對文化、公共道德和物質文明搞得近似蕩然無存，食道精神却安

然無事，甚至同平時一樣無往而不勝。

在那瘡痍滿目、萬馬齊瘠的年月裡再少糧缺食，人們雖親口嘗不到甚山珍海味，但仍舊動輒大談熊掌魚翅燕窩。牆連根地拔了但還死不認賬跳着佛呢。偉哉，可見食道精神之根深蒂固，其頑強和吸引力難以名狀。真是可名之道非常道也。再之，於路上的指示燈的紅燈改為「可行走」，綠燈有「停止」的意思的年代裏，却沒聽誰說紅燒魚肉之類的菜特別的革命，抑或白切雞，黑色的豆豉特别的反動。

終於都熬過來了，似乎廣東人熬得最不賴，也許是天性使然。雖有損失——廣東的粵菜未能保得住「食都」的豪稱，現已「遷都」香港——，但他們仍然是中國正宗食道的衛道士。廣東現在確實食遍天下，是五千年文化在外國幾乎無肚不入，無往而不撐的銳利武器。誰不心甘情願地死於它攻擊之中？

在澳洲中華理料很盛行，幾千家中國飯館裡頭粵菜館為數最多；鄉間的小鎮裡也往往能找到一兩家。其中有許多菜為了迎合當地人的口味，逐漸變了質，但粵菜在澳也借題發揮。譬如說，最近有報導說，北塔斯曼尼亞（澳洲的唯一海島州分，位於澳洲大陸東南岸對面）的負鼠肉在墨爾本唐人街菜館給用來做中國菜。負責公共衛生的有關部門查禁了此類肉食，說因為吃這種不合格的肉有生

眼疾，損害大腦乃至死亡的危險。他們搜查出二百餘公斤負鼠肉予以處理。爲了領悟中華理科三昧，登峯造極，有些天胆的人無所不吃。看樣子，澳洲負鼠的菜餚，無論是蒸炒炸煎，倘爲「研製」成功，但我想多數讀這篇文章的人大概不僅聽不變色，還會是躍躍欲食的哩。

尚未

視責

## 和平用餐

從

不堪

每次自北京回香港總免不了有人打聽在北京吃了甚麼好東西，仿膳去了沒，哪些食品翻身了，云云。我當然不怪熟念食經的香港朋友，遺憾的是住北京時我不常在外頭吃飯，若吃乃是豆漿油餅饅頭咸菜之類不齒於廣東人的素味。街上的飯館一般擁擠，想迅速尋覓座位的人必備有老鷹般的千里眼，豹子的敏捷和武松打虎的衝勁，其中缺一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也。

和平餐廳、建國門外的鳳凰餐廳和燕京飯店的燕京餐廳倒都屬於新開業飯館。這三家尚未被過多人知曉，再加上比普通館子價昂，顧客的蜂擁度不至於水泄不通那麼厲害。

其中的和平餐廳是漫游京城時不宜缺漏的項目。  
該餐廳位於貫通王府井和東單北大街的金魚衛街東端。它本來是一家咖啡廳，但前幾年重新開張以後也供應點心和西餐。作爲一個羣衆性西餐廳，可去一嘗。學北京油子叫幾盤炒花生米、沙拉、朱古力、三得、冰淇淋荔枝和酸菜，再加數瓶啤酒、羅宋湯和咖喱牛肉飯之類與朋友圍坐一桌甜酸苦

程

制中心

辣地大吃大喝一番無疑可算嘗到了北京新近增添的奇味之一。

我決不會叫人去吃自己未敢品味的東西。十月中離開北京的前一個晚上我就吃了一頓和平餐。

上述的菜單非隨手抄寫，而是我當天晚上同幾個朋友用膳的真實紀錄，至今回味無窮，難以忘懷。餐廳分東西兩大長形側房，中間一進正門有個西式點心小賣部。裡邊的座位時常滿坐，而試探「異味」的顧客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實施了年輕化，以肉眼測定都在三十歲以下。大部份相貌不俗，衣着入時，估計皆以京華驕子自居。雖然他們許多人如此儀表非凡，但其點叫的「味覺光譜」，不分先後不顧死活地揮箸狼吞虎嚥却稍許有點殺風景。

上次在和平吃飯碰見了老友吳歡。小歡足穿革履，身披西服，茂密的黑髮有自然波浪，很有點派頭。他現在在一個電視台高就，當編劇。他老婆在同台做導演，所以工作上也經常合作。

剛坐下來點菜，小歡就竄進來寒暄一番。我在北京的時候雖不常跟他見面，但一見就你一句我一句俏皮話滿屋飛。他突地問我要不要聽個自編自演笑話。我恰好那幾天翻了數本中國古代笑話選，自以為飽經風霜，但為這麼一個老友記也不懼怕禍從耳入。先在此將小歡的笑話謹錄於左以饗讀者：

甲從外國發了財回內地碰見了多年不見的窮朋友乙，知道他已經結婚了。

甲：「你太太漂亮嗎？」

乙：「還湊合。」

甲：「我應該送你們一件禮物，請問你太太喜歡甚麼？」

乙：「她甚麼都喜歡。」

甲：「不！她最喜歡甚麼？」

乙考慮了一下說道：

「她最喜歡發脾氣。」

多人說我「笑腺」畸形，「慈顏常笑笑世間不可笑之事」，但小歡的這個微笑話真逗不動我。我吞吞吐吐地說了些勉勵的話，亦告訴他要大名載入《新笑林廣記》仍需要些努力。我們就這樣半歡而散，各自回座嚼起口味齊放的和平菜。

某

是

60

可

## 展銷

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國家。幾年前各種商店櫥櫃空洞如也。商品湊一齊空曠的地方使整個店舖顯得極寒儉，把政治大宴會留下的這些殘茶剩飯擺得更使人感到陣容之充實也不大可能，終究祇好少開些商店。書店亦如此；紅皮和精裝寶書佔滿書架，但這一類書籍除了幫助書店老闆不至於太難堪，但因爲平時無法引誘讀者它們被冷落而積了幾層塵灰。

現在呢，東西較前多得多了，新商舖開了不少，也有流動商亭以便顧客。自前幾年起又產生了一個填空戰術的絕招，即展銷會。

展銷會是帶有展覽和銷售兩個內容的集會。這種便利商品流通的形式誕生以來已經蔓延到市場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可以說有一點充斥於市的勢頭。秋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就有一個少數民族商品展銷會。中藥材、皮草和衣類據言價廉物美一時成爲全城談資，入場券也有一陣子變成關係戶們衆矢之的。王府井一帶也在搞一個河南省產品展銷會，臨近的東廠衚衕西口一帶和阜城門，官園之間

美不勝收  
算搶手貨

擺了許多攤子，物品琳瑯滿目，是全城商業系統百貨大樓的秋季展銷會。

「展銷」二字不像香港通用的「減價」那麼單純。其實，銷的商品價格有時原封不動，同平時一個樣，有時略有降低，特別是滯銷商品；但稀罕的物品一旦在展銷會上露面就身價微漲。因此以SALE一詞來概括之不十分得當。

## 日本人的心靈風景

「西方人衡量事物一般從一個正確與否的善惡標準出發。日本人却自具體的人事關係判斷事物的好壞。若盡言之，在日本人看來，凡是能夠使人事關係和睦就是正確的。」這幾句話是日本作家和評論家加藤周一在同「知美國通」安岡章太郎的對談裏的開場白。加藤和安岡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對談刊登在平凡社月刊《太陽》的新年號，是該刊物特集《我們日本人的生活白皮書》的頭一項。

日本人善於學外國，模倣外國；這幾乎成爲他民族對日本的定論。但日本人之熱衷於知曉自己，大搞「日本人論」倒較少有人注意。好像日本人永遠處於一個不可緩和的自我認識危機；甚麼書或刊物只要專談日本人的特質就一定會有讀者。他們求知自己在哪些方面有異於其他民族，但同時始終怪罪別國人們不一視同仁。自從十九世紀末教育家福澤諭吉鼓吹日本「脫亞」全面西化，日本人往往以西方人和歐美國作爲評議自己的準繩，故此日本人總顯得奇異、獨特。加藤和安岡的對談

裏雖然偶爾提到日本人與其他亞洲人的異同，但這兩位「知西家」顯然「言之不知」，而他們主要側重於日西比較。既然如此，他們談及日本人對個人或集體所作爲遭到的後果，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的責任觀點沒有過去不考慮將來的「現在主義」等問題，對讀者都有所啓發。

《太陽》雜誌的特集裏還有一組專門談白領職員 (Sarariman 日式外語，由英文 salary 加 man 組成) 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文章。這些短文——《男人的勳章》、《夫婦春秋》、《孝子行》、《健康病》……等——都由一般人的兩句話和各種統計表編輯而成。另外一篇文章介紹一個普通職員的工作日，以及對這種日本國有限公司 的機器人間進行經濟剖析。這些文章材料豐富明瞭，有利於了解日本社會，但同時令人爲這個國家的單一和嚴密的計劃性、自我犧牲，感到不寒而慄。

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於京都

## 加藤周一的《日本藝術論》

秋天是遊覽京都的盛節，不僅日本國內的遊客蜂擁而至，外國觀光客也特別多。最近在香港認識的朋友也有四五個人作秋遊「日本洛陽」。勿論在古廟觀賞庭園，或在市街騁躑，每個人都為日本的建築，藝術品和普通的用具讚歎。

日本人對物的造形、色調、用料等等歷來有特殊的敏感。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就反映了一個審美至尚的上流貴族社會，在那個宮廷的社會裏，情人寫詩用的箋紙水印，紙張粗細、墨的淡濃，詩本身的用典和字體對愛情的前途發展，都有決定性作用。這種考究雖然隨着貴族階層的沒落而消失，但對一切物品的視、色、香和觸覺的高度敏感性和要求，仍然是日本人處世接物的根基，也恰巧是外國人最迷惑同時最難了解的日本人的側面之一。

加藤周一（Shunichi Kalo）的《日本藝術論》（英文版：Form, Style, Tradition）是一本探討這類藝術、人生和民族性的論文集。加藤和明治文豪森鷗外一樣，是醫生出身，但幾十年來的

寫作已經確立他在文學、評論、學術等方面的地位。加藤的關於日本文化、文學和藝術著作很多，其中的《日本文學史序說》尤為著名，已被譯成英文的《日本文學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及《The Japan-China Phenomenon》在歐美也曾引起過注意。

《日本藝術論》包招六篇論文，其中的《藝術家和現代社會》順着日本歷史的演進，分析藝術家的社會作用和屬性，最後談析藝術家及其作品在當今社會的疏遠，而且斷言疏遠心理是工業革命後社會的特性，雖不限於一個國家，但其表現形式取決於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加藤認為日本的藝術家現在可以而必然要用國際藝術語言來表現自己。他不覺得這是藝術的末日或單一化，而是藝術成爲全人類的東西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創作全盛期仍在前頭；而且如若創作活動真正展開的話，有疏離感的藝術家將拯救被疏離了的人們。」

在《源氏物語繪卷》及《個性和藝術家》中作者分析藝術傳統形式和藝術家個性的表現，以及探討日本人獨有的時空觀點。《茶道隨記》是一篇精到地介紹茶道的「爲藝術而生存」的純藝術理論，也談及茶道的歷史演變。

《日本藝術論》是一個傑出的當代日本思想家和作家談論日本的藝術世界和展望，對有興趣日

異化

本文學藝術方面的人，這是本很有啓發性的書。譯者是John Bester。  
《日本藝術論》加藤周一著，講談社出版。

## 律人甚嚴

真不可思議！那是太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昨天接到一位日本朋友的電話以後，腦海裏整天浮沉着疑惑和驚訝的感歎號。那個人二十二歲，是從東京一家名牌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他爸爸曾經被派往國外任職，孩子因此外語底子不壞，眼界也頗開闊。大學一出來，就一步登天，參加日本規模最大的鋼鐵公司。憑他的身世學歷，前程似錦，確屬可慶可賀。

不過他就職不到一週，就跟他同時參加工作的新同事，奉召到人事處聽訓話，受訓練。訓話大致上不離愛護公家、盡忠職守、嚴守規章之類，都在意料之中。新人受訓練的內容倒有些使得他感到愕然。首先，如何正確的向上司、長輩和同輩的同事鞠躬敬禮。我那個朋友對這心中有氣，在日本長大，從小就學會了鞠躬，還偏要跟你們重學，像甚麼話？把我個人尊嚴置於何地？雖然如此，當場他却乖巧地立正哈腰，學它三十度、四十度、四十五度的鞠躬，絲毫無差，彬彬有禮。事後，他把滿腹牢騷向我發洩：成了大人又走進了社會，還活像回到幼童時代受人訓斥，真氣死我也！錦

綉前程，瞬間顯得黯淡無光。

工作快到半年。他衣着整潔地上班，端正地敬禮，對上司下屬謙虛恭敬，工作也積極，一點不怠慢。風平浪靜多日，好像那無限美好的前途又緩緩在望。春去秋來，不知哪兒吹來的風言風語，說他們那一批新人缺乏集體精神，略有些鬆軟渙散的表现，需要嚴肅對待。他們起初把這些當做耳邊風，置之不理。不料到夏季逼近之時就接到公司指導人員通知：放假前那幾十名新工作人員要到山上集訓一週，以便加強紀律。軍令狀般的言詞叫人肅然起敬，似有一違者一律斬首」之憂。我的朋友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大伙往到山頂上集中營幹什麼？他不加思索吐出「但是呢」幾個字，正準備說下去，但湧到嘴邊的話全給吞回去了。直接拒絕說不定會影響到今後的晉升，借故請假看來會「有損於集體的行為」，得了，去就去吧。人家叫我們像高中參加小組活動那樣聽人使喚，有什麼辦法呢？反正只有一個星期，死不了。不管誰心裏多麼詫異不滿，可是誰連半個「不」字都不敢說。

到了山上營地才發現，「紀律教練」却是日本自衛隊的。同事們換上舊海軍白色制服，住進集體宿舍。從第一天起，大家要早起早睡，照軍隊規則要求自己。早上吹哨起床，五分鐘內得把鋪蓋收拾整齊，穿好衣裳，跑步到小廣場報數，要求有條不紊。若床鋪骯髒、用品擺錯了位置，給軍人

痛斥以後，就得再換上睡衣，鑽入被窩，從頭做起。一人做錯，大家跟着倒霉。在集體食堂吃飯；整天搞些體育活動，跑步，爬山之類，……。

朋友在電話裏問我聽見了沒有？我半天目瞪口呆甚麼話也答不出來。他自己都說好像做了場惡夢。至於他的收穫呢？一星期的集訓倒糾正了他駝背和姿勢不正的毛病。可自己真不相信還會有這種「馬鹿之事」。我僅僅傻呵呵地問了句：「受訓期間《大日本帝國》（電影）看了幾次？」

（教科書風潮時期記）

得

的

## 喫茶店

來到日本後不久，就經常聽朋友談起東京哪一家「喫茶店」好，哪家不怎麼好，挑剔得很。其實，初到日本的人，甚至在登陸數小時內，就會跟滿坑滿谷的喫茶店招牌打個照面。但乍一眼，並瞧不出這五色繽紛嫵媚艷麗的外表，到底隱藏些甚麼吸引顧客的秘密。千萬不能小看這些喫茶小店。它在日本有一個特殊甚至神聖的地位，亦可說它是日本這個奇特社會的奇特產物。

隨便走到一家喫茶店櫺窗前，先瞧一下玻璃櫃或玻璃窗裏擺着的「立體式」菜單——賣些甚麼飲料食品，幾乎都以蠟製的「模特兒」再現，以便顧客事先選擇大嚼。到了店內另是一番講究。簡直應有盡有，在這裏一言難盡。倘若您傾倒於五十年代美國音樂，或樂意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沙龍享受雅趣，抑或您仰慕乘坐梭飛機繞地球打圈的太空人，凡此種種，您在東京就一定能夠找到一家情投意合的喫茶店。

您可

免了

下家都

是

目前各式各樣的電子玩具大行其道。甚麼太空人襲擊隊、星球戰爭，並不少見。但日本總算先走了幾步。太空人襲擊隊之流也侵入喫茶店，您在同朋友促膝談心時，說不定會突然間意識到喝咖啡的桌面，正是一個顯示善惡相互殘殺的螢光屏。若不想讓火星怪物窺視你們的交談，那就趕緊「埋單」，另去他處。

喫茶店內容豐富，陳設特異，吸引很多外籍遊客駐足而觀。就是對日本人來講，它也另有更重要的吸引力。在住房窄小的日本大城市，同友人聚會聊天的地方極少。「內外有別」的思想仍然強烈，很少有人隨便請一般的朋友到自己家玩。在大小公司工作的職員，一般在一個大房間辦公，若需要同其他公司職員談些事情，常常不得不到外頭去找地方。學生也是這樣。聊聊天，討論些問題，約同學也是不得不光臨一下喫茶店。因為，把一幫朋友拉回自己住處，大概也坐不了幾個人；擠滿了電器的單人「公寓」，剩下的空地只夠一人容身。再說，在喫茶店喝杯茶，飲杯咖啡就是坐幾個小時，也不會有人嘀咕。以我自己經驗為證，有一天下雨，我就躲到銀座小巷的喫茶店去了。看了一本書，寫了四封信，安安穩穩坐三個時辰。我只喝了一杯咖啡，「跑堂」的那幾個傢伙，連眼色也沒遮我一個。

的確，在日本那個緊張過度、人際關係複雜的社會裏，喫茶店能夠起一種相當重要的作用，可

可

一般

你

得

謂豐功偉績的作用。

中國要不要這種喫茶店呢？

我突然從這喫茶店，聯想到中國近來盛行的婚姻介紹所。有不少文章以熱忱的口吻讚許它，但也有人因為不瞭解中國情況而取笑，不明白創辦清除男女王老五門市部的意義。婚姻介紹所應當辦，以非常措施，來緩和並部份解決「文革」遺留下來的畸形男女關係，很有必要。但這種臨時措施，不可誤認為是長期而且正常的社會服務。當然，國外婚姻介紹所亦有之，但並不像中國那樣招攬來客。中國在舉辦婚姻介紹所同時，急需有人想方設法，讓年青男女在更自然的環境裏接觸，找朋友。

對介紹所的開辦，似乎不該過份讚賞。我請問為介紹所唱讚歌的朋友：「您是怎麼認識您的太太的？若能『返老還青』，您樂意跑婚姻介紹所找個老婆？」讓男女（不必限於青年）有見面交友的地方，多開設一些中國化的喫茶店——茶館，作為社會福利，豈不甚好？

茶

(茶)

## 油茶

來到日本的中國遊客，在遊覽近畿地區名勝古跡，總免不了喝一次茶。這個茶，不是我們通常到茶樓去飲的早茶或午茶，也不是粗茶淡飯的那個茶。日本人尊稱為「御茶」的茶道，喝起來也頗費週折。但人們在優雅的榻榻米茶室裏品茶時，很少飲「茶」思源。茶道（亦名「御茶之湯」）和茶道儀式裏用的抹茶，本來是鎌倉時代（中國南宋）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有人知道日本茶的祖籍，但到最近一直還認為，抹茶和茶道在中國早已烏有。

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一位研究員周達生，在翻閱中國近年出版的民族學刊物時，看到一篇報道抹茶仍在華南侗族地區作為普通飲料使用的文章。他抱着存疑態度，今年秋天到中國去做實地考察。

侗族居住在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湖南省交接山區，人口約一百二十萬。周深入山區，發現當地的侗族有喝「油茶」的特殊習慣。這裏所說的「油茶」，與北京人愛吃的麵茶或油炒麵不

同，侗族的油茶是先用綠茶籽榨油，然後把榨出來的茶油在火上熬，熬完再加水煮，然後過一過茶漏子，再加爆開的糯米、花生米或玉米、豬肉，跟切得很細的蔥，一起喝。有甜辣兩種味道。侗族人不但吃飯的時候喝油茶，平時兩頓飯之間做爲一種零食也喝。顯然，油茶是他們日常生活當中的一種不可缺少的飲料。

周達生發現，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八江人民公社的侗族人，舉行婚禮時仍舊喝那用抹茶做的油茶。在八江東邊的林溪人民公社，一直到三、四十年前，飲抹茶依然盛行。侗族抹茶粉的作法，跟日本傳統作法相同：不用石磨磨，而用臼（日文叫唐臼）搗粹成粉。然後，過篩子，存放在竹筒裏。用抹茶做的油茶不是一飲而散，而是有一定的程序，甚至可以說儀式。

茶初次傳入日本，是唐代。而茶樹和抹茶則是一一九一年（南宋）由日本和尚榮西帶回本國的。可見當時的日本僧人是時髦的先鋒。榮西喫茶，主張吃了薑的甜茶。這吃法先由僧人、貴族享受，然後逐漸普及到一般民衆。榮西除介紹茶樹和抹茶外，並撰《吃茶養生記》二卷。

所以，您下次到日本去，跪在地上腳脖子疼得涕淚俱下而準備雙手接茶碗時，不要忘記在茶裏日本飲茶老僧和侗族的祖先。

這些都得歸功於

## 建築的反動

前天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京都分會聽公開演講。他們請來的是建築師狩野忠正。議題是《日本現代建築——其意圖與發展》。有英文翻譯。

在日本住了快一年，東京、大阪、神戶和京都這幾個主要城市都比較熟。不過我對日本的戰後都市建設，房屋和公用建築的設計，頗爲反感並有不解之處：日本傳統的審美觀，人與物融爲一體的要求，怎麼在現在的日本消失了呢？可能因爲想找一個解答，我就到基金會聽那個講演。

從狩野的建築理論及他設計的建築物看，應該把他算作「後現代反動派」(Post-Modern reactionary)，或傳統派。他的建築理論，特別是去年得獎的他那山本掛面社址設計，跟目前仍然大行其道的「概念化」建築設計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這是因爲他主張，一個建築物除了使用性之外，也當同其自然環境在線條、顏色、建築材料等方面配合，使得使用這個建築物的人感到舒適、愉快、自然。這種思想本來是一切建築物理所當然地表現出來的，但自從十九世紀工業化吞沒一切

以來，就逐漸被一些極端非人性、純粹理念化的思潮所代替。

狩野講的話沒有能夠回答我心中的那個問題，更未能預言今後建築設計往何處去這個關係人類生活的大課題。回家的路上，穿過京都東山區小巷，走到加茂川搭車時就想：京都這個一千年故都的舊面貌仍保存得不錯。住在這個城市也很舒適，不像東京那個大都市工場。但中國某一城市規劃家、建築師們，好像從來不曾週詳的考慮過與他們工作有關的最基本問題，而樂意重蹈外國人的覆轍。

這話恐怕聽起來本身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不過現在大喊現代化都市、高層建築、玻璃、鋼筋、水泥安樂窩的人，到底了解不了解西方現代化所產生的嚴重社會問題和個人問題？知不知道他們正在設計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藍圖付諸實現後，會給一般人帶來甚麼樣的痛苦？

## 噪 音

來到日本的香港遊客往往覺得日本的都市，特別是京都，都非常恬靜，不像香港人山人海，一天到晚熙熙攘攘，吵鬧得使人永不得安寧。但是，遊客走馬觀花，注意力很少為那些花卉之間的可惡醜態的雜草所牽住。我在日本斷斷續續已住了兩年半了，現在可不知怎地，一出門一上街目不轉睛地觀矚着那芸芸衆生刺眼惹氣的「雜草」。但願我惱火燒不盡的草僅僅是一些可以「勿視」的「非禮」之物，不過處處還有不順耳的雜音。眼睛可以閉上把看不順的東西拒之門外；可耳朵遭到了雜音不能老像不願意聽惡訊的皇帝充耳不聞。

上月看到了日本《太陽》月刊登載的「外人談日感想」的訪問記。美國的女學生覺得日本人一見面就詢問：「你結婚了沒有？」很别扭；中國大陸的研究生對日本的現代技術和非科學迷信的混合極費解；法國的留學生很討厭日本人假惺惺地送和轉送禮物的做法。我對這些司空見慣，遇上了也不會有什麼太強烈的反應。被訪問的外國學生當中還有一個泰國人，他抨擊的目標最容易獲

得我的贊成票。他現在已經在一所大學教經濟學，跟一個日本人結了婚，同我一樣住在京都。他最厭惡的是日本無處不有的「騷音公害」（噪音污染）。

這位泰國講師埋怨說，耳膜不斷遭受沒有道理、毫無用處的錄音通知的騷擾。乘用京都唯一的地鐵時，電車進站前站台的喇叭總得播放幾遍早已錄好了的女音警告：「因為站台危險，請乘客往地上的白線後面站立候車。謝謝您。」這些幼童也通曉的常識性的提示一天當中不知能聽到多少次。公共汽車上人不斷被訓示抓好扶手、吊環，以免緊急停車時發生意外。當然，還有報站、感謝乘車、臨時通知等「雜告」。下雨天乘用電車、巴士和的士的人也被「勿遺失御雨傘」的示句追趕一天。在家裡呆着企圖逃離噪音的狂浪乃是妄想：右派宣傳車的高音喇叭和鬥志昂揚的歇斯底里歌聲和廢紙交換車的巡行無耳不侵，決不會饒你。

日本在六十年代經濟飛漲時期幾乎沉沒於自己的三廢污染。自從七十年代開始重工業（並重工業污染）的出口策略和政府對企業和工廠管理的淨化禁令，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日本「自食其果」的污染問題。噪音污染至今倒沒有人提及。也許日本人成人後還是渴求母親般的訓斥、警告和注意，所以把自己包圍於電子廣播通知的社會搖籃。難道地鐵站台上不喝阻人們離車軌站遠，他們都會像挪威的 U-sunning 鼠一般奮勇往車道撲去自盡嗎？大概不至於吧。不管這些了。反正世上沒什

麼救世主，想自我解放只得戴上 Walkman，陶然於自製的噪音。



## 潛移默化可怕

——日本兇殺案感言

六月十七日晨，東京。幾百萬公司職員準備上班時，聽廣播電視新聞，有這樣一條駭人聽聞的消息：在巴黎留學的三十二歲日本青年被捕。據警方消息，該生殺害一名荷蘭女學生後，肢解屍體，以便隱藏罪迹。又傳說，那日本青年在肢解屍體後，曾以她的一部份肉烹食。

如此恐怖的兇殺案，在日本國內發生已足以使全國震驚，何況「邦人」（即日本國民）在國外行兇？而恰巧這是日本首相鈴木訪問法國前夕出的事。法國外交部匆匆發表聲明，說這案件與鈴木訪問無關。平心而論，兩者顯然扯不上關係。不過日本民衆普遍認為，這種兇殺案確有有失國體之虞。

議論紛紛的市民，同一天下午又受到一件更恐怖更不快的新聞襲擊：東京市江東區森下二町，

有一個男人持菜刀砍殺兩個婦女，一個小孩和一個嬰兒。接着，他闖入附近一家中國餐廳，捉住一個婦女做人質，與警察對抗至黃昏，兇手終於被捕；人質死裏逃生。自清晨七時到晚上七時，連推理小說也少有的兇惡和恐怖感，震撼着東京和全國。

第二天，不少報紙用頭版頭條的位置報道下町（東京江東區屬於「下町」）的兇殺案，有的並質問：「連犯罪也要美國化嗎？」我同友人談論這條新聞時，大部分人對這一類暴行表示擔心和憤慨，也有人把話題轉到日益增多的日本「校內暴力」和青少年犯罪劇增。六月二十日《朝日新聞》有一則消息稱，據警視廳統計，今年上半年少年（十六歲以下）犯罪率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三點七。與此同時，十七歲以上的青年作案率稍有降低。顯示為非作歹在日本已經出現了一年輕化」傾向。每天的報紙和電視新聞充滿殺氣，令人有四面楚歌之感。

從來以社會秩序良好、人際關係融洽、刑事案少而著稱的日本，為什麼近來到處蒙上殺人流血的陰影？在我週圍的人好像都在發出這個疑問。這裏的傳播媒介，一方面幸災樂禍地追求暴力新聞，對發生的種種案件加以戲劇性的渲染；另一方面，跟一般人一樣，感到暴力的問題已如燃眉之急，力求為國民找出暴力案件頻頻發生的根由。

作為一個局外人，日本的「暴力膨脹率」似乎不礙我什麼事；除非我一旦在街上遇到不測。日

自注

海濱市場

本社會的不安，令我望而興嘆。日本這個超現代化國度的物質文明，遠遠超過其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二元化，二者的巨大懸殊，是不是暴力兇殺案和其他社會問題的主因？雖然在日本各地，有八一年最新式商品，時裝鱗櫛上市，却在哪兒都尋不到與之相對應的、符合高度生產增長率物質生活的「現代化精神生活」。在社會上觸目皆是的，有陶醉於打扮裝束的「晶瑩旅」（見田中康夫所著之《總覺得晶瑩》，日本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最暢銷書），玩世不恭的橫濱銀蠅迷①，原宿的竹之子②族，和下班去酒吧灌酒「成虎」（即狂飲泥醉的意思）的白領男職員們。電視上大多只是些侮辱理智的卡通「遊戲」時代劇等節目，每隔數分鐘，就放一通有唱有跳的廣告來給觀眾綜合享受一下。受此種薰陶的兒童，長大人後還能說是不可思議麼？自小他的感官就受大量暴力刺激的刺激感，正是十分合理的演進。可憐的是，被砍殺或鮮血直流的人，不會像螢光屏幕上的卡通人物那樣，奮起回敬一刀。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東京）

②

①橫濱銀蠅是一個新潮樂隊，發迹於東京，竭力摹仿英國The Sex Pistols樂隊「性槍」等手法，狂呼無政府主義及虛無主義。日本「帥」氣十足的青少年，追隨者甚衆。

②竹之子原為東京原宿區一家時裝店。現為趕時髦，陶醉於奇裝異服，在周末聚集原宿明治神宮前跳集體舞，放五十年代末美國音樂的青少年別號。

①

## 「買春」何時休？

日本首相鈴木善幸對東南亞國家訪問時，遇上了一個較為棘手的问题：日本若干大小公司集團組織日本男人到東南亞搞性旅遊，這在日文就叫「買春」旅行。但是，婦女解放積極分子、女權運動的活動家們在鈴木訪問的地方示威，遞交抗議書等等，要求日本政府取締性旅遊活動，這就恐怕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解鈴還需繫鈴人」。性旅遊之鈴非鈴木一人所繫，在所謂民主社會裏，解此「掛」在日本榮譽和尊嚴頸上愈來愈重的鈴，並非易事。

在海外，人們經常聽到反對日本人搞性旅遊的聲音，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國內婦女（有相當一部份是性旅遊男子的妻子）的抗議和埋怨的哀求聲。

有一位女讀者，寫信向《朝日新聞》編輯申訴家庭的不幸，說丈夫就是性旅遊者。今年一月中旬發表那封信後（原信中譯文附後），就有不少反駁這位匿名婦女的論點，甚至有人竟提出如此令人噴飯的荒謬論點，即：日本人在東南亞的性旅遊是對該地區的經濟變相支援；這對東南亞地區解決



失業和外匯收入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企圖取締日本人搞性旅遊，無疑會使被「援助」的國家受到很大的經濟打擊。這說法與侵越戰爭時美國士兵在香港灣仔做「春花滿開」的骯髒生意毫無差別。不過，那些日本男子的買春勾當乃是和平時期的生意，也可以說是使某些東南亞國家商品化的一種新穎手段吧？

日本的婦權鬥士和政治活動「淨化」活動分子市川房枝女士，二月十二日在東京澀谷的醫院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當此時際，日本的性旅遊問題更值深思。在那位匿名投書婦女的信中並未怒責她那有性旅遊之癖的丈夫，而用極少筆墨，描繪出日本社會的種種無形壓力，和可怕的現實。如果忽視信裏談的這些問題，而單獨去聲討日本性旅遊，恐不但不切實際，而且對日本人，特別是對日本婦女也缺乏同情和瞭解。我並不想為任何個人或集體製造的污濁做揩布，但覺得性旅遊的這一側面值得向讀者介紹。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於日本埼玉縣）

〔附〕丈夫「買春」之悲……

最近經常看到有關日本男人在海外旅行時當嫖客「買春」的文章。我自己過去也瞭解東南亞貧困婦女的想法，這正是因為我們日本婦女自己在戰敗後曾是很貧窮的緣故。不過，我最後還是默不作聲地給我的丈夫送行。

我丈夫是在一個很小的公司做事，公司裏的人對同事的私生活和家庭裏外外諸事瞭若指掌。他參加的「旅行團」是由他公司的一個老主顧招待的。倘若他依太太的話謝絕公司和主顧的賞賜，他不但會被公司的同事取笑，而且還可能使公司的生意受到影響。爲了避免職員在海外因金錢不足而失醜，公司甚至給了他一筆錢花用。丈夫雖然在我面前有點羞慚，但他仍是把家庭拋在腦後，踏上了旅途。

在丈夫海外旅行四天三夜的空白裏，我仍舊在家裏從一大早就斥責哭鬧的三個幼子。時而向拿出去晒尿布的天空仰望，凝視高遠而有白雲浮過的蒼穹。中午就帶孩子到附近的公園去玩，同鄰居的主婦們在一起談笑如常。晚上則在廚房一直忙到晚。

日本現在的確變得很富裕。當然應該肯定日本的男人爲此立了汗馬功勞。結果，爲了使男人在工作上的業績得到更大發展，利用男人之所「好」而誘之，恐怕可說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吧。大公司不用種種招待方式來向小賣店和常客公司慰勞，換取忠誠和奮發之心。

我的丈夫就是一個善於觀顏察色，在上級舉止中始終戰戰兢兢洞察新動向的人。他對公司百依百順，支持「盡

天發愁

天發愁的女子。

總之，支配我們這個富裕的日本社會還是男人。我對女人之無能爲力看得很清楚。不用說，男女平等之遙遙無期令我感到很悲憤。

(一個二十九歲的日本家庭主婦給《朝日新聞》編輯的匿名信)

## 顯然的對比

日本許多電影院，正在為兩部勢不兩立的影片做宣傳。第一部是中日合拍的《未完之對局》（中文片名為《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反映抗日戰爭期間「江南棋王」況易山慘遭日軍暴行家破人亡的感人故事。另一部名叫《大日本帝國》（下略為《日帝》），顧名思義，是一個為日本軍人鳴冤、給東條將軍招魂的軍國主義宣傳品。充斥歪理的歷史教科書，厭惡填鴨般學習的中學生未必細看，但明星領銜主演又以巨資拍攝的熱鬧戰爭片，招徠年幼無知的觀眾是輕而易舉的事。

對《日帝》的評論不少。日本一家英文版日報影評欄裏說：「此影片純屬宣傳，是一部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懷舊溫故的傑作……為東條英機招魂。」又說這是「與被重寫的歷史教科書的對應的形象教材」。曾經噁心地看過日本的《二〇三高地》會一眼看出這幫人馬在新作《日帝》的「高妙」手藝。

《大日本帝國》是一部剪輯戰爭紀錄的新聞片，插敘「史實性強」的解說鏡頭，而貫穿全片乃是公式化的富有人情味的戰士、母愛、太陽旗的揮動和盛開的櫻花。好一個浪漫蒂克派頭，不過戰爭片總歸是戰爭片；也有人面獸心的壞人，那是英國和美國士兵。在片子裏，他們叫揮白旗示意投降的日本居民舉手站出來，引蛇出洞後，祇用機關槍和榴彈「殲滅殘軍」。搞大屠殺的是「敵人」的部隊，而日軍除了無辜犧牲外幹什麼呢？整天遊逛菲律賓沙灘，親切地給菲籍姑娘們教唱日本民謠。

東條數次露面，慈祥非常，父親般地可親，可憐他無可奈何才被迫插手戰事，決計轟炸珍珠港，他的部隊時而勉強動刀動槍，但戰士們却毫無殘害人命之意，更不是野心狂發，頂多是「執行命令」或「為同志報仇」。這麼有良心和人性的好部隊，怪只怪中國人頑抗仇視和英美澳軍與之分庭抗禮。《日帝》炮製者認為，戰爭乃大可不必之事，因為好人打不過壞人。

《日帝》的出籠並非偶然。「侵略」被改寫成「進入」亦非一時興之所至。不少日本青年埋怨自己老貶低自己，弄得國家自尊心都沒了。他們說，難道我們過去的歷史一無是處嗎？影評文章結尾說：「只期望這部影片不要對外發行，那對在歐亞威望空前之高的日本，有千弊而無一利。」

## 追記

前數週有朋友送我一張電影票。這位友人知道我是一個不分青紅皂白的影癡。票子是她訂閱的《朝日新聞》分社爲了酬謝訂戶安排的專場電影會の入場券。放影的片子是美化皇軍戰爭片，《大和軍艦》。之前半年看《大日本帝國》時被歷史人物的嚴重歪曲和情節的離譜逗笑了，同坐在前排刺了光頭的右派青年發生爭吵後被迫退場。這回爲了「卒覽」大和的鬧劇就自控了一番。影片不出我意料之外，同《日帝》和《二〇三高地》同樣以史實爲笑料。

## 日本文部省招安「小搗蛋」

在日本經常聽人講電視明星「洋葱頭」的近聞。年輕人言及這位紅得發紫的老姑娘總是帶點輕蔑且恭畏的語氣。那是因爲「洋葱頭」黑柳徹子雖然講話似機關槍、長相並不討人喜愛，但她確實豁出來了，大大地成名。

在新宿朝日文化中心進修日文時，老師爲了鍛煉我們的聽力，就放黑柳日間談話節目，《徹子之房》的錄影。每每上那一堂課就給徹子的油腔滑嘴說得暈頭轉向；做的聽寫和填空練習也總是以慘敗告終。其中，只有那位奉黑柳爲日語驕子的老師得意，我們那伙仍然掙扎於日文苦海的外國人實在沒有辦法洗耳恭聽黑柳的萬言訪問，耐着性子看她那個以極不合身的衣着搞自我誇張的電視形象，默默地祈願語言靈感自天而降，早日掙脫耳目污染。

黑柳徹子並不像我起初想像的那般可惡；她只不過同芸芸衆生的日本名人一樣，是傳播媒介的產物。明星的「包裝」和「推銷」主要得靠電視，而黑柳是電視上露面率遠遠超過他人，是一個飽

和無所不有的人物。從學校裏上完課回到家所乘的火車十有八九掛着黑柳給冰箱、汽車之類消費品做宣傳的廣告。晚上在家擰開電視，遲早會目擊她那副不和不西的模樣。我到了日本不久，黑柳就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叫《窗邊的小徹》。我可不能「隨大流」去讚這本小冊為「精品」。首先，它薄薄一百餘頁的書頁上，排字字數甚寡，縮成一般書的話，估計頁數不會到五十之數。問世之後的一年半餘這個小冊子竟銷了近六百萬冊，已經成為日本戰後出版史奇跡。《窗邊的小徹》（中譯名為《愛的教育》）在日本暢銷，接着在國外相繼出版了多種外文譯本。我只看過黑柳的原文，對外文譯本的優劣無從置評，但除非作為一個探測日本讀者心理的社會學工具拿來閱讀，我並不認為這個作品有如此大張旗鼓譯成外文的價值。

黑柳在日本的社會裏，確實算奇特。她幼年所受的教育和母親對她的放任（黑柳之母，近來企圖分享女兒的好運，出版了一本題材為《小徹》的小書，日本出版界對母女倆有捉刀撰書之嫌的議論頻起）是培育她與眾不同的個性有較大的關係。《窗邊的小徹》的讀者有相當一部份是天天收看黑柳的中午談話節目的家庭主婦。該書一經宣傳就成為「話題書」，大家就慕名而購之了。但，另外有許多讀者像求神拜佛一般，迷信電視屏幕上的這位通曉天心情的黑柳女士，能給面臨着戰後最嚴峻時刻的日本社會指出出路。日本經濟的突飛猛進是有目共睹全世界公認的事實，但為此而積累的社

會代價（特別是對青少年心靈摧殘），不能再緩期付清，黑柳書裏的單純天真世界，是日本人為自己的兒女所渴望的理想天國。社會和機械化的非人道教育的冷酷現實，可不予理想主義以寸方。

我不欣賞黑柳徹子，也不認為她的《愛的教育》有多大意義。《窗邊的小徹》編入教科書是日本文部省削掉黑柳書裏有分量的鋒芒；給拔了棘的徹子——她的利害在比喻——編入順從的教科書隊伍。用不着怕她在讀者腦子裏自由奔馳一陣，因為她再鬧起哄，究竟撼動不了日本「教育體」這座大山的一根龍骨。文部省篡改有方，我想黑柳女士也顧不上這麼多——她的文字被列為榜樣時除了受寵若驚，她大約沒什麼其餘遐想罷。

注

一粒砂子

吧

黑柳此書在大陸中又版的書名是什麼？  
（愛的教育別名窗邊小徹）

不安時期

## 「震派」的《源氏物語》

——談一本日本暢銷書

「震了」，這是北京近年流行的新俚語，意思是有氣派，好得無以復加；與香港的「冇得頂」近似。處處以「震了」為榮，是為「震派」。

今年一月二十日由東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的小說《總覺得晶瑩》（以下簡稱《晶瑩》），是消化西方物質和精神生活後創作的作品。作者田中康夫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大學生。他在東京一橋大學法律系念書。去年畢業考試不及格，留級，在萬念俱灰、頹喪潦倒之際，奮筆疾書，兩週內寫出了這部處女作。

《晶瑩》的主人公是個典型的日本女大學生。幾萬字的小說，就描寫她在一九八〇年六月間的生活和內心活動，總之蠻「晶瑩」罷。日本都市青少年的代表刊物《菠菜大力士》主編對這本書的

となくクリスタル

小兒

評語是：「可聞到風的氣味，聽見音樂的旋律，看見熙熙攘攘的街道。我要為能夠描寫時代脈搏跳動的Fresh Generation（新的一代）之出場拍手喝采。」

這「新的一代」到底是如何一個新法呢？在一百五十頁的正文裏頭用日文片假名寫的外來語服裝、音樂作品、化妝品和香煙名稱的詞有一千左右。書末附錄的則有四百四十多個註解，為不懂青年「行話」的人解惑。作者極少用筆墨刻劃人物的內心世界。光描寫其穿戴和所抽的香煙牌名，就可以知道人物的一切。好個表裏如一！

據評論文章說，《晶瑩》是一部描寫日本青年性生活的小說。當然，主人公、女大學生利由，有兩次跟男人做愛，但我看主題是寫她如何以做模特兒維持自己的大學生活。書的中心是自我。而這個自我是在尋找晶瑩光亮的生活。在她看來，這生活就是膚淺的男女關係，秀麗的服裝首飾，高貴的名牌貨。利由的男友淳一，隨樂隊巡迴演出時，她感到很無聊，與其他男人做愛也不是味道，什麼都沒意思。淳一回東京後，利由心裏以為又可以享受晶瑩透明的日子了。最後，她在東京青年活動中心區附近的表參道，看到了一位自地鐵走出來、身穿極華貴時髦巴黎服裝的三十幾歲婦女。利由想：「我年紀大了（三十！）就要像她那樣有氣派。」難道日本的「新一代」就像這麼一個追求目標嗎？但看一個多月內《晶瑩》暢銷四十五萬冊，版再版，恐怕也足以說明田中康夫的這部

怎樣

能

樣

張好了

作品，至少道出了相當一部分日本年輕人的心態。

十一世紀日本平安朝皇后侍女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語》，裏面有相當一部分反映當時在日本流行的中國時髦事物。那本書當然有其極高的文學價值，才能流傳至今，成爲今天讀者愛讀的一部小說。看來，現在的日本同《源氏物語》所反映的「中國熱」時代相隔已有九百多年，而外國的東西在日本人當中的吸引力有增無減。反映這種傾向的文藝作品亦比平安時代多得多。「震派」文藝作品的產量與年俱增，而其文學藝術水平逐歲而減，難免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嘆。但平心而論，不能光怪寫這一類東西的作者，和買這些作品來充精神飢渴的青年。倘若真正想打破砂鍋問到底，弄清楚垃圾文藝泛濫之根由，恐怕還要從商業化社會整體去尋求罷。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於東京）

答案

不  
了  
也

## 您看過日本的《公關》嗎？

每逢星期五，在東京的報攤旁邊、「地鐵」中和小咖啡館裏都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青少年捧讀一份「大道小道」都傳的雜誌——《公關》（Pia——此名的日語發音近港英文的「PR」，乃是英文「Public Relations」一詞的變形，等於香港中文「公衆關係」之意。）《公關》雜誌就是東京最權威性的娛樂情報刊物。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注力於建設被炸成廢墟的國家，這三十多年來其勤奮工作、埋頭苦幹的精神，飲譽全世界。日本人的專心勞動忘我工作的態度，去年曾在歐洲引起經濟家如下的評語：「日本人是一個甘心住在兔子窩患有勞動狂症的人們」。

不過在美國「日本通」孚格爾(Ezra Vogel)所寫的《日本居第一位》(Japan As No.1)一書裏，描繪的日本勞動狂的反面，却有一個相等甚至更強烈的「娛樂狂」。這個娛樂狂，在被考試和偏

差總數的四面楚歌所包圍的日本青少年最爲顯著。《公關》半月刊就是爲了滿足年輕人的這個在學校和學習中絞盡腦汁，在考場與同學朋友競爭得精疲力盡之餘的輕鬆慾、消遣慾應運而生。

簡而言之，《公關》是一個綜合性娛樂界情報刊物。翻開二月十三日發行的包括自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一日的《公關》的目錄，就覺得內容之豐富，不愧爲東京時髦派及娛樂消息靈通人士的「機關報」。在《新聞雷達》兩版上羅拔·狄·尼路(Robert de Niro)主演新片《猛牛》(Raging Bull)的黑白拍攝及彩色影片褪色問題的文章。同版有音樂家同電影界更密切合作需要的討論和一篇介紹去年在東京由幾個工會組織的「歌舞伎愛好者會」的文章。組織該會的工會成員稱：「工會不但要進行經濟方面的鬥爭，也有搞文化活動的必要」。

往下看就發現有如下諸內容——

電影：影壇新聞、放映影展一覽表、及電影分類介紹。分類片子有外國影片特約放映會(Foreign Film Roadshow)、日本片特約放映會等，放映的片子介紹通宵影會、電視電影院放映情況、自主放映情况等。此外有個長達二十四頁篇幅的部分叫做「影片街角」，介紹東京各市區電影院放映影片情況，包括放映時間、票價等。這一版上角，附有該版所介紹市區影院的地圖以便影迷解癮之需。在翻看「影片街角」時就在「我們」八一年式的娛樂影片終於來到」標語下看到了成龍新

作《少林寺木人拳》的預告。

影片介紹之外有舞台演出(包括新話劇、舞蹈、露天表演各種朗誦會、傳統「寄席」(綜合表演)、「落語」(喜劇)、能、和狂言)演出的消息。也有音樂介紹，如樂隊和個人演出，來自外國音樂家和團體表演情況，及 $\infty$ 音樂消息。還有其他各種文化活動的介紹材料，如美術界動態、藝術展覽、各種未歸納入類的演出情報，像中國「熊貓馬戲團」(即上海雜技團)公演、茶道用具、陶瓷展覽、錄像詢問中心放映會等。也有公開講演，講座消息與娛樂界有關的刊物圖書簡介(如《打撈鐵達尼號》最近拍成電影的原作、《成龍劇照集》和關川誠編著悼念約翰·連儂之作——《約翰·小野連儂》)等。最後有些抽獎遊戲來信及一個編輯後記。

《公關》可說是一種包羅日本娛樂萬象的刊物。以一百五十日元(約三元港幣)爲定價的一百多頁刊物給娛樂界專業及民間業餘讀者，一網打盡地提供了東京娛樂全貌情報。國外讀者亦可以通過這滴「水」來看日本青年遊樂狂機會之盛。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於東京新宿區)

不  
而

## 《惡魔的食窟》 嗆着人了！

日本出版界最近出現了書業奇蹟，一九八二年的最暢銷書，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食窟》及《惡魔的食窟續篇》（由光文社出版）在十二月初忽然告絕版了！在該書正篇問世以來的一年半中銷售冊數迫近兩百八十萬，似乎出版社沒有理由這樣主動下馬。

《惡魔的食窟》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中開始在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連載，十一月由光文社結集出版單行本。該書續篇在一九八二年一月下旬仍在《赤旗》連載，九月續篇再版時，曾在卷頭添加二十張照片資料，作日本關東軍滿洲第七三一石井細菌部隊犯下罪行的證據。森村斷言日軍用化學試驗和殘忍野蠻的方式在被俘虜的中國及蘇聯人身上進行「醫學」研究，不亞於希特勒的納粹劊子手；在德國以及當時幾個附屬國的集中營搞非人道「科學探索」。所不同的是日軍七三一石井細菌部隊的罪行惡跡，遲遲至去年（一九八一年），戰後三十五年才公諸世人。

在十月中旬向森村提供照片的A氏告白說，他的那些東西是假的，是《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滿洲

「瘟疫」流行史附錄影集》裏的照片，經塗改後冒充七三一部隊的像片。A氏的告白，頓然陷森村和光文社於極其難堪的困境。

森村十幾年前的第一部獲獎作品《新幹綫殺人事件》出版以來，他的作品的銷路僅次於「暢長銷大王」松本清張和富木彬光。《惡魔的食窟》意外地在日本讀書界受到歡迎，使得森村「筆價」飛漲。但正當作家和出版社名利雙收時，森村由於對出版社處理他蒙受A氏詭騙深懷不滿而發表「絕緣通告」；光文社方面除了遵照作者本人意願停止《惡魔的食窟》的發行外，對有關這場風波的詢問一律以「無可奉告」處之。

森村九月中被報紙指責書裏的照片是用錯了之後，他不瞞情況，舉行了幾次記者招待會，解釋照片問題，光文社却不動聲色勸森村不理睬傳播媒介。十月中為弄清事情的真相，森村訪問了A氏，獲知「爲了賺些錢」A氏曾提供過假的照片。跟着，森村準備讓光文社的月刊《寶石》在一九八三年一月號刊登他寫的有關照片問題始末的文章。不料，該刊編輯部在十一月上旬要求森村把文章裏所有跟A氏會見以外的內容刪去。森村斷然拒絕，並聲稱出版社在企圖干涉作家的自由。光文社繼續勸解，望他等目前的風波過後再發表文章，否則刪掉文章裏作家個人意見。最後在十一月底森村和光文社的關係終於崩裂了。

在他的「絕緣通告」裏，森村宣佈《惡魔的食窟》I、II自動脫銷，第III部不予光文社出版；他年餘以來的對談、講演集《勿准惡魔的食窟重演》(No more 惡魔之飽食)另找出版社。森村認為這次「絕交」起緣於光文社對右派輿論和壓力的軟弱和屈服。出版社只硬求他對A氏問題暫時蒙混過關，頂住媒介壓力，但光文社上層本身不爭氣，寧肯侮辱自己的作家，膽怯於與一年來圍攻森村的書，對教科書、軍費增多問題議論的右派勢力對抗。森村今後希望可以徹底地擺脫左右嫌疑而準備在《文藝春秋》繼續發表揭發血跡斑斑的食窟的眞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於京都

## 東京堂出電腦新招

日本的秋天以楓葉染紅大地聞名世界，但秋天也是天氣漸冷萬物停靜下來預備過冬的季節，因此爲了配合人們「思靜」的心理，日本各地書店舉辦「本祭」——圖書展銷會。

今年東京「書城」——神田——的本祭期間，修建新本店的老書店東京堂的開張，給神田區中樞神保町增添了不少光彩。

東京堂在戰前穩坐日本全國出版業代售商的頭把交椅（六十二%）。在使日本現在的出版發行業趨向完備，東京堂也真發揮指導性的作用。

十月中東京堂重新開幕時，以最現代化的象徵——電腦——對其以往的形象予以徹底掃除。一個普通書店勿論多麼「摩登」，何必非得搞一堆電子計算機設備呢？不過電腦在日本商業和社會上的廣泛運用，必然導致其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每個角落裏。再說，日本社會訊息和傳理的高速情報化和目錄化在迫使新聞、出版以及圖書發行業盡快進行相應的改革。

129

東京堂使用的電腦有幾方面的機能：其一，目前最實際的用途是把本店倉庫裏所藏有的書，編入電腦以便點貨及進行銷售情況調查。這種節省人力和時間的便當性不容說，恰好也能夠滿足日本人統計數字狂，而且也有利於東京堂用自己的精確數字來羞殺敵對書店，並招引認為電腦是現代化標誌的顧客。其二，用電腦點清書庫也可以豐富讀者服務。譬如，若需給一位顧客找一本書，自己不必熟悉業務，更不用請別人幫助找，懂得怎麼同一個終端機較量就行。除了以高效率 and 速度炫嚇讀者之外，書店老闆也不必擔心培訓職員浪費金錢和時間，要求他們一律懂得操縱電腦就行了。

東京堂擁有圖書的數量，比東京站對面的八重洲圖書中心的二十五萬冊多五萬冊上下，但仍然比不上去年開始營業的三省堂本店（擁有約四十五萬冊）。不過「電腦化」幾個字在日本有空前的誘惑力，故此東京堂大膽地往科學圖書銷售和發行管理領域搶先邁一步，意味着一個大開門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於東京

## 神田的本祭

日本舊曆十月二十七日是天高氣爽、楓葉通紅的仲秋，也是每年在東京素負「書城」盛名的神田神保町舉行「青空古本祭」的頭一天。「青空古本祭」就是露天舊書展銷會，歷時八天，至十一月三日為止。神保町的舊書會是全國規模最大，吸引一般讀者、學生、學者和遊客最多的古本祭，但近幾年各地大小城鎮都在同一個時候舉辦自己的本祭了。在古東京都書販雲集京都大學附近的百萬遍寺擺攤設舖，在古色古香的廟宇前大興圖書交易。其他城市，像神戶、金澤、大阪等等，也都在書店或高等學校集中的地點辦舊書會。

神保町的本祭歷年都在附近的空地舉辦，但今年因為沒有合適的地方，書攤最後擺設在岩波大厦前面和三省堂後面來迎接紛紛而來逛第二十三屆古本祭的羣衆。參加展銷的東京市中央地區一百二十八家舊書店在靖國通兩旁張燈結彩，並用五顏六色的塑料楓葉及紅白紙燈籠裝飾在各商店門面和電綫杆上，以增加節日氣氛。

開祭的第一天人山人海，想瀏覽書攤的人幾乎擠不到擺書的地方，即便擠到了，也不能駐足享受平日「立讀」的樂趣，不得不「走馬觀書」。最吸引人是大量降價的二手平裝書——大多數比平時便宜百分之五十以上；精裝舊書同樣降價百分之三十。搶手的賤價書裏有十冊一套的日本古典文學集，十二冊一套的日本文學精選及各種詞書和百科全書。一般讀者則搶購平裝小說類，特別是偵探小說及著名外國作家的翻譯小說。美術圖書也同樣受人歡迎；近代歐洲畫家畫集，日本名畫集等等和五花八門的入門書，深受歡迎。神田區的外文書店也設了攤參加古本祭；有英、德、法、俄和漢語圖書多種。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掀起了一個至今不衰的「知識熱」，神田區的生意興隆，「古本祭」的舉辦既是這個知識熱的產物，又是它的媒介之一。平日神保町的舊書店買賣很好，尤其是平裝書的大量周轉。這些書雖然一般保存猶新，但出售價格不超過原價的百分之五十。在古本祭期間，參祭的書店更降價一碼。買書的人可以參考日本全國圖書聯盟所編的正式本祭目錄（今年有九十六頁之長），然後選擇重點，瀏覽書攤。

神保町本祭也獲利於附近四所大學的學生，附近大書店的讀者也有很多去逛舊書市。賣新書的書店如三省堂並不怕古本祭搶生意，因為看完舊書的人也經常去買一兩本新書。因此，三省堂在這

屆本祭期間提供了擺攤地方，在店內也自設了一個英國平裝書展來湊熱鬧。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京都

所

## 「本祭」偶拾

夏過秋來，楓樹葉漸紅，朝夜微寒，是啜飲讀書的好季節。日本各大城市的書鋪歷年秋季都在街頭巷尾擺攤舉行古本祭，這就像圖書展銷會，或香港的「清貨大減價」。

東京神田神保町秋季本祭展銷的圖書極為浩瀚，盛況最為可觀。古都京都的幾十家舊書舖也組織相當規模的本祭，雖然無法同神保町相比，但是京都的本祭的場所安排在幽靜的古廟，這又委實是東京的書商辦不到的。京都大學旁邊的白萬遍是大學生和京都讀書人雲集的地方，本祭就設於白萬遍寺。利那間，平日冷落的處所熙熙攘攘，有如舊時廟會。

「讀書之秋」不限於日本。十月初我在北京小住時，每隔數日就騎車到琉璃廠，逛中國書店舉行的圖書展銷會。該會為期十天，由北京全城各區中國書店參加。舊書雖然稀少，再版古書及新書也夠我逛幾個半天。京都本祭的規模略勝於北京的展銷會，陳列的圖書却無一本全新的；有明治後期各種書籍，除了日文的以外，有德、法、英文，而且也有一小部分中文書。我所指的「中文書」

了

結

並不是日本文化課的幾本「保留節目」，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選》、《顏氏家訓》之類（雖然每個書攤上總有一小角落為這種書所佔據），而是說現代漢語寫的新書。

說是新書，其實最「新」的是五十年代中期。巴金作品佔的比例最大，估計有少量是原版。我當天限於資金，手邊極「孤寒」。瀏覽時，有一位老先生擠在我近旁，甚至有你推我搡之勢。我正要甩出一個胳膊肘，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報復行為來回答他的蠻橫，不料側目一視，發現他手裏拿着一本極引起我購買慾的書：黃裳寫的《西廂記與白蛇傳》。

那位老兄似乎不僅行為不美，語言也二百五。他瞧了半天手裏的書，顯然對中國戲曲頗感興趣，黃氏那本書的名字也恰恰投其所好，幸好密密麻麻的漢字和假名之烏有，直叫他搖頭。他正要將之放回原處，大概注意到我饑涎欲滴，就盯着他手上的書不放，偏偏再翻了一下，還向書攤的小夥計問了價錢。索價之昂（五百圓）和正文之難使他最後罷休。我看準了勢頭，便側身進攻，用膀子和屁股，把他搵到擺放「之乎者也」的攤頭去了。

《西廂記與白蛇傳》，主要是黃裳五十年代初參加「總政」文工團越劇隊工作隊前後寫就的談中國戲曲文章的輯集。有的探討舊戲改革問題，有的介紹梅蘭芳的舞台藝術。我並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本書。今年夏末一到北京。出版社的朋友就給我送了一本黃裳新著《榆下說書》。他知道我經常

留意黃裳的文章，又把他收藏的一些黃氏舊著借給我，有：《錦帆集》，《錦帆集外》，《美國兵》，《舊戲新談》，《談水滸及其他》和《西廂記與白蛇傳》。《錦帆集》和《舊戲新談》我曾抽空細讀，覺得篇篇文采橫溢，是少有的好隨筆。出版社的那位朋友欣然告訴我，《錦帆集》準備明年再版。另外，黃裳也答應寫一本關於他所敬仰的作家和友好巴金的專著。看來曾經沉默多年的黃裳，通過新舊作品大量問世，勢必愈來愈引起國內外讀者注意和隨筆雜文愛好者的欣喜。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於京都

## 石揮飲譽國外

幾個星期前我趁在東京的機會，買票準備去看今年的《中國映畫祭》。參加的四部影片只有一部《杜十娘》沒看過；因為我愛看馮夢龍的小說，也曾編輯過一本楊憲益和戴乃迭英譯的《三言》選，其中有一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自然很想去看看這篇出色的小說搬上銀幕後效果如何。◎去看電影的前一天晚上，東京的中國影迷刈間文俊約我同日本電影評家佐藤忠男先生吃飯，隨便談談中國影片。

佐藤先生同文俊兄今年三月參加了在意大利都靈市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是影展的主持者和電影專家馬爾科先生邀請出席為期十天回顧活動的日本人。這次在東京見到佐藤，才知道他出席夏威夷的五洲電影研討會回來，剛剛下飛機。我們相互施禮寒暄之後，文俊說：「聞名已久的《石揮談藝錄》剛剛出版了！」接着，話題就死盯着石揮和他的電影。

我是去年（一九八一）夏天陪馬爾科在京遴選參展影片時第一次聽到石揮這個名字。記得是誰

問了馬爾科他看了三百部以上的中國影片認為哪個演員最好。他毫不遲疑地答道：「石揮。」佐藤在意大利的回顧展也看了石揮的七部影片（他一共主演導演二十二部影片），跟馬爾科是一個看法：哪一部影片有石揮出場，無論編導多差，總能因為他而得救。在《我這一輩子》，他們就認為石揮的卓越表演技藝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馬爾科和佐藤的意見充分反映很多有眼福觀賞石揮影片者的見解。在都靈的回顧展裏，石揮的《我這一輩子》放映的場次也最多，一共演了六次。外國影迷和影評家也有機緣看石揮的其他影片，如《哀樂中年》、《艷陽天》、《太太萬歲》、《假鳳虛凰》以及置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於死地並令人觀而興歎的《霧海夜航》。

石揮在影片裏扮演的角色千姿百態，他的人物臉譜繁複而多彩，但他的吐詞，形態，舉止和「神似」之處總離不開了一個「真」字。我自己為他在曹禺編導的《艷陽天》飾演主持正義、脾氣怪癖而可愛的律師陰兆時（綽號「陰魂不散」）而傾倒；直到現在，石揮在藤椅上支起一條腿得意地大唱那種淡泊自如的樣子還浮現眼前。《哀樂中年》的陳紹常，這個衝出年齡和社會家庭的局限而尋求自己的幸福和理想的銀幕形象，也感人肺腑。在影片《我這一輩子》中追人力車討錢的偷拍鏡頭，這是石揮這個嚴格並忠實於藝術的傑出演員追求真實的有名例證，也是中國影片和演員多年來所做不到的。可惜，我因為在電影回顧展期間工作忙碌未得觀賞。不過石揮如今在國內外終於得到了

他應有的聲譽，估計這個缺陷不久即可彌補。

那天談完話，文俊就給我送了一本魏紹昌編的《石揮談藝錄》。這本書我苦苦找了一年了。我這種「上下求索」之情也是中國電影狂迷馬爾科驅使的。談石揮的書要在上海出版，他一有風聲就到處寫信發電報求我給他買。去年秋天終於在吳祖光家裏書架上找到一本。祖光先生也早有讚許石揮為中國影劇界巨星的說法，在他那兒簡單地翻了一下《談藝錄》，當天就給馬爾科去信「報喜」。不過因為此書剛開始發行，我沒能找到，所以文俊送了我一本才得細讀。《石揮談藝錄》內容很豐富，涉及文藝領域廣泛，但我最愛看的是一篇頗有老舍筆調的《孔子以前沒有孔子》。僅僅六頁的散文簡直像一首「電影詩」：石揮筆下的形象跟他銀幕上的人物，同樣是生動逼真，看着一行行的字似乎就像看到石揮本人一般；他不僅是文章裏的「我」，也是姚癩子以及「肉他個娘，孔夫子是俺的老鄉」的張先生，二者交織於眼前。語言粗野、幽默、又細膩入微，最後令人鼻酸。可能是因為我熟悉石揮的電影表演，才這麼容易地把他的文字形象化。但我認為，其實這是石揮文字本身的「特異功能」。

石揮這個名字再也不會被埋沒。他的影片和留下的文字記錄將會繼續吸引人們。《我這一輩子》已經在國際上為中國新文化爭得了榮譽，趙丹的《武訓傳》何時可以重見天日？

石揮

①效果極差。馮氏想必在九泉之下打滾叫冤。

②一九五七年攝竣。《霧海夜航》是石揮絕命之作。據查，他體驗生活拍攝該片的民主號輪最後成爲他自盡的舞台。見《石揮談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五三七、三八頁。

③同上，第三一〇—三一七頁。此書印數僅六千冊，少得出奇。

## 持不同「影」見者的進言

記得一九七四年冬天我還在澳洲國立大學讀書時，有一天拉我哥哥去看中國文革電影界的新作《火紅的年代》。我哥到半場就打瞌睡，我倒被那些新鮮的鏡頭、響亮的對白和擴大成偉人的英雄形象吸引住。

後來我到中國學習，基本上一週要看一兩部文革電影，重複看幾遍的影片也不少。對一個愛看各種電影的人來講，那幾年只能看到淨化的國產片和阿爾巴尼亞、朝鮮及越南的少數影片，自然感到文化生活之貧乏。但我仍是抱極大興趣，去看所有的電影。

恐怕在七四年到七六年底看得最多的還是戰鬥影片。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看了七四年底最叫座影片《閃閃的紅星》。沒想到這部單純的兒童戰爭片會那樣風靡一時。後來，那個片子看了六次左右，我就開始意識到觀眾對新片子的渴望和恐懼。渴望，是想在百看不厭之餘，享受點真正新的東西；恐懼，是因爲心底裏誰都明白新片看一兩遍倒有意思，多看就難受。看電影變得像用錄像帶

學外語，反反覆覆地看，看得爛熟，看得都能背出來。說不定背影片就是當時文藝界領導以孔夫子之道治百姓之身的妙法。

《閃閃的紅星》、《車輪滾滾》、《渡江偵察記》、《地雷戰》、《地道戰》等戰鬥片看得很多。文革結束後有人說，當時是只有幾部樣板戲的文化沙漠，不對。數量不一定少，但質量的確有些可怕。《春苗》和《決裂》等幾部影片，在內容及技術方面都很有趣，放映後，感到中國電影有點希望。時過境遷，該批判推倒的都批判了推倒了。據說中國文苑百花到處盛開，文學方面的百花倒看到了一些，近數月在日本和香港則有機會看到中國影壇的幾部新作，頗有感慨。

看的八〇年中國影片有《海外赤子》、《櫻》、《今夜星光燦爛》和《小花》。我是昨天晚上在東京池袋區的豐島公會堂看現代中國映畫上映會放映的《小花》。看後有些感想，想記下來供讀者參考。《小花》等新片在中國國內相當受歡迎——據說《小花》還得了幾個什麼獎。我自己看了這幾部子後，也覺得在演技和攝影技巧上，近幾年來確有些進步。幾位初露頭角的年青演員很不錯。過去，《春苗》的一個演員在《今夜星光燦爛》當主角，顯得很成熟。特別是攝影技巧有些新嘗試，總效果不錯。但這些電影受到讚譽，都是形式、外表和技術之新鮮（對中國國內觀眾算新鮮）所致。至於內容，故事題材，對白之力量，藝術感染力等等，我個人決不會投這些電影的贊成

票。寧願再看數遍有極大煽動性和感染力的《春苗》和《決裂》。

上述謬論可用很簡單的方式概括為：文革的影片偏重於「以階級鬥爭而逗觀眾」，邪路也；這幾部新片子則「為技巧而技巧」，亦邪路也。文革前的影片因有「為藝術而藝術」之嫌而被打入冷宮，那是大謬誤。但現在中國的某些電影廠耗費巨資去拍攝技術嘗試的影片，以「冒充」影壇百花盛開局面，我看得挺反胃。當然好影片本來可拍得很多，就是好腳本難找。萬一找到了，也難以保全。反正以故事片之名繼續拍旅遊紀錄片（《小花》在此點可獲我的贊成票一張）也未嘗不可，讓無機會看中國名勝和遊覽區的觀眾，可借銀幕來坐遊一番中華。

## 少林寺的繁殖(一)

均需少林

中原公司的《少林寺》在日本上演後，簡直可說湧現了一個少林寺熱。在日本觀眾當中，李小龍的片子早就激起功夫的浪頭；近來成龍的「軟功夫」影片以輕快的節奏、詼諧的對白和成龍的奇特氣質，博得了眾多的青少年「ACKIE」迷。

《少林寺》在日本獲得好票房，除歸功於多年的香港功夫片熱之外，日本少林寺拳法協會的影晌也得算為一個主要輿論因素吧。去年一月份《少林寺》在港首映時，我給日本少林寺拳法協會的代表團當了幾天臨時翻譯，有機會親自觀覽該代表團拳法的精髓。像我這樣，曾經只練過一氣養老送終的太極拳的門外漢，日本少林寺高手的一招一式無大異於日本其餘的拳法，也跟影片《少林寺》裏李連杰一伙的「真功夫」相異甚大。看了不少冠以「少林寺」幾個字的影片（如：《火燒少林寺》、《血濺少林寺》、《少林寺木人巷》、《少林寺》等等），但確實搞不清楚名垂影史的少林寺功夫為何貨色。據《少林寺》張金炎導演說，河南少林寺也早已經名存實亡，只剩下斷壁頽垣

的破落外殼；通過在杭州拍室內鏡頭以及借助他地的古建築才勉強拍出了一點少林寺的面影。至於功夫呢，最後還是硬着頭皮湊合幾種法門。

「湊合」可能對這部轟動一時的《少林寺》不夠恭敬，但我也也不想推出一堆逆流的話來誇誇一通。不過眼看這部影片征服日本的勢頭自然覺得可湊湊熱鬧。一月底觀看了《少林寺》招待獻映比較快意，但觀看後只不過有空空如也的感覺，即沒有太大反應，而又離「為之傾倒」的地步尚遠。走出戲院時偶然遇上了黃永玉先生，他同眾人議論總有異彩。他說這部片子好比一桌宴席，山珍海味，熊掌魚翅，應有盡有，豐富異常。觀眾同似宴客又喜歡又畏怯，眼花繚亂，不知從何着手。估計他若往下說就是吃罷又覺得撐得都挪不動之類的话。永玉先生不愧為藝術家，話一旦出口耐人尋味。

?

吾亦

## 少林寺的繁殖(一)

Geremie-san, ore wa Shorinji o mi ni ikiaae naa, Tsurete-k  
uere no ka? (我眞的想去看《少林寺》你帶我去嗎，杰明？) 日本朋友的小兒問我。這部一看便厭的片子，我本來不預備再次觀賞，但爲了顧全小朋友的小心靈也就答應了他。多虧我前生行善，小朋友在我到外地爬山時跟幾個同學先斬後奏地自己跑戲院去看了。聽他觀後感，果然如料入迷着魔般地喜歡，好在我沒奉陪他去，否則祇能挨我一技之長——潑「冷水」。

冗長，是中國許多影片的致命通病。冗長、多餘、重複，都是農民觀眾在欣賞文藝節目，勿論戲曲、電影或曲藝裏不當做一回事的傳統特點，而恰巧是現代城市觀眾一般所唾棄的東西。《少林寺》獲救於中國絢麗的風光（雖然河南少林寺所在的峻嶺地區時而見到秃山枯水的喜人景象）以及李連杰、于海、張建華等武術運動選手的精湛功夫表演。這兩項：一個實景；一個眞功夫都值得一看。主題曲亦難以忘懷——我沒留意叫甚麼名字，但可戲稱爲「青年殺手進行曲」——顯然是

此句了極取  
否?

シレミーさん俺は、少林寺を  
見に行きたえなアツ、連れてくれ  
よのか。

此曲  
准

嵩山

個被文革的鬥志激昂、嗓門嘶啞的歌曲耳濡目染的作曲家譜寫的。它與片子的不相稱，足令觀眾莞爾。

隨着《少林寺》的狂浪波及日本列島，類似和模擬影片也春一般地到處漾溢；其中有日本影片《少林寺》、成龍的《少林寺木人巷》、成龍影片大會等。《少林寺木人巷》是一九七七年問世，算成龍嶄露頭角之作。電視上播放時，我盤腿陋室席上觀看。這個片子是成龍還沒有樹立一個銀幕形象時的作品，在整個電影的十分之八九他扮演啞巴，緘口不言，到了最後終於同殺其父的兇手較量吐出了幾句不值記錄的短話。這些都不很特別，片子的平庸差點叫我離席換頻道，但既不欲動手就豎耳傾聽片子所配上的音樂。這是因爲導演所用的音樂，基本上是《白毛女》的樂調。素來用於喜兒的唱段的曲子忽然烘雲托月地在成龍穿鐵鞋挑水、遇師練功、偷酒被罰等鏡頭，在千里冰封的北國情調裏浮現幕上。

當然，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樣板」作品仍然很流行；回顧那個時候的影片可見新戲流行到成龍作品裏去。可能是因爲成龍是京劇班出身，所以在這部片子裏大量用現代京戲音樂。有數處似乎又配上了些《龍江頌》或《海港》之類的樂段。這些種種同西方輕音樂、電子樂亦不時混合打羣架，給這個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但這是因爲我是一個現代京劇迷，至今陶醉於方海

中

3 在 汎

珍、柯湘等角色的慷慨激昂的唱段，但願中原公司下一部片子（真的預備拍《太極拳》？）若配上幾段像樣的音樂，我想可忍睹一遍吧。

鳴

## 《男人辛苦》第三十部

「藝術是爲了使人感到快意的」。日本導演山田洋次引用了柳田國男的話，作爲他談電影的專著《映畫的製作》的結尾。山田爲了創造出觀衆所喜聞樂見的影片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努力，而他的「傑作」《男人辛苦》，(Otoko Wa — tsurai yo，渥美清和倍賞千恵子主演)的連續電影至今已給人們帶來了十五年的快樂。看剛突破第三十部大關的這個片集的勢頭，起碼繼續到第五十部將不成問題。

山田的第三十部力作《花也好，風暴也好，寅次郎》，有日本著名歌星澤田研二的客串演出。不言而喻新年中觀衆會踴躍去觀看渥美清等像家人一般熟悉的演員們的新作品。但，山田和創下影壇奇跡的一班演員無暇顧得上觀衆們的喝采和掌聲，他們馬不停蹄地已經在拍攝一九八三年的第二部《男人辛苦》。

香港的電影觀衆熟知山田洋次的作品。《家族》（一九七〇年）和《幸福的黃色手絹》（一九

七七年)等片子，在香港獲得了好評，以至今時還在電視上重播。不過山田的《男人辛苦》堪稱爲他不朽之作，它不僅在日本國內爲人所喜愛，香港觀眾也熟悉車寅次郎，一個當今日本式的阿Q，溫柔的 Sakura，她勤勞忠實的丈夫，肥頭咧咀的工場頭等等，有極強平民味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不過，《男人辛苦》的產生並不十分順利。在一九六八年，山田拍了一套電視劇，電視台的負責人覺得寫一個沒多少魅力的流浪漢子的失戀和生機挫折，對觀眾沒甚麼癮頭，結果拍到第二十六集就讓山田給寅 san 設下陷阱，用毒蛇咬死他，使電視片集草草收場。未料，寅次郎的死引起了觀眾的強烈抗議。後來用了電視片的原班人馬拍了電影《男人辛苦》(一九六九)。第一部的票房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而在第一部上映後四個月間，山田又連續拍了三部。

其實，渥美清在《男人辛苦》的卓越成績並不僅因爲他有幸遇上能夠牽出他內在的藝術天賦的導演——山田洋次，而且跟東京(舊稱江戶)幾百年來的平民文藝和趣味，及渥美清對這種文藝生活的深刻體察和了解有着密切的關係。渥美清的表演富於日本傳統「單口相聲」，即落語師的口才和幽默。另外，他的車寅次郎是一個出於現在日本一體氏公司社會的「泥」而不染的有個性的人。這個形象是能夠給日本觀眾歡笑的，同情而甚至嚮往。他跟三船敏郎和高倉健的武士道化身形

形大漢完全不同，他更近於民衆的人情和更富於生活的矛盾和哲理。

山田洋次正在續拍影片，他估計可能拍不出五十部《男人辛苦》的片子，就是因爲車寅次郎和其家人的形象雖能不斷喚起新一代的喜心，但天不予人，而渥美清等演員不能不邁老。

廿九年

廿

比目是也二具

系列片集 150

## 悲而不傷·喜而不樂

陪幾個朋友去看一部電影。片子雖然不太差，坐在我旁邊的幾個素不相識的小青年不時搖頭歎氣，異口同聲地叫：「夜上海、夜上海」。問其故，他們就說：「而家邊個都講《夜上海》好睇，咁我地應該去睇啦，總算好過呢的垃圾卦。」我笑道：「未必，未必。」前天晚上，就中了《夜上海》虛張聲勢的技巧，到附近的戲院去一覽「上海新文化」之勝。

近兩年我大約看了兩百餘部中國影片，絕大多數是國內片子。另外，看到的外國片亦數以百計。在我這電影外行者來看中國影壇，確是頗有些奇跡，與其相撞之後難以忘懷，記憶尤新。其中有：四旬中年的趙丹和張瑞芳在影片《聶耳》，扮演十七、八歲的青年；張水華第一部影片《土地》，怎麼看也看不懂，台詞之繁多，劇情之重覆令人費解。《巴山夜雨》的蒲公英拍得如五彩繽紛的降落傘；《倒袁秘史》裡小鳳仙（張瑜飾）以天真爛漫「驕」取蔡謬，毫無撈氣，等等。

現在這個道不完的「影壇奇跡事典」應再加上二份材料：《夜上海》。該片以三十年代上海為

原名《知音》

浪

背景而基本上不表現上海，不托任何時代感，委實非輕而易舉。服裝、演技和對白給人如坐時空旅行之感，「處過去而不知」。最了不得的一條是：悲淒、慘淡的悲劇本該以摧淚彈攻勢來對付觀眾，起碼該可以擠出幾點眼淚或同情之感慨。結果呢，整個戲演成悲喜劇。小鶯和阿偉夫妻不合無說服力，阿偉的「跳舞之死」一絕招荒唐可笑，小鶯跌倒崩命猶「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整個電影最好的鏡頭乃是小鶯死後他老闆向觀眾說：照樣開幕，繼續演下去，銀幕則映出黑矇矇的大方塊，「夜上海」已盡，曙光泛天，觀眾幸獲釋放。如人曾曰：夜色沉沉，黎明在望；心記這句話才得卒觀糟蹋周璇形象的《夜上海》。

上文是我去年夏天路經香港時寫成的東西，相信讀者沒有這麼快忘記去年污染一時的《夜上海》。每當我回憶「周璇的再現」的鷄脖（非金嗓子），沈丹萍小姐的表演就惡心難忍，不過她在近來遭非議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倒深得我贊許，不應同像張瑜、陳冲和洪學敏等影片蛀蟲相提並論。男主角，周里京，在新電視片《天使與野馬》演技仍未掙脫俗套；據說他現任中國電影學院教員，理應「先觀後效」，但自他在兩部影片的成績而言他只能起教唆作用。我胆敢預言：在下對《夜上海》的「評價」將會經得起考驗。

攻心術

前兩個月在北京觀看了美國劇作家阿瑟·密勒名著《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首夜演出。這個話劇能夠在中國上演是樁耐人尋味的事，也是一個個別開生面的文化交流。

平時我對中國洋為中用的移植文藝不十分讚同；對於近年來眼見耳聞的古為今用「新作」也有相當的抵觸感。這些戒忌並不產生於阻擋視綫的高鼻樑偏見，而是基於較為費勁的調查。比如說吧，去年我在北京傳統民族文藝中心的天橋看了一場怪誕古洋混合的「厭台」戲，《林黛玉》芭蕾舞。此倒胃的紅樓惡夢足謂舞台觀止矣，而之後不久在電視上拜觀了《祥林嫂》舞劇，完全可以同《林黛玉》相比醜。魯迅的小說《祝福》也許算不得太「古」，但挂着一根拐棍翩翩起舞的祥林嫂倒「洋」得夠可以。不，有我偏見：我還是認為她搖搖欲墜的舞姿仍比不上寶玉托着黛玉後擁抱許終身一場戲的奇妙。這些只不過是冰山的頂尖，但是也足夠以窺視整塊山的真面目：即使套西方文

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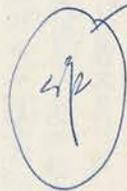
藝某些隨手撿來的末梢於中國的文學名著上來，豪稱之謂「具有民族風格的現代藝術」。我這麼說可能會有侵犯文化主權之嫌——雖然我認為文化藝術要天下為公——因此以下談點洋的好。

去年的藏語《羅米歐和朱麗葉》和今年的京劇《奧瑟羅》就表明了某些文藝獵奇心理十足之徒已經越過了適可而止的界限，竟唯恐天下不嗤哉。但凡是這種離奇怪僻冷門兒扯蛋的玩意兒，無有不看者。故而，我與高采烈地去看「人藝」排演的《推銷員之死》。

「推銷」的劇本是才華卓越的演員英若成翻譯成中文的。英也作了密勒的助手導演並主演此戲。米勒的斥責美國麥卡賽時代的寓意傑作《沙拉姆巫婆》(The Crucible)，去年在上海曾經演過一段。理應對此戲有強烈共鳴的觀眾反而反應冷淡。也許這是由輕快娛樂為當今之時尚，或許看這個戲的人不忍睹其鋒芒所指，因而唾棄之。《推銷》本為四十年代紐約市所發生的事情，時代氣息甚濃，且反英雄威力的遭遇寓意深遠，在當時給了西方作家和觀眾以很大的啟發。

英若成的《推銷員之死》乃以英所熟練的「京油子」腔調和八十年代的一些北京流行語言，使得原著既能跨國又能跨時代。英的努力和劇本本身的精彩當然贏得了官民的稱讚；密勒先生對這個「忠實」於原著的成功移植也滿意。我和類似於我的觀眾——即熟悉密勒的作品和英的「靈巧」處理却不肯輕率地予之以讚許。今年光有《推銷》一戲在北京當美國戰後文化的代表，而如此經過

因地制宜性的加工的代表憾甚、憾甚。



科幻惡夢

死而不唯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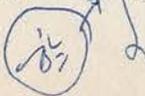


《星球大戰》的續集，《拆踢的返還》（自造譯名，不得盜用，Return of the Jedi 是也）

無疑在香港已經爆棚了一段日子。我自己雖然仍未得嘗此眼福，但貴港觀眾看這部鴻篇巨製裏的英雄要激光和魔力降龍伏虎場面時的欣喜表情和七也七讚賞之辭倒可想而知。

這類影片的編劇和導演犀利得緊要。你說像那部去年濫充人寰的《外星人》那傢伙，厲不厲害？當然，香港的觀眾看「要返老家」的癩皮起了皺紋的可親佻儻時，同世界各國觀眾一樣受感動和流悲歡交織的眼淚。但每個人或多或少是有些E·T·的屬性的；香港整體也與之有同性：始終得 go home，僅僅剩下時間和方法問題而已矣。

我在北京同一位美國佬朋友爭議「E·T·」，談得很有點昔日大鳴大放的勢頭。一提那該死的片子她便腿發軟、心快跳。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準我就甜蜜蜜地說：「牠多麼富有人情味。啊，杰明，你別老這麼冷言冷語，你也得承認這部戲的感染力，難道你沒有感動麼？」怎麼回答這



番近乎虔誠認真的話呢？對不起，我無意屈服於她的平庸說理：什麼B·H·有高超的人性呀，兒童們表現了動人的理解力和同情感云云。可能美國常青藤聯合會學府的人（她是其中一家的講師）以為對那三尺高的塑膠堆的讚美是對自己人性的肯定。很抱歉，我已經沒有那般赤子之心。

B·H·滾回去！滾不走，那就請騎腳踏車飛回去。他是走了，但走之前到處拉屎，為自己樹碑立傳。不信，就請看玩具店，小舖攤無不在極刺眼的位置擺放一堆B·H·的醜陋模型。樸實無華者已經夠叫人惡心，而更甚者有食指尖和眼睛裝小燈泡的。能走會說話的也大概在設計中。E·H·雖走了，却遺害無窮。我還是贊成北歐數國的英明之舉：因該影片恐怖氣氛濃重（音樂委實有此規定把本末倒置，應當不允許十二歲以上的人無辜受害於此片。

《拆踢的返還》，肯定又是一個卓越特技加發爛的情節的有機大會餐。問我看不看，則答曰何樂而不觀？倘若放聰明硬說不看，今後怎麼能夠找到素材跟人家爭嘲人心之不古呢？

## 睇戲馬拉松

糟了！眼鏡又給擠碎了。一定是乘那可惡的破電車回家的路上甚麼排洋「極端分子」弄的。這可怎麼得了。這麼一來我可寸步難行嘍。不要說寫字枱邊的那有增無減的書堆要看得眼花繚亂，等到配了新眼鏡我電影點睇？！

是的，看電影要緊。你說，你們在香港一天到晚吵鬧得不亦樂乎，沒有點亂七八糟的影戲來鬆鬆腦筋，怎能受得了。京都更有求助於銀幕的必要；整天無聊得沒法子，不弄點血肉橫飛，談情說愛，扯東拉西的貨色，日子怎麼熬哇？我坦白：我中了計，着了迷，上了癮；我已經無意中參入了跑那個沒有終點的睇戲馬拉松的隊伍。砸了眼鏡，花盡了錢，誓死也不要落伍。

我誤入戲途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新近事，而是由來已久的了。倘若真正有志追溯我着上影魔的機緣，大約要把我初中時代星期五晚上如饑似渴地「吞視」化粧成惡鬼的詼諧演員（Deadly E-arnest）介紹的深夜恐怖影片專題節目算為「起緣」。當時看的絕大多數影片是英、美、日票



的(級)

的老「相識」

△

房極差他劣作。前幾年看了美國洛杉磯劣等影片專家 Medved 兄弟編寫的《世界影壇最拙劣影片五十部》(The World's Fifty Worst Movies) 以及其續篇《金火鷄獎》(The Golden Turkey Awards)，就認出了許多年時代夜好。其中的日本片子 Mohra，美國的《The Tingler》等荒唐且可愛的東西至今仍未忘懷。

美國的 THE TINGLER 等荒唐且可愛的東西至今仍未忘懷。

入了大學後沒有電視也捨不得銀寶去戲院，影癮大減。到了中國學習閒得夠可以，唯一的娛樂，除了搞宗派，空談政治，乃是看電影。學校每週在禮堂放映幾次片子。當然都是所謂的「陰謀道」等。但總之，這些微薄的貢品難以使得我滿足。結果慢慢兒不再求新，而興致逐漸到求量為尚的「雪中送炭」使用主義。故此，有些片子有放即看，轟動一時的《閃閃的紅星》(一九七四年攝製)，起碼看了六次。觀看強制風行的革命樣板戲影片的次數早已經數不清。雖然我和其他的外國「影饕」被迫降低「進餐」的標準，但虎吞狼噬的勢頭只有開裕了我們的胃口。大陸的大學「畢業了」——其實我是提前溜了出來的——便到香港搵食。找到的那份工作雖然拯救我於吃不飽穿不暖的苦境，但要不是香港戲票很便宜，恐怕影緣會斷絕，睇戲馬拉松路上要跌一大跤。

①

③

④

我的要求

# 明星

觀眾

我們暫不得而知。

我認識的，甚至在寬銀幕上以外看過的明星很少。說不定確實遇上過好幾位但沒有留意過。認出來個明星又怎麼樣？上去摸，帶回家當客廳裝飾品都不行，還是有眼不識泰山的好，免得徒生妄想。

平生遇上的頭一個貨真價實的明星是李秀明。她當時初到上海，只有十九歲，天津工人味尚濃，而且她剛剛拍攝完她成名之作，《春苗》。這部影片早已經被問政治罪而消聲匿跡了。李秀明的影運甚好，連續拍了許多贏得喝彩的片子。她最近生孩子後體腫成瓢，為了主演上影謝晉導演新片子《秋瑾》努力減肥，她的「肉搏」的結果最後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

大陸的「明星」和「紅人」似乎我接觸得比港台的同行們多些。但我想，他(她)們只要在民衆眼裡經常出頭露面，就很難避免「象人」的惡運，即在萬目睽睽之下食自身難保之苦。前幾天新藝城青年演員來京都遊歷數日，我跟他一起參觀東映影片公司在京都大秦的「映畫村」、古寺廟

5

和庭園，也一道看了幾部荷里活的舊黑白影片。在言談中發覺一些搞他那一行的人的苦楚。出了點名，臉龐爲人所知曉，風流倒夠風流，但偶爾想過幾天凡人的日子就得費點心機。但，據他的經驗，再打得響的明星只要穿戴簡樸，舉止言詞與衆相同，就可以行踪無跡。

在香港好像追趕明星，求簽名之類的影迷慣例不太流行，這可能是因爲在港九曇花一現的人和物委實很多，人們司空見慣，難得爲朝露所感動吧。內地的明星可比港台的受寵得多。

我跟曾在香港熱過一陣子的影片《原野》（凌子導演）女主角劉曉慶見過幾次面，同裕進餐，甚至與一伙人到過北京殘存的唯一的「踢死狗」，民族宮舞廳。她當時已爲《小花》聞名，但在《原野》、《許茂的女兒們》、《潛網》和最近在李翰祥的破費大作扮演慈禧太后等劇她流芳數載的大好機會。像她這種紅人，很難過上幾天平民的日子。當然自己的汗水和勞動所換取的生活上的便當和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可厚非。我自己覺得她倒有點可憐。也許不至於，因爲中國人有個喜愛「捧人」的癖好，而且捧法多樣化，無孔不入。除了衆叛親離，無可奈何時，似乎也很少聽到被捧的人吐出美國舊影壇巨星 Greta Garbo 的哀歎：I want to be alone。

她是到了拍

先子才有

桌

過

已閱

## 咪咪菩薩

我小的時候並不喜愛貓。那麼嬌，一點也不聽話。想跟他玩就跑；跟他一塊散步，牠往前跑得老遠，然後停下來俯首舐爪搔癢，等你追上，牠又跑掉了，一點也不好玩。

我從來沒養過貓。我就不想要牠那德性樣。隔壁的那隻小白貓名叫西夢，倒挺好。可能是因爲養牠的那兩位老太太太嚕嗦，一見到我哥和我就朝我們跑，在我們腳旁打轉，把一根根細長的白毛黏在我們褲腳上。我哥挺過敏，一回家就打起噴嚏來，媽就知道他又去弄貓，卻也不說他。

離開了家就很少想起西夢。牠當然早已不在世了。老想咬牠一口的我們的兩隻狗，亦入土爲安多年了。在中國的朋友中，「愛貓家」相當多。記得一九七七年在北京大學剛念完，就到北京探望朋友。去了認識不久的楊憲益、戴乃迭的家，就發現他們外孫黃岳在玩一隻不丁點大的小貓。無名小貓，笑容可掬，見到我就像棉花般輕柔的小身子，盤臥在我肩膀上。牠還太小，不懂得蔑視人，以及自遠處向人挑釁的伎倆。我下次到他們家，就找不到無名貓。一問，說是擱哪兒跑了，黃岳氣

喘喘地說，在院子裏玩的時候，鄰居的小孩看他逗小貓就跑過來，弄得小貓有氣無力，這時鄰居的小子，就把牠揪起來當球往牆上踢。小貓頭破血流，就地斃命。

黃岳大了許多，仍舊愛貓，也會勾引起我的愛貓之心。去年住在他們家，白天懶洋洋躺在陽光下的新貓，就鑽進我臥室，跳上床，還玩。我若不奉陪，牠就益發搔啊、抓啊、咬起來。喝住了，牠更歡。把牠擲在地上，牠更來勁，害得我睡而不眠好幾個夜晚，有時無可奈何地起來，將牠關在門外，讓牠到大院子裏撒野去。第二天早上，滾了一身灰泥的小東西溜進門，叫半天，大概是要牛奶喝。

這隻小貓名叫「咪咪菩薩」；是一隻「出污泥而易染」的淘氣小貓。名字蠻怪。咪咪本來是黃岳好不容易想出來的「象聲」之名。菩薩則是他姥姥所創。原來乃迭用英文管咪咪叫「Puss」，黃岳當做中文發音，聽起來跟那許願普救衆生的「菩薩」相近，故全名叫「咪咪菩薩」。

咪咪每天只管吃臭魚，舔牛奶，鑽到窗台上曬太陽，任孩子們捉弄，嬉戲，到晚上吵醒大人，逼着他們放牠出去，以盡其天性。但，禍福無門，爲貓所應。院子裏的鄰居有人看中了「咪咪菩薩」的苗條身段，耀眼白毛，怡人性格，就把牠綁架隱藏起來。嗚呼，全家悲慟，菩薩杳無信息。憲益深知人心難測，料想必定有人剝其皮而食之。不料，過十數天，他女婿送子上學，在學校見一隻與

「咪咪菩薩」好似一胎的小貓。再細看，就是咪咪。本來「綁架者」把牠藏在幼兒園，幸而小貓自己跑出來，作認領主人狀，可是那人不同意。經過反覆交涉談判（是煙是酒不詳），「咪咪菩薩」終於死裏逃生，凱旋而歸，普家同慶。等我下月到北京，想可再享受牠的搔抓之樂。

## 魔球

在北京星期天起床較晚。不是因為上午要做的事情比平時少，大概是小孩都被俘虜去拜訪親戚，一切意外的安靜。誰都沒在，而從外頭傳來了割地聲，往窗外一看，發現乃迭在小花壇裏鬆地，準備栽幾株菊花。顯然憲益清晨一睜開眼睛就「蹣跚」到大門口外的農貿市場去「看一看」。這幾天天氣已經有點寒意，秋天到了，也該買些菊花，憲益和乃迭有默契。乃迭愛弄花壇，憲益動不動就去逛自由市場，買幾枝菊花，恰好投兩人之所好。

不久，憲益「大功告成」，到屋裏來歇，笑容可掬，酷似愛麗斯的那隻貓。問以何故，他嘴裏銜着香煙，手從口袋裏掏出了兩個綠色的球遞給我，說是「健身球」，市場上買的，一對五角。這種球記得在我小時候曾經流行過一陣子，後來同一切時髦一樣，又歸於無名的沉靜，像隱退的明星不知何時再能冒出來亮相。當時人們說，玩這種球是希臘所傳的散心古法，原來用兩個核桃在手里裏揉轉，金屬做的也盛行，當然因為時髦就大有錢可賺了。

朝

這些「仔球」在澳洲流行的時候我還小，一手拿一個球就差不多，所以從來沒很好的玩過。我們那天上午一邊聊天，我就獨自一個在一邊讓那兩個有柑橘大小的球在手掌裏滾轉，不斷地發出喀嚓聲。憲益說，早先有人送過他一對金屬做的健身球，是保定蓮池健身球廠的廠品，在友誼商店之類的地方售價三十元之鉅。包裝絢麗，有英文說明，球有外語別號，叫做「Healthy Balls」，或「Lotus Pond Balls」聞者無不赧然失笑。我還是覺得那五角一對的頂過癮。那天沒出門，而誰來作客聊天都被我那一對球攪得坐立不寧。後來我說，我這麼一發「來客瘋」，客人就不來了，來則瘋。

次日，憲益又買了一對球，比第一對略小一點，他拿來自己玩。我們倆對着客人你滾我轉，快樂極了。只有乃迭起初頗覺逗笑，久而開始討厭，說我們着了魔。從此憲益有所收斂，唯獨我變本加厲。我就管這兩個球叫魔球，同前些時候熱鬧過一陣的「魔方」，圓擊之方枘之一番。

中國的健身球看樣子像滾雪球一般，開始聞名世界。美國正在興起一種魔球熱，在美國有個新名目，叫做 Isospheres，意思是「同大球」，而保定那個蓮池廠據查是全世界唯一生產這種球的地方。美國「同大球健身企業」就跟蓮池廠訂合同，也把本企业全球專利權寫了進去。蓮池球成本不曉得是否低於我們石頭健身球五角錢，但現在國外定價是五十元美金。

較

而論

返日本以來時常心煩意亂，沒有一個寄託。兩個翠綠的健身球又留在北京楊府也真愁煞人。要是魔球的熱浪「滾」擊日本列島，我哪兒肯解囊花一、二萬圓日幣去買？但又怎能忍得住看着別人銀球在掌上自得其樂呢？於是揮筆以驅魔。

## 教育雜記

讀小學的時候，對作業簿或小測驗卷上老師賞的一顆小金星和一個潦草難認的 Good，我雖不算太熱中，但瞧到這勉勵的標誌，總是有些受寵若驚。原因是篇數不多，在幼童的心理，物以稀為貴，尤其強烈的。

從初中升入高中後，老師的小星星和一字之評，被長達半頁或數頁的評語，被末期考試成績優異者授予的獎品所代替。不用說，好評中也有時也帶點棍棒味道；因此，成績欠佳，勉強及格的事也多起來了。不過，年歲漸長，見識漸廣，對老師的權威和褒貶不像小學時代看得那麼重。尤其英國文學和歷史課，有時得低分數的學生並不是因為文章不通順，或邏輯性差，而是因為學生闡述的論點，不合老師口味，違背課堂教學宗旨。這樣，有不少學生就對讚揚和評獎的興趣淡薄了許多。

在高中選修的幾門課（我的同學大多專攻科學、數學和經濟，他們常說我這個選修歐洲古代史、現代史、文學和印尼文的人，太不識趣），不論學什麼，老師講授主要是為培養獨立思考和分

的風素有一張

影響

受到這種鼓勵的次數不多

析的能力，好讓學生到大學把一點本領學到手，將來走上社會不致於當一個偏聽偏信的庸人。說是這麼說，但總是有考試和分數糾纏着我們。所以，我們常覺得獨立思考，保守發揮。套上枷鎖而發揮，有時却受到青睞，學生也心照不宣：這不一定是自己的知識與才能獲得應有的鼓勵，反而很可能是老師賞識你跟他的指揮棒轉，且有思考而不獨立的技巧。

年紀輕輕的學生怎麼能這麼老成、這麼機靈？本來青少年不該如此世故如此老練，但這並不是自己登門拜師主動學些混世本領的結果；而是一種教育制度和社會體制對學生的額外賜教。我也不例外。小學和初一初二書讀得很差勁。初一最痛心的事，是年終考試，必修的法文課只得四十九分，老師網開一面，讓我及格，但同學們却嘲笑我一個有法文姓（Barne）的人讀不成法文，必是蠢材。後來，不知哪兒來的許多腦汁，學習變得順利了，考試及格，不再是由於老師開恩。但腦汁絞動起來，猛讀書，猛吞大量的資料性知識只求「茅塞頓開」，不經消化就倒在考卷上。這樣做，混到好分數，但沒有真正學到一些長期有用的東西。

高中有幾位老師對「人云亦云」病患甚的學生很反感，勸導改過自新，並以低分數和重寫文章作為懲罰之道。例如，現代史和古代史老師，只要求我們掌握基本史實，年代順序的知識，多看點書形成自己的觀點。遇到不明白的細節，就查參考書，或向老師求教。要是按照中國的教育理論講，

心理的自白

170

把學業的和他反  
常

搞的是「啓發式」教育。但老天爺真會開人的玩笑：我熬過絞盡腦汁的「啓發式」的高中和大學，然後偏自討苦吃，自己報名去中國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聖地」遼寧省（即朝陽農學院所在省），去接受「填鴨式」再教育。那種培養不學有術的教育，奧妙甚多，一言難盡，下次再向諸君敬作介紹。

的

# 鏡子

記得小時候我家盥洗室有一面大鏡子。可惜這個鏡子掛得高了一些，專供彎腰漱口洗完臉的大人站直時照一照，而我當時甚為矮小，只能跟洗臉盆爭個高低。明鏡高懸，我也只能從中看到反射出來的油漆剝落的天花板，如此而已。家裏的鏡子不能一照，其實無所謂；即使早也照晚也照，大約也很難像希臘傳說裏的奈其斯那樣，愛死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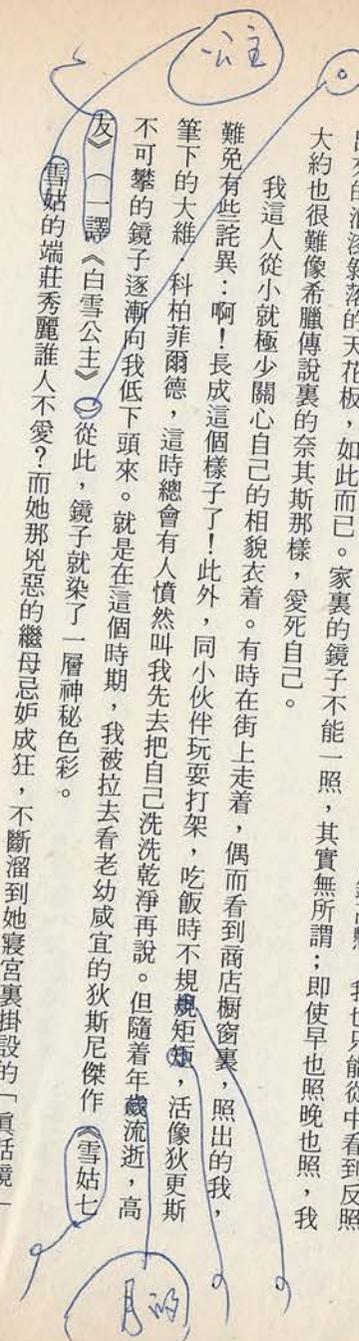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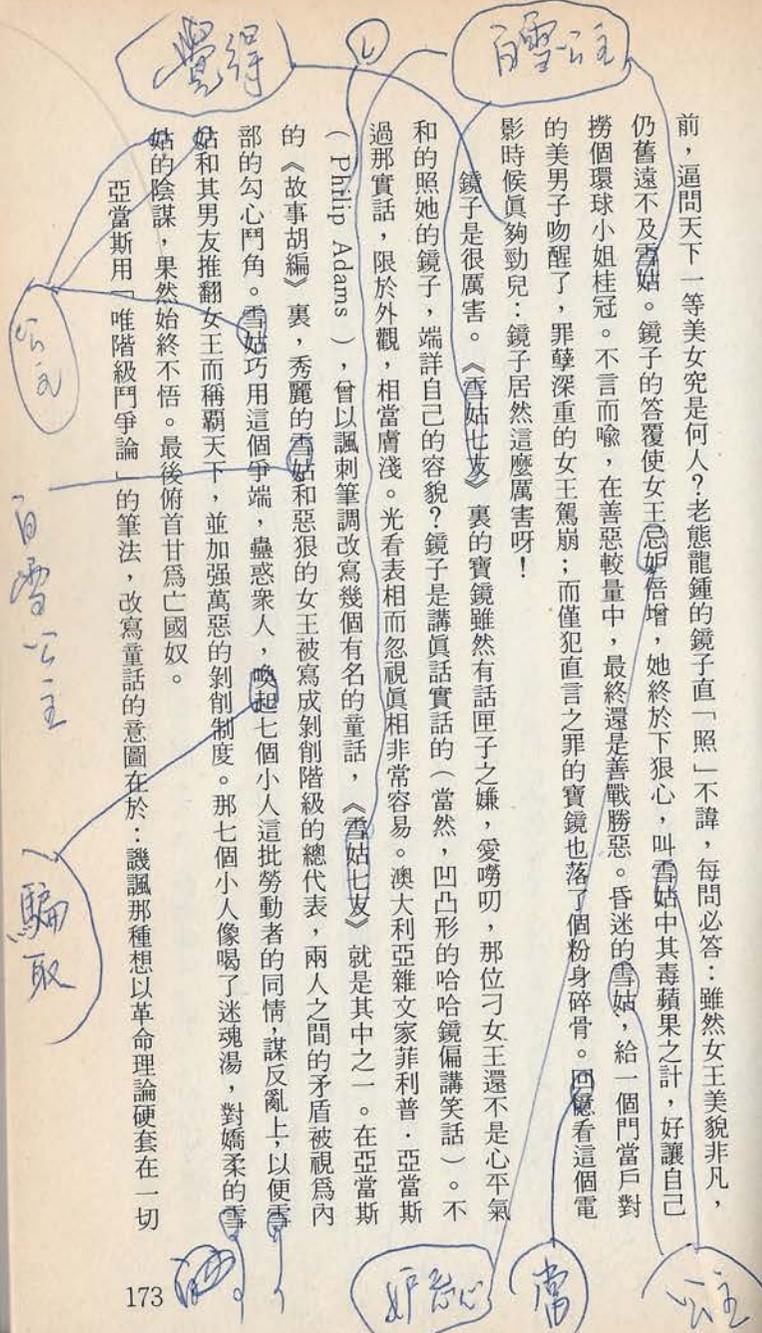
我這人從小就極少關心自己的相貌衣着。有時在街上走着，偶而看到商店櫥窗裏，照出的我，難免有些詫異：啊！長成這個樣子了！此外，同小伙伴玩耍打架，吃飯時不規規矩矩，活像狄更斯筆下的大維·科柏菲爾德，這時總會有人憤然叫我去把自己洗洗乾淨再說。但隨着年歲流逝，高不可攀的鏡子逐漸向我低下頭來。就是在這個時期，我被拉去看老幼咸宜的狄斯尼傑作《白雪公主》。從此，鏡子就染了一層神秘色彩。

《白雪公主》從此，鏡子就染了一層神秘色彩。《白雪公主》從此，鏡子就染了一層神秘色彩。《白雪公主》從此，鏡子就染了一層神秘色彩。

前，逼問天下一等美女究是何人？老態龍鍾的鏡子直「照」不諱，每問必答：雖然女王美貌非凡，仍舊遠不及白雪。鏡子的答覆使女王忌妒倍增，她終於下狠心，叫白雪中其毒蘋果之計，好讓自己撈個環球小姐桂冠。不言而喻，在善惡較量中，最終還是善戰勝惡。昏迷的白雪，給一個門當戶對的美男子吻醒了，罪孽深重的女王駕崩；而僅犯直言之罪的寶鏡也落了個粉身碎骨。四顧看這個電影時候真夠勁兒：鏡子居然這麼厲害呀！

鏡子是很厲害。《白雪》裏的寶鏡雖然有話匣子之嫌，愛嘮叨，那位刁女王還不是心平氣和的照她的鏡子，端詳自己的容貌？鏡子是講真話實話的（當然，凹凸形的哈哈鏡偏講笑話）。不過那實話，限於外觀，相當膚淺。光看表相而忽視真相非常容易。澳大利亞雜文家菲利普·亞當斯（Philip Adams），曾以諷刺筆調改寫幾個有名的童話，《白雪》就是其中之一。在亞當斯的《故事胡編》裏，秀麗的白雪和惡狠的女王被寫成剝削階級的總代表，兩人之間的矛盾被視為內部的勾心鬥角。白雪巧用這個爭端，蠱惑眾人，喚起七個小人這批勞動者的同情，謀反亂卡，以便白雪姑和其男友推翻女王而稱霸天下，並加強萬惡的剝削制度。那七個小人像喝了迷魂湯，對嬌柔的白雪姑的陰謀，果然始終不悟。最後俯首甘為亡國奴。

亞當斯用「唯階級鬥爭論」的筆法，改寫童話的意圖在於：諷諷那種想以革命理論硬套在一切



小說

陶連·格雷

白雲心

文學遺產上的人們。與此同時，他筆下的「帶有黑點的雪姑」却說明一個道理：女王雖不懷好意，雪姑也未必是完人。光據「真話鏡」所照出來的相貌醜陋，不一定能夠知道一個人內心的「真面目」。

亞當斯是一位當代的諷刺雜文家，改寫的童話不一定寓意深邃。十九世紀末，英國傑出的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在《利安·葛雷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Doris Gray）中，

以離奇的手法寫出人與鏡子的關係。葛雷在他自畫像前許願：不論年華老去，軀體衰頹，他自己要永葆青春，而藏放在他家閣樓的那幅畫，則要當他衰朽的替身。結果，葛雷享盡紅倚翠，紙醉金迷的生活，而鏡子裏的他依然翩翩年少。花花公子馬拉松式糜爛生活，在他肉體上，竟沒留下半點痕迹。但是他的心靈愈變愈醜惡，而這種醜惡，這種過度縱慾和瘋狂的顧影自憐留在他靈魂深處的污點和斑痕，却一一出現在束諸高閣的自畫像上。

鏡子對葛雷不算誠實。但那幅自畫像，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劣行全部刻劃出來。葛雷還算福氣；一般人可沒有「直照心肝」的鏡子或自畫像，因此很少有機會看一看自己靈魂的深處，平時只能在掛鏡或穿衣鏡前照外表，擺擺頭髮，撲撲粉，塗塗口紅之類，就完事大吉。

不過，人們每日舉行數次「照鏡禮」，雖不致跑到自畫像前發呆上癮，也有一番考究。雪姑的繼母照鏡癡大發之時，就在寶鏡前望眼欲穿，對那塊玻璃戀戀不捨。我想要是她是英國人或澳洲人，

就不會那樣明目張膽地照鏡子。因為盎格魯薩克遜人雖然跟其他民族一樣在鏡前修飾容貌，梳頭打扮等等，但平時在別人面前不好意思照鏡子太久。自己的相貌看多了，頗有顧影自憐的自戀嫌疑；甚至有淪為「葛雷二世」的危險。中國人好像也對鏡子不太迷戀，不過有些人有時候自己不照，反而用鏡子來照別人，尤其是照外國人。這大概是由於傳說的「照妖鏡」生了奇效，故有人想借此征服一下鬼佬。記得我剛到香港時，寄宿的小公寓對面有一位算命老先生。他得知有「異物」臨近，就立即在他窗欄上掛了一面紅綠二色邊框的摩登「照妖鏡」，那用意不外是憑此可把我的這股「邪氣」趕走。惜哉！鬼佬名副其實，不僅面有鬼貌，心懷鬼胎，腦子也盡是些詭計。於是，我找到一面小鏡子，掛在窗外，正好跟老頭子的那邊兩陣對峙，好讓陰森的鬼氣鬼光，像乒乓球似的來來去去（算是解決了困惑愛因斯坦多年的「永恒運動」這個難題）。

鏡子是要照的。但不必學刁女王、葛雷或白某照法。日本的照鏡法也許可以借鑑。在香港出街買東西，約朋友，睇戲之時，遇到頭髮散亂，或弄髒了臉，若不在街上略照尊容，就得找一個「洗手間」挽救頹勢，在日本則大不相同：到處是鏡子。國鐵和地鐵站台上擺設的大垃圾桶似的煙灰缸，都裝一個鐵架子，架子上都有一面鏡子。大家擠完電車，就可走到鏡子前一整衣冠，然後興高采烈地go上班或赴約會。日本人在衆目睽睽之下，在鏡子面前仔細端詳自己，泰然自若。公用電話的大

回家校

白雲心  
陶連·格雷

玻璃匣子裏，電話機上也經常裝着鏡子，我估計，不僅是爲了整容，並可供欣賞自己跟對方講話時的儀表姿態罷。「踢死狗」（港譯「的士高」）舞廳牆壁裝滿大鏡子，既給跳舞者以大打其舞蹈太極拳的良機，又可一覽自己的舞姿，大飽眼福；跟自己跳舞，且可省（張爲伴侶買）入場券。

中國古人有云：觀人於微。但從看鏡子在童話、小說和日常生活裏的特異地位而言，也許應該說：人之微，可觀於其觀鏡。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於香港）

的鏡

## 髮

髮，頭髮——有人聯想到除夕前理個髮過年；有人則一聽說頭髮，就趕緊找鏡子，照照看有沒有剃頭刮臉的需要；甚至也有人會想到市民爭購「髮菜」的熱鬧鏡頭。（髮菜的聯想我不必費詞。黑色細長如髮的髮菜，與「發財」有諧音之妙，購者大樂。）

但這都是一些拉雜的感想，不涉髮之要害。在中國人的社會裏，除了辛亥革命前後以剪辮子表示反滿抗清之外，頭髮好像並沒有太大的社會意義。我自己這幾年來也不大注意這個頭上的東西。其實我挺懶，直到頭髮遮住耳朵，垂至雙肩，禍延脊深，叫我坐立不安之時，這才勉強強強上理髮師那兒去受刑。想到這些，不禁恍然大悟：「頭髮時代」已逝矣。

噢？「頭髮時代」您難道沒有聽說過？您記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赫有名的貓王和奇克爾（Chubby Checker）嗎？貓王一頭油汪汪的黑髮；奇克爾是蓄綿羊短髮的胖子，他倆攜手開拓導致音樂和娛樂「革命」的道路。他倆一油一胖連滾帶滑地自歌壇消逝後，就出現以長髮和英國

186

利物浦口音為特徵的「披頭四」四人樂隊。「頭髮時代」就是隨披頭四上台而出現的。

一九六二年我八歲的時候，就有一段時間很討厭理髮。頭髮稍長一點，就被周圍的人稱為「小披頭四」。後來，青少年留長髮成為六十年代湧現出來的新思潮信奉者的象徵，也使無數家庭變成兩代人之間的戰場。我當時年幼，好管；但我哥哥已捲入藐視社會整體，藐視教育制度及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意識形態的行列，他頗為激進。結果，他跟父親和老師鬧得不可開交。到六十年代末，長髮則從個別孤僻派之愛好，轉為大多數青年奉為「幾三」的時髦，當時也出現了歌頌頭髮時代的一個戲，也就是第一齣「爵士歌舞劇」：《頭髮》。

伴隨長髮的發跡、普及和升華，其原來的叛逆含義，自然逐漸淡薄了。正是在長髮轉而成為時裝公司、娛樂界表現時髦手段之後，香港、日本和亞洲各國開始出現留長髮的「非嘻皮」青年。

「四人幫」政治生命翹了辮子以後，於不知不覺中，長髮滲入中國國境，成為某些「震派」追趕「國際先進水平」的標誌。（不言而喻，文革後期流行的數種髮型，如「春苗頭」，或模擬《杜鵑山》女主角柯湘的「柯湘頭」，煙消雲散。）嗚呼！時髦情報落後一大把年頭，殊不知長髮已成老朽之法寶，「先進」青少年又以寸長平頭之髮以顯示其雅致了。

上星期「春一番」的龍捲風襲擊東京。暖風一吹，溫度顯著上升。這幾天以來，溫暖宜人的氣

七

溫及露出點點笑顏的梅花，在向東京居民報春。這樣，我寄宿處的男主人和兩個男孩子都起了「春暖理髮」的念頭，紛紛跑一趟「床屋」（日語，理髮館），把頭部弄得根根稀髮，好似毫無再長長的希望。此情此景，不免觸目驚心。所以，在一起閒聊時，他們叫我提防晚上有人偷入寢室，把我苦苦留長的髮鬚剃成陰陽頭、陰陽鬚子，我雖不願示弱，還是覺得自己有必要，趕緊去了一遭「床屋」，理了個「迎春頭」回來。

第一次到日本理髮館，收穫極大（損失的頭髮不在話下）。在理髮椅子上——不如說是床，「床屋」二字可顧名思義，我坐了一個多小時，一會兒洗頭；一會兒剪幾根頭髮；理髮師給我照一陣鏡子；然後擦幾種「不明油滑液體」；繼而，又洗一番頭。在俯仰椅上洗洗理理，數上數下，初次意識到歷經政壇浮沉人物之苦楚。我被理得疲倦不堪之時，理髮師傅又拉來一個小推車，放着各種髮油、香水，大有把鄙人頭上的幾根殘髮，攪拌成意大利式沙拉之意。說時遲，那時快，我平時說日語有些口吃，如今却非常流利，立刻把師傅喝住了。防他別出心裁，我就趕忙結賬，脫險回家。理了一次七十多分鐘的髮，才知道六十、七十年代的頭髮狂雖在他國分明收斂，但在日本仍然大行其道。這種基於過分自憐自愛，和拘泥於外表體面的「先進性」，我看外國青年不必追趕。但下次再遇到房東諸公磨刀霍霍相向時，我總得想個啥子辦法，避免「床」上受罪才好。

東

信

◎香港流行的這個中英混合詞，近於北京話的「帥」，但略含貶意。

「此文作於五〇一〇年，當時僑居日本，正是解脫美八十年代的髮型。現可證實：頭髮的時代仍未結束，流行髮式仍如過數前奇而己。一又「五季和進記了港」

## 鬚鬚佬的苦惱

我有一把鬍子。本來這並不是什麼值得聲明的東西，但在與我年齡相仿的中國年輕朋友當中，似乎留鬍子的為數不多；甚至年高德劭的長輩也不常對自己的鬍鬚實行放任政策。因此，我斗膽對「嘴邊無毛」者，談談有鬍子之人的苦惱。

「你們外國人，一有鬍子看起來相貌都差不多。」甚至有人還說：「你們這些外國人的面孔雖然有時襯托不同的顏色：什麼金黃頭髮呀，淡咖啡皮膚呀，藍眼、灰眼等等，在我看來就是那麼一回事。反正不是中國人就是個外國人。」語言之籠統，思想之不清，在此不談，寧讓讀者自己回味這些話的含義。其實在以白種人居多數的社會裏，也經常可聽到人說：「亞洲人都長得差不多：黑頭髮，深咖啡色眼睛，黃色的皮膚，個子矮小；大同小異，可真難分；名字也記不牢。」可見到處都有「外人相貌相似不能分」的論者。估計死抱這謬論的人大體上都很少跟不同種族的人接觸。他們的這套邏輯，實以「少見多怪」和「少見皆像」為原理。把異己者一古腦兒揉在一起後，予以排

擠。

當然，身材大小相等，膚色、髮型等生理特徵相近的人，乍一看很容易混淆不清。這種混淆，一般是無意的誤認，並無惡意。不過雖然如此，被混為一談的人總難免有些快快不樂。比如說，前幾天在香港報紙上有一則消息，相當引起讀者的興趣：據說上海某大學一外籍留學生在畢業後離開上海前，在該校的黑板上用「四人幫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寫了幾句擁護四人幫的話——甚麼江青萬歲、文化革命萬歲之類的東西。具有特別政治含義的這幾個口號，被學校當局發現後，那位自稱是開玩笑並無意為四人幫効勞的學生，被勒令離校立即出國，到別處開他沒頭沒腦的玩笑去了。本來不足為人道的無聊的茶杯風波，竟然鬧成滿城風雨的大新聞。我知悉這個消息時，並沒把它當一回事。不料，這個要把戲的主角來港的當天，有些朋友見到我，他們知道我這幾個月不在香港，就說：「你呀，不就是你上海寫那背時的標語的嗎？我明明看到下火車的那個留學生蠻像你，也留了一把鬍子。」多麼冤枉啊！光是憑我前幾年在上海住過一年，現在有點鬍子，就能把人說得神出鬼沒，在東京讀書之餘，存心搗蛋跑到上海去找沒趣，真是豈有此理！

不過我是有鬍子，也長得相當歐化。只因爲這兩點，我神了——有充當所有外國角色的資格。也有人半開玩笑說：「黑板上的鬼話他寫得不過癮，還在報紙上執筆爲文呢！」何謂胡說？顧名思

義，本應指令人費解的外國人（即胡人）的語言，但從上邊幾句無中生有的話語裏，可見「胡說」的專用權決不是胡人所有的了。

有鬍子的人竟會搞些鬧劇。另一面，中國友人本着「嘴邊無毛，作事不牢」這句格言，推理一番，就得到一個逆定理：有鬍鬚的人都是經歷豐富、知識淵博，做事踏實可靠的長者，但出現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個乳臭未乾、相貌衰頹、具赤子（幼子可能更確切）之心的人。「鬍」不符實，你說我留這把鬍子可惱不可惱？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於香港）

# 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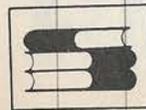
請到

書種最多的書店

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5-283671

營業時間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COSMOS BOOKS LTD